

二十世纪全纪录

周丽琼 主编

1952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朝鲜战场 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1
中国科学院参加反细菌战的科学调查	4
新中国体育健儿首次参加奥运会	5
中共中央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6
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7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21
国际主义战士——一级模范罗盛教	30
新中国培养出第一批全体女飞行员	32
烈火金刚——一级英雄邱少云	34
特级英雄——黄继光	37
一级英雄——杨连第	37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使用细菌武器	38
中国抗议美国残杀战俘	39
关闸事件	40
上甘岭战役大捷	42
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工	108
小资料	110
世界部分	112
世纪回眸	112
世界“雾都”的劫难	112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遭到指控	114
土耳其和希腊加入北约	138
1952 年芬兰举行夏季奥运会	139
冬奥会挪威奥斯陆举行	140

奥运会进入苏美抗衡的年代	142
莫里亚克获诺贝尔文学奖	148
美国建造出世界第一艘原子动力潜艇	149
1952 年船舶碰撞民事管辖权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	150
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霍尔洛·乔巴山逝世	153
小资料.....	158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朝鲜战场 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 1952 年秋季，战线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敌我双方作战活动仍属于前沿侦察、警戒战斗和小规模的阵地攻防战斗。停战谈判由于敌人坚持扣留我方被俘人员，自 5 月起便一直陷入僵局。

至 1952 年 9 月，朝鲜战场上已经维持了 10 个月之久的低烈度的保持接触的胶着状态。此时进入朝鲜的秋季，泥泞雨季已过，标志着适合军事活动的季节来临。为打破战俘问题导致的谈判僵局，粉碎敌人可能发起的局部进攻，同时为锻炼新换防部队的作战经验，中朝两军决定对敌进行战术性反击，并于 9 月 14 日下达了战术反击的作战命令。随后，自五次战役以来中朝军队最大的一次反击开始，攻击目标仅限于前沿易打的阵地。

此时，正面战线敌我双方的态势是：敌军第一线展开 15 个师，第二线 3 个师；我军第一线展开志愿军 7 个军、人民军 2 个军团，第二线志愿军 3 个军、人民军 1 个军团。

9 月 18 日，我军开始在全线发起战术反击作战。整个作战至 10 月 31 日结束，历时 44 天。

在这次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志愿军的战术有着人民解放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些新特点。在组织反击时，主要依托坑道体系。攻击之前，部队在前沿坑道集结，或在我方火力控制区挖屯兵洞隐蔽，能以突然性的短距离冲击，攻入敌方阵地。在攻击兵力配备上，步兵突击部队减少，而支援的炮兵和工兵增多，通信联络也大为加强。反击的步兵部队数量，一般对敌方之比只有2：1或1：1；而支援炮兵攻击一个敌人的连阵地，平均要集中各种炮8—10个连，约40门左右。这些新采用的战术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同时也突出了技术兵种和步兵协同作战的整体作用。

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从9月18日开始至19月5日结束。第39军由于准备充分，于9月18日首先发动反击。随后志愿军6个军（第39、第65、第40、第38、第12、第68军）和人民军2个军团（第1、第3军团），总共对18个目标的敌军进行了19次反击，其中美军阵地7处，韩军阵地11处。

经作战，中朝各军都按照预定作战计划，攻克了敌军阵地，其中巩固占领者6处，共歼敌8300余人（其中美军2000余人），我军伤亡2000余人。

反击作战的第二阶段从10月6日开始至10月31日结束。志愿军一线7个军，共组织了1个团另13个连又23个排、35个班的兵力在760门火炮支援下，在180公里正面上同时向23个目标的敌军发起攻击。经过作战，除第38军攻击韩9师防守的394.8高地（白马山）和281.2高地未获成功外，其余目标均于当夜或翌日攻占，并全歼守敌。

10月8日至21日，第65、第39、第15、第12、第68军又先后进攻了11个目标的敌军，其中四个目标攻击未成，其余均达成预定目的。在这次反击作战中，第15军于10月12日反击391高地时，事先将冲击部队于敌前潜伏。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炮击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为保证潜伏部队的安全，严守潜伏纪律，直至壮烈牺牲。他的英勇壮烈的行动，赢得全军的尊敬。

按计划，我军原定10月22日停止反击，转入正常防御。鉴于敌人于14日发动金化攻势，大举进攻上甘岭地区，战况日益激烈。志愿军首长决定将战术反击作战延续至10月底，以配合上甘岭地区作战。23日以后，第65、第40、第39、第38、第15、第12军又先后攻击了14个目标，除3个目标攻击未成，1个目标守敌撤退外，其余目标均被我军攻克，并全歼守敌。第二阶段反击作战，我军共对敌48个目标攻击58次，其中美军防守的9处，法国、荷兰、加拿大军队防守的3处，韩军防守的36处，共歼敌1.89万余人，巩固占领阵地11处。

我军秋季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对敌连、排支撑点及个别营防御阵地共60个目标攻击77次，最后巩固占领敌连排支撑点17处，共打退敌排以上兵力的反扑480余次，全歼敌两个营指挥所、10个连、69个排、8个班，大部歼灭敌两个团、一个营、7个连、8个排、5个班，共毙伤俘敌2.72万余人（其中人民军毙伤俘敌1700余人），我军伤亡1.07万人，敌我伤亡对比为2.54：1，其中在打敌反扑与反复争夺中共毙伤敌军1.

9 5 万人。作战中共缴获各种火炮 3 2 门、各种枪支 2 3 7 3 支，击毁各种炮 5 7 门、坦克 6 7 辆、汽车 7 4 辆，击落敌机 1 8 3 架，击伤 2 4 1 架。

中国科学院参加反细菌战的科学调查

从 2 月 29 日至 3 月 5 日，美军飞机侵入东北上空撒落带有细菌的昆虫、树叶等竟达四百多次。3 月 7 日，竺可桢、吴有训两位副院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对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声明。随后院即组织科学家进行科学调查，具体任务由实验生物所昆虫研究室等承担。被派往东北调查的马世骏及其助手，于 3 月中在各个地区采集美军飞机撒落的昆虫尸体，并见到细菌弹残骸和许多用来携带病菌的羽毛。3 月 29 日，郭沫若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扩大会议上，建议由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美国在中国和朝鲜撒布细菌的罪行。

6 月中旬，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六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到达北京。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任联络员。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参与配合调查工作。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主任陈世骧领导该室人员对美军飞机撒布的多种昆虫进行鉴定，写成《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美国细菌战报告书内有关昆虫的若干事实》。朱弘复和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一道，7 月上旬从北京出发，赴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调查。植物分类研究所的植物学家钱崇澍、林镛、胡先骕、俞德浚、吴征镒等对美军飞机撒下的树叶进行鉴定，确证美军的细菌战罪行。8 月 31 日，在北京举行《调查在中国和朝鲜的细菌战事实国

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签字仪式。报告书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武器。报告书中肯定了中国科学家在科学调查和分析中所做的大量工作。随后由《科学通报》出版了《反细菌战特刊》。

新中国体育健儿首次参加奥运会

1952年7月29日，在第15届奥运会闭幕前夕，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奥运会赛场。此时各项比赛已近尾声，只有印尼归侨吴传玉赶上了男子百米仰泳预赛。由于旅途晕机不适和时差，吴传玉在第二天上午的比赛中只得了小组第五，未能进入决赛。8月3日下午七时，第15届奥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闭幕式。

这是新中国体育健儿首次参加奥运会，虽然它没有在体育史上留下多少值得书写的事迹，但是，正是由于这次参加而导致在1952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体育的发展，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1952年的巨大影响。

1 两个方针的产生

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对新民主主义体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认识，十分重视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952年6月荣高棠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代表体总筹委会作的报告，表明普及是建国初期我国体育的基本目标。广播体操、锻炼标准开始在全国推广，群众体育组织大量建立，业余体育短训班广泛举办，就普及体育的程度而言，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空前的。

但是，在 1952 年出现了两个新的提法，也可以说是两个新方针，从此成为中国体育的指导性方针。这两个方针，一个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一个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后来的中国体育中，前者被认为是指导方针，后者被认为是工作方针。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毛泽东 1952 年 6 月 24 日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所书题词。这个口号在后来的一切官方文件中，都被当作是中国体育的指导方针。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也可以认为是出自毛泽东之口。历史上最早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一方针的，是八路军 120 师师长、后来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1940 年 7 月，在他与政委关向应同志联署的 120 师《体育训令》中指出：体育运动应当在全师内广泛开展起来，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同时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经常组织比赛的表演，选出优秀选手再去指导普及。这里不但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思想，而且实际上也提出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个为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公式。

不过。这个《体育训令》毕竟只对 120 师有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与整个体育联系起来，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1942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两次发表讲话，阐述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方向、方法，提出了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就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应该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讲话》不仅规定了文艺工作的方向和根本任务，也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延安活跃的体育界迅速接受了《讲话》的思想，并且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思想与整个体育发展结合起来，1942 年下半年，延安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有关言论。

但是，1952 年以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却几乎成了体育的专用语。这是从 1952 年的一个中央通知开始的。当中央决定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后，2 月 18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通知中说：

世界体育活动日益增多，国际友人希望中国能去参加也甚殷切，最近我们已宣布了准备参加将在荷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 14 届（按：原文如此）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但由于中国过去体育基础差，近年来几次出国参加球赛，水平较低，与今天的国家地位极不相称，此种情况亟须改变，因此，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而不在适应范围内加以提高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发展。里的字是刘少奇同志批阅时加上去的。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却标志着中国体育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无论是《体育训令》还是毛泽东的《讲话》或当时延安人士关于体育运动应力求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种种议论，普及和提高的对象都是一致的，即毛泽东所说的：向人民大众的普及，在人民大众基础上的提高。但 1952 年 2 月 18 日《通知》却在提高之前加上了一个限制词：在适当范围内。这样，提高与普及的对象、范围就都有了区别。在当时，把提高约束在适当范围内也

许是出于领导精力或人、财、物力不足等方面的考虑，但在后来体育的实际发展中，它却造成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相对分离。2.18 通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国家已经开始把体育（准确些说是竞技体育）与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提高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大突出出来。

最初，我们是打算用办体育学院的办法来完成提高的任务的，2.18 通知的后半部分就提到：中共中央已批准在首都创办体育学院，集中全国各项体育活动最优秀的选手加以培养。但在实践中，提高的任务却并没有、至少是主要没有落在体育学院肩上，而是落在了先后按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级体工队（后来称优秀运动队）身上。这种长年集中训练的优秀运动队，是此后 40 多年中我国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冲击世界体坛的基本队伍。这样，提高就开始和竞技体育直接联系起来了。从此，不仅提高开始和普及一道成为了我国体育的基本目标，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也开始具有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相结合的含义。

2 两个机构的建立

参加奥运会不仅使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体育机构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委托青年团主管体育工作。1949 年 10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当中国决定参加第 15 届奥运会、并对奥运会和奥委会事务有所了解时，才发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中国奥委会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跑到台湾的原总干事郝更生，已经抢先通知国际奥委会称中国奥委会会址已经迁到台湾。因此，1952

年3月初，体总接到国际奥委会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全国体协的会籍。3月11日，冯文彬会同廖承志（对外文委主任）、董越千（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荣高棠（体总秘书长）等人反复商议，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系由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应自然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其所属各单项运动协会中的地位。当时，原体协的大多数主要领导成员都留在大陆，为了顺理成章地使体总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体育组织，全国体总筹委会一方面按照国际奥委会原则修订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一方面准备继续参加原体协已加入的举重、拳击、篮球、足球、网球、田径、游泳、自行车、体操9个国际单项运动协会，同时在1952年6月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了争取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权益斗争的需要，很快又改称成立大会为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把1949年10的筹备会称为成立大会。

但是，体育总会毕竟是一个社会团体，而许多体育事务是需要政府出面来处理的。在百废待兴而国家经济、文化和体育基础又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只有利用国家权力，对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集中管理，才能优先保证竞技体育的发展。显然，建国初期那种体育管理制度是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当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的领导成员在奥运会后考察苏联东欧体育以后，他们的这种感觉十分强烈。1952年8月21日，刚刚从赫尔辛基奥运会归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团中央秘书长、全国体总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上书党中央，汇报了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并提出了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的建议。9月6日，体总主席、教育部部长马

叙伦也向政务院提出了一份相似的报告。两份报告都提出了应象苏联那样在政府中设立体育运动委员会以及成立体育学院、集中训练优秀运动员、举办全国运动会、修建大型运动场等建议。团中央的报告中还建议由贺龙任体委主任。9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指示：拟同意这些建议，主席阅后送邓副总理办理。当天毛泽东就圈阅了两个报告。9月15日，邓小平约见荣高棠，指示：现在就要搭架子，准备人选；要扩大运动队伍觐定选拔标准，到各地选拔；要建运动场，但不要离市区太远；要尽快筹建体育学院和批准召开全国运动会。同时，他又给政务院副总理贺龙打电话，通知中央决定请他兼任即将成立的体委主任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将军——这位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在八路军中大力倡导开展体育运动、著名的战斗队的培育者、新中国成立后只用短两年多时间就使素来落后的西南体育跃居全国前列的体育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央体委（1956年后改称为国家体委）主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的部一级国家体育行政机关。中央体委（后来改称国家体委）以及随后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府体委的成立，表明体育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正式确认，为体育发展提供的重要的组织保证。

3 两位委员的会面

在体委成立后第一批调到体委和体总工作的人员中，有两个人后来为争取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权益和地位作了很大贡献。他们就是董守义和何振梁。

董守义，河北蠡县人，1895 年生，通州潞河书院毕业，曾留学美国春田学院体育系，多次作为运动员、教练或总干事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任职于天津青年会和南开大学时，与周恩来在体育方面交往甚多；抗战期间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1947 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52 年时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1952 年 3 月，董越千在起草的关于参加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的专题报告末尾部分谈到运用旧人员问题时，专门提到原体协负责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董守义，现在兰州师范学院教书。已电查其解放后表现。待情况掌握后再研究如何具体运用。3 月 23 日周总理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示进一步了解董守义的情况后请他来京一谈。

26 日，董守义从兰州启程进京。这样，在时隔 32 年以后，董守义与周恩来这位当年由于体育而结识的学生，又因为体育而走到一起来了。只是他始终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把他调来北京。不过，董守义也从来没有向周围的人提起过自己和周总理的关系。

董守义怀着喜悦兴奋的心情找到了在王府井大街一个偏僻胡同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总副秘书长黄中和工作人员晏福民、熊斗寅热情接待了他。董守义这才知道此行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商议有关参加第 15 届奥运会和第 47 届国际奥委会会议的事。他用了两天时间向晏、熊二人详细介绍了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的情况，然后三人商量提出了一些有关参加奥运会和奥委会的初步意见。

此后，董守义以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义与国际奥委会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争取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能以中国

唯一奥委会组织的名义参加奥运会。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参加 7 月 17 日的国际奥委会第 47 届全会，而是委托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工作人员盛之白作为私人代表列席。当晚得知奥委会以 33 票对 20 票推翻了执委会拒绝中国运动员参赛的决定，但仍然未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明确决定。当董守义 29 日随团赶到赫尔辛基以后，与多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见了面，并参加了 8 月 1 日的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董守义的到来粉碎了台湾方面围绕董守义真伪的许多谣言，使许多委员在 1954 年国际奥委会第 49 届会议上站到了中国一边，那次会议以 23 票对 21 票通过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没有承认在台湾的全国体协是中国奥委会。

几十年后的人们回首这段往事的时候，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让董守义早一点到赫尔辛基去参加第 47 届国际奥委会会议？董守义到芬兰后的情况证明：如果董守义能亲自参加第 47 届国际奥委会会议，而不是由对董守义本人、旧全国体协乃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情况都不甚了了的盛之白作为代表参加，台湾就更不会有什么市场，或许这次会议上就有可能通过后来在 1954 年国际奥委会第 49 届会议上才获得通过的那个承认体总为中国国家奥委会的决议——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一系列旷日持久的复杂问题。

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现存的就是合理的。今天我们只能认为：当时的一系列作法都是历史自身的选择。

1952 年以后，董守义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奥委会的活动，为维护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地位和权益而努力。1956 年，由于当时国际奥委

会主席布伦代奇的顽固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董守义辞去了委员职务。

对于他的工作，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经作了充分的肯定：董先生参加几次国际奥委会会议，表现很好，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场发言的。

在董守义参加的几次国际奥委会会议中，有两次是和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何振梁一起参加的。

何振梁，江苏无锡人，1929年生，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董守义走上体育道路是因为他的体育才能，何振梁却是因为他的语言才能。

说起何振梁成为一名体育工作者，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50年4月，刚成立不半年的团中央到上海选拔外语干部，震旦大学是法国教会办的学校，全部课程都用法语教学，因而法语人才当然只有到震旦大学去找。这个任务落到了震旦大学的团支部书记熊斗寅身上。又要法语好，又要政治上可靠，熊斗寅为难了：这样的人可不多呀！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团支部宣传委员何振梁和另一位同窗好友。可是，当他去找他们谈话时，他们却不愿意到团中央去：我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何振梁说，因为他已经在作一个发电厂的毕业设计，在他的心里，正在勾画着祖国电力建设的宏伟蓝图。另一个同学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熊斗寅好说歹说，还是没有能说服他们，无奈之下，他只好拿出了最后的法宝：你们是青年团员，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和需要。

于是，三个人在离毕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告别了母校，一起来到了团中央，成为团中央国际部的工作人员。由于当时团中央同时主管全国体育工作，何振梁也

就从此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参加了 1952 年赴赫尔辛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在回国后不久响应他技术人员归队的号召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但 1955 年 2 月贺龙又亲自向二机部要回了何振梁。3 个月后,他就作为翻译随董守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50 届全会,1956 年 1 月他们又一起参加了在意大利科蒂纳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51 届全会。从此,何振梁再没有离开过体育。1981 年,他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的第 334 号委员。

4 1952 年两个阶段的划分

1952 年,随着参加第 15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开始悄悄地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使 1952 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上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当时的人们也许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变化的意义,但变化却确实发生了:

第一,体育仍然以普及为基本目标,但普及再也不是唯一的目标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在国际交往和国际运动会中取得好成绩,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激励民族精神服务,也开始成为体育的基本目标,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二,与此相应的是,组织长年集训的代表队成为了实现体育任务的基本方法之一,其地位日益重要。群众性体育活动虽然继续蓬勃发展,但过去那种独自享有的重要地位已不复存在,代表队一群众体育从此成为体育工作的两大重点。

第三,参加奥运会促进了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体育总会成为基本的体育组织系统,各级体育行政机构建立并逐渐完善。

第四，促进了我国体育结构的变化。由于体育为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服务这种作用，只能通过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表现出来，而这一点单靠发展群众体育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组建了各级体工队，长期集训，并逐步建立了业余训练制度，以扩大高水平运动员的后备队伍；同时又广泛建立基层体育协会和群众锻炼小组等，以推动群众体育活动。这样，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就被具体化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成为体育工作的两大对象。

第五，积累了关于参加国际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初经验，争取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权益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对外体育交往的主旋律之一。

1952 年国务院大事记

2 月 29 日美国飞机共 14 批 148 架次侵入我国安东（丹东）、抚顺、凤城等地。先在抚顺后来又在其他地区散步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对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

3 月 8 日我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我国人民，侵犯我国领空。

3 月 14 日政务院 128 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其任务是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3 月 19 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其他病媒昆虫。

7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在美国政府不顾国际禁令，向朝鲜和我国进行细菌战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8 月中央防疫委员会在北京举办爱国卫生运动展览，并先后在北京、广州、昆明、武汉巡回展出，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到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2 月 8 日至 13 日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决定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列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会议奖励了 150 个爱国卫生模范单位和模范个人。

中共中央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央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团结工人阶级、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此后，一场反对不法资本家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并迅速掀起高潮。最后核实退脏款达 10 亿元（不包括补税）。

“五反”指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与 1952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提到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合称“三反”、“五反”。

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2年6月6日，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召开的，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问题。

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土改已经完成，反革命分子已经肃清，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赶走，国内范围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突出起来，刚刚胜利结束的三反、五反运动，便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从而也巩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时，也提出了今后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时，在党内出现两种看法，一种是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一面，认为对资产阶级应该实行打倒的政策，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则要求以接受马列主义而不是以共同纲领为标准；另一种是看不到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前一种看法，以当时《学习》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代表，在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央及时发现作了纠正。后一种看法是中央统战部在为这次统战会议起草文件时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批示，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周恩来同志也指出，当着我们反对三

大敌人的时候，说民族资产阶级跟小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那是恰当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不能再这样说。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1952年4月底，中央统战部在给毛主席、中央书记处关于五一年工作总结和五二年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中提出，要在6月上旬召开各中央局、分局和大城市统战部长会议，主要讨论三项工作：（1）在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如何搞好工商界的组织和教育改造工作；（2）民主党派的发展和巩固；（3）帮助政协全国委员会贯彻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决定》。经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圈阅同意。

5月13日，中央统战部向各地统战部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的通知，要求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于6月5日前到中央统战部报到。

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央统战部在会前准备了四个文件：《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关于民主建国会工作的要点（草稿）》、《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草稿）》和《关于继续加强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意见（草稿）》。在送中央审批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毛主席把分析民主党派社会基础时提到的中间阶级、阶层的绝大多数人们，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们。中央统战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文件稿作了修改，提交会议讨论。

会议自6月6日开始，出席和列席这次会议的有：东北代表六人，华北代表六人，华东代表十二人，中南代表九人，西南代表四人，西北代表六人。中央党政机关（包括中财委）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负责同志三十二人，共计七十五人。各中央局统战部出席会议的负责同志有：华北局统战部长平杰三，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西南局统战部副部长程子健，中南局统战部秘书长胡金魁，东北局统战部副秘书长关山复等。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共八天，由各地统战部长汇报三反、五反运动以来对工商界和民主人士工作的情况，私营工商业面临的问题及处理意见。6月11日，陈云同志到会，针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的报告。

第二阶段共十天，集中讨论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工作的问题。6月14日，李维汉同志作了报告。他主要讲了四个问题，第一，关于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他说，工商界的统战工作首先要注意阶级关系。现在由于国内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已被打倒，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已不是中间阶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今后仍应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当前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保证他们经济上的合法利益；（2）政治上保持其合法权利；（3）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使工商联成为他们的合法代表机关；（4）要培养进步的资本家，争取资产阶级代理人和高级职员；（5）对资产阶级的工作要统一领导，各方配合。第二，关于民主党派工作。主要讲了：（1）民主

党派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主要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2）民主党派的历史是从处在国共两党中间逐步向左转，最后走到同我们党站到一边的进步历史，不应因他们中曾有人搞过中间路线而看不起他们。他们中的有些进步分子认为民主党派从一开始就是新民主主义路线，也是不对的；（3）民主党派发展成员应以中上层为主；（4）要承认民主党派有进行合法活动的地位；（5）民主党派思想改造的共同标准是共同纲领。第三，关于代表人物的工作。第四，对民族、宗教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经过这次会议正确地解决了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工作上的几个主要问题：（1）明确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中间阶级。这是今后在统战工作中必须树立的指导思想；（2）民族资产阶级仍具有两面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必须继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的政策；（3）对资产阶级的改造要求，在当时主要是把带五毒的改造成不带五毒的，把违法的改造成守法的，而不是把资产阶级改造成工人阶级。对民主党派改造的要求，是要他们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领导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们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他们内部共同的准则只能是共同纲领，而对于他们成员中一部分从事文教、科技等方面工作的积极分子，则应要求他们学习马列主义，逐步具备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4）民主党派发展成员，应以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中上层代表人物为主要对象。毛泽东同

志在三反、五反运动初期就指出，民主党派尤其是民建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中上层代表人物，因为大工商业资本家及其代表人物的代表性大，作用大，影响大。他在1952年3月15日同黄炎培的谈话中，也强调民建会要做大工商业资本家的工作。下层应是对象之一，但不是主要对象；（5）应支持民主党派依照共同纲领从事合法活动。各民主党派都负有协助我党团结、教育、改造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政治任务，要支持并推动他们与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发生密切联系，了解反映其要求，代表其合法利益。我们应在领导他们从事合法活动中，团结、教育和改造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6）各级统战部应和民主党派中的骨干分子一起，检查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教情绪，加强对中间分子和右翼分子的联系工作，切实发挥骨干分子的作用。9月16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发了会议通过的四个文件，要求各有关党委加以讨论并督促统战部门及有关方面结合当地情况研究执行。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50年代初，新政权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努力是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的：接管和改造旧学校，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教会学校，以及私立学校改为公立；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将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并举，扩大工农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

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2 年对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旧有的高等教育，构造了建国之后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品质，对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一模式已成为 80 年代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对象。

附：对院系调整过程的追述

早在 1949 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校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 年 4 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纺织工学，等等。

1952 年，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为适应高等教育满足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的需要，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统一分配毕业生制度的需要，开始大规模进行院系调整。

1951 年 11 月，中央教育部在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 1952 年院系统调整的序幕。会议指出，全国工学院地区分布很不合理，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少数大城市，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效益低；学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决定以华北、华东和中南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1952 年 5 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

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调整的原则是：高等学校的内容和形式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

大学（指综合性大学）为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培养师资的高等学校，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 1 所，最多不得超过 4 所，大学行政组织取消院一级，以系为教学行政单位；工学院是这次调整的重点，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为原则。

农学院采取集中合并的方针，每一大行政区办好 1 至 3 所。

师范学院每一大行政区办好 1 至 3 所，纠正过去与大学同学科设系的倾向，严格遵照中学教学计划所需系科设系。

具体的调整方案包括：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科性高等工业学校；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撤销。

将南开大学的工学院与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

将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将其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江大学。

将南京大学的工党与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

将武汉大学的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和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南昌大学的采矿系统调整出来，在长沙成立独立的矿冶学院，并增设采煤系及钢铁冶炼系。

将武汉大学和南昌大学的水利系、广西大学土木系的水利组合并，在武汉成立独立的水利学院。

将中山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独立的工学院，等等。

整个调整工作，京津地区从 6 月开始，华北地区于 9 月，中南地区于 10 月开始，到年底基本完成预定的调整任务。

通过调整，北京地区新设的学院为：北京地质学院（由北大、清华、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党院等校的冶金系科合并组成）；北京航空工业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成）；中央财经学院（由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民政组合并成立）。1952 年的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例如，华东地区原 59 所高校，没有参加调整的 8 所，停办（或调整后校名取消）及迁移外区的学校达 21 所。调整后，全国共计新设高等学校 31 所，其中工业院校 11 所农业院校 8 所，师范院校 3 所，医药院校 2 所，财经院校 3 所，政法院校 2 所，文科院校 1 所，艺术院校 1 所。从旧有综合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各种专门学院有 23 所。调整后停办的高校共 49 所，改为中专的 4 所。

作为 1952 年院系调整的延续和补充，1953 年全国继续进行院系调整。此后，1955 年，高等教育部决定调整部分高等学校的院、系、专业的设置和分布，将沿海

地区一些高校的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其中影响校大的将交通大学大部分迁往西安，建立了西安交通大学。

1952 年院系调整的主要动机，是将高等教育纳入为经济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轨道，加速培养工程技术和科技人才，提高教育效率和改变教育布局的不均衡状态。这些目标基本达到。

经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多科性综合大学改为文理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综合性多科性工业大学。全国综合性大学由 55 所减至 14 所，工科院校由 18 所增至 38 所，师范院校由 12 所增至 37 所。招生规模迅速扩大。1949 年，共有高等学校 205 所，在校生 11.7 万人。1952 年，共有高等学校 201 所，在校生 21.97 万人，增至 1953 年的 1172 人。

工科院校的培养能力显著增强。理工院校占高校总数的比例，由 1949 年的 13.7% 增为 21.4%。全国工科学子招生规模广大了 1 倍，由原先招收 1.5 万人增至 3 万人。1946 年，工科学子仅占在校生总数的 18.9%，1952 年达到 35.4%，为各科学子之首，改为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 12 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通过调整，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相对集中，提高了使用效率。

中国高等学校的布局偏于沿海和大城市。1949 年时，58% 的高校在沿海 10 省市，仅上海一地就占 25%；边远 9 省区的高校仅占 6.8%。经调整后，适当改善了这种不均衡的布局。到 1958 年，沿海 10 省市的高校占高

校总数的 42.4%，边远 9 省区的高校增至占 13. %与此同时，在 1950 年接管了接受外国津贴的 20 所高等学校（其中 11 所改为私立）之后，在 1952 年的院系调整中，所有 65 所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办。

以本世纪初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标志，我国现代教育的体制是向西方学习，仿效美、日教育制度的产物。1952 年的院系调整是一道分水岭，将二十世纪的大陆教育鲜明地一分为二。对旧中国教育大规模改造重建，全面模仿、移植苏联模式，形成了建国后大陆教育的基本面貌、价值品质。

与欧美大学的通才教育模式相对，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称之为专才教育。其基本特点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连，对教育实行高度统一集中的计划管理；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来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本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学生全部免费。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高度契合的、与动员型社会同构的教育制度。它可以集中国家资源，迅速培养大批高度专门化、专业狭窄的“现成专家”，却有其明显的弱点和弊端。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50 年代初按苏联模式重建的高等教育，其弱点在建立之初虽也有明显表现，但总体上是适当时政治、经济制度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必须随之而变革；然而，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

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

1、严重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

现代教育始终有相辅相成的两翼。一方面，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对经济振兴，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价值；另一方面，教育又具有促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保持和传递文化传统，维系和整合社会，以及陶冶人格等人尊教化的功能，即教育的非功利价值，它主要是通过文科教育实现的。因而，急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都面临一种考验：能否在发展科技教育、专门教育的同时，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不难看到，院系调整发展工程教育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文科为代价的。1949 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 33.1%，其中文科、财经、政治各科的学生比重分别是 10.2%、16.2%、6.3%；至 1953 年，即第一次院系调整后，已分别下降为 6.7%、6.4%和 1.8%（共占 14.9%）。到 1957 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又进一步下降为 4.4%、2.7%和 1.9%（共占 9%）。1962 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 6.8%。同样，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功用，被称为现代教育的“轴心机构”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 1949 年的 23.9% 降至 1952 年的 10.9%。1986 年，这一比例为 4.3%。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

对文科教育的削弱不仅由于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

也出于对它“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一大批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学者备受批判冲击。“文科危险”和“文科无用”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酿成全社会经视、贬损文科，重视理工科的明显的“重理轻文”的倾向。

1980 年，经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我国大学生中文科学学生的比重达到 8.9%。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7 年的统计，在全世界 1000 万以上人口 50 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比重于 50% 的有限 3 个国家，介于 26~50% 的有 26 个国家，介于 20%~30% 的有 6 个国家；介于 18%~20% 的有 4 个国家。中国的情况，竟然比这一比例最低的国家还低 10%。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同样表现在理工科院校的课程结构中，以及中小学的学校教育中。其后果，不仅造成应用文科人才的奇缺，制约了社会现代化发展，而且严重削弱了学校的教化作用，致使学生在知识结构、价格结构上的片面畸型。科学与文化的割裂在前现代的中国表现得格外明显。

2、人才培养过于专门狭窄，效益低下。

即便从培养专门人才的角度，这种教育模式仍然是不甚成功的。对高度专门化教育的推崇，意味着对科学和文化的综合性、完整性的损害和削弱。它固然可以培养出大批统一规格的“标准件”，却难以培养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更不用说大师和巨匠了。

1953 年，我国高等教育十一大类共设置 215 种专业；到 1983 年，高校专业设置达到创纪录的 1039 种，是 1953 年的 4.8 倍。以有计划、按比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理想的专才教育，在现实的动作中却造成严重的

比例失调。1987 年高校毕业生分配中，有 353 个专业（占专业总数的 41.7%）人才奇缺，数额达 19 万人；与此同时，又有 157 个专业人才“过剩”，人数亦达 10 万人之多。过于专门狭窄的专业设置和专门技能，与现代社会知识技术迅速更新、职业变换和社会流动加速的要求不符，是造成专门人才“专业不对口”、大量人才浪费的重要原因。

与计划体制相应的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高校管理体制，造成重复设置严重，学校规模极小，高等教育效益低下。例如，1977 年至 1985 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 27.3 万人增至 61.9 万，增加了 127%；学校数却从 404 所增至 1016 所，增加了 151%。高等学校中，学生达 5000 人以上的仅 50 所，占 5%；学生 1000 人以下的 447 所，占 44%；其中 500 人以下的学校有 179 所，占 17.3%。大学教育中的“三脱离”当按照苏联模式将大学改造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工厂”时，大学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学校树人育人的主旨和通义，在专门教育的结构中被培养专家的目标所模糊。“做事”和“做人”的双重目标事实上被分离，“人”的教育被简化为政治理论教育，由独立于教学系统之外的专门机构、组织和人员进行；这同时分离了曾由教师承担的“经师”和“人师”的双重职能。用政治教育取代价格教化和文化、道德教育，则抽空了学校教育的人文内涵。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断衰微。

50 年代初重建高等教育的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科学院落科研系统，从而取消了现代大学作为社会的科研中心的重要功能，造成教学与科

研成的脱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的科研十分薄弱，只具有单一原教学功能。

在大学内部，教学与科研的脱离是与理工分家、专业课与基础课脱离、实验室与考古室脱离的教学组织相连的。基础理论与专业教育，教学、科研和实验之间壁垒分明，各类人员功能单一，相当多的大学教师成为只事教学的“教书匠”。这必然导致高等学校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降低，以及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

教学与科研、专业与基础脱离的最大弊端，是造成学校与社会相脱离的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倾向。崇尚书本知识，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反映出这种教育结构中产生的教育后果和学术风气。很多人认识到，50年代初否定欧美式教育制度而移植苏联模式，不仅是由于政治气候和实现工业化的压力，也由于苏联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教育价值的某种相容性和一致性。理论脱离实际便是这种共性之一，虽然它们出自不同的途径和结构。

上述高等教育的弊端已经在 80 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和改革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矫正和改善。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克服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继续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从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与世界文明接轨和与现代生活合拍的新教育制度和教育文化。

国际主义战士——一级模范罗盛教

罗盛教，湖南省新化县相子村人，1931年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志愿军47军第141侦察队文书。他高举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昂首挺胸踏上了朝鲜的土地，一直向南急行军，迎接战火的洗礼。当年，他参加了阵地防御作战。

8月的一天，罗盛教与炊事班的同志到阵地送饭回来，美军发射的炮弹越过头顶，落在南映里和平村庄的土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炮声过后，罗盛教听到远处传来孩子的哭声。他冒着美军飞机的扫射轰炸，翻越一座山循哭声而去，在一个防空洞旁边，发现一个小孩子，正扑在一名妇女的胸脯上，边哭边叫着“阿妈妮”。那个孩子的身上、脸上、手上沾满了鲜红的血。母亲手里紧紧握住小锄把，背上的婴儿已经被炸得只剩下半截身子了。罗盛教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如此悲惨的景象，他脸色铁青，紧握拳头。此时，美军扔下的炮弹还在爆炸。他不顾一切，把孩子抱起来，交给附近的一位朝鲜老大爷。尔后，他回去安葬了那位朝鲜母亲和她的孩子。晚上，罗盛教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入睡……夜已经很深了，他打开手电筒，翻开日记本，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以后，希望你不要在我的身体面前停留，应当继续前进，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1952年1月，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风雪弥漫，气温降到零下2摄氏度以下。2日，一位朝鲜少年崔莹在栢沼河上滑冰，不慎摔倒，压破冰层，掉进2.7米深的冰窟窿里，一瞬间就没了顶。刚刚投弹训练归来的罗盛教见此情景，像接到战斗命令，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他边跑边脱掉棉衣，纵身跳进冰洞，潜入水底寻人。

在刺骨的冰水中，罗盛教一连两次沉入水底，摸到崔莹，几次用力把他托出水面，只因冰洞四周的冰层太薄，崔莹无法爬上去，又塌进冰水中。罗盛教第三次潜入水底摸住崔莹，双脚蹬着河底的碎石，使出最后一点力气，用头将崔莹顶出水面，战友赶来协助救出。崔莹得救了，罗盛教却被冲到远处的冰层下，再也没有出来。

罗盛教冰下救崔莹的消息传出后，石田里20多户群众像失去亲人一样痛哭不已，他们用朝鲜人民最隆重的葬礼安葬了罗盛教。劳动党里委员长指着冰封的栎沼河，声音颤抖地说：“在这条河里，志愿军为救我们的一个孩子献出最宝贵的生命；也在这条河里，美国侵略者用我们亲人的鲜血染红了河水。乡亲们，让我们世代都记住罗盛教的名字吧！”

1952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罗盛教追记特等功，追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同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授他为“模范青年团员”。1953年6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朝鲜政府和人民为了永远纪念罗盛教，将石田里改名为“罗盛教村”，将栎沼河改名为“罗盛教河”，将安葬烈士的佛体洞山改名为“罗盛教山”，山上修建了“罗盛教亭”和罗盛教纪念碑，碑上刻着金日成首相的亲笔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新中国培养出第一批全体女飞行员

新中国刚成立，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培养女飞行员的决策。1951年4月，第一批来自全国各

地的 55 名女学员被分配到牡丹江第七航校。它的前身是著名的“东北老航校”。当时航校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不仅营房是破旧的，就连使用的飞机也是破旧的，缺器材、少部件，只能是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共用一副轮胎。她们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理论学习和飞行训练。

1952 年 3 月 8 日，朱德委员长和其他中央首长在西郊机场参加了她们的试飞典礼。首都各界妇女代表 7000 余人，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以及中外记者云集北京西郊机场，观看女飞行员受阅起飞典礼。

下午 1 点 10 分，受阅的 6 架“里-2”飞机起飞，以整齐的跟进队形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中国姑娘飞上天啦！喜讯传到中南海。

3 月 24 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了第一批全体女飞行员。

5 点整，毛主席、周总理高大健壮的身影出现在门口。队伍里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毛主席神采奕奕，带着慈祥的笑容朝她们走来。敬爱的周总理高兴地给她们作介绍。她们尽情地鼓掌，热烈地欢呼。

毛主席慈爱地看着她们，问空军司令员：

“都成器吗？”

“成器。”空军司令员回答。

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坐下来，和她们一起照了像。

毛主席对大家说：“细妹子不简单，飞得好高啊！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当表演员。”

毛主席亲切的关怀，给予她们多大的鼓舞啊！

受阅典礼后，第一批女飞行员奉命组建新的航空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第一批女飞行员就英勇参战，执行空运任务。

烈火金刚——一级英雄邱少云

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1931年生于四川省铜梁县建乡的一个贫农家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牺牲前为第15军第29师第87团第9连战士。

1951年的春天，邱少云怀着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保卫和平的迫切心情从祖国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在朝鲜，他亲眼目睹了美国侵略者用飞机、大炮把大片的工厂、楼房炸成残墙断壁，使无辜的朝鲜人民遭受了灾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事实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侵略者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想卷土重来，使中朝两国人民再次受其剥削和压迫。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在平时的训练中，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苦练军事本领、军事技术，决心把自己锻炼成最坚强的革命战士。

1952年秋，上级命令邱少云所在的部队开赴平康前线，进入阵地。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个高地上驻有李承晚军的一个加强连，共170多人。周围布满了严密的火力网和密密麻麻的铁网，星罗棋布的地堡散布在它的周围，情况相当复杂。邱少云战斗小组来到阵地的右侧隐蔽下来后，他忽然觉得嗓子痒得厉害，就像有小老鼠抓挠一样，痛痒难忍。他使劲地咽唾液，没有效果；又用手巾紧紧捂住嘴，憋住气，直憋得

两眼发黑，泪水都流出来了，仍不见效果。此时如果能发声咳嗽是能够减轻痒的痛苦。但他深知自己是在执行侦察任务，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能因为自己而暴露目标，破坏整个侦察计划。他只好抓起带苦味的野草在嘴里咀嚼才强忍下来。几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敌人出现，连长命令继续往敌人阵地前沿运动，这时，敌人的几颗照明弹窜上天空，轻重机枪一起扫来，此时担任战斗小组组长的邱少云以火力掩护大家撤出。他带领战士李川虎用手榴弹、冲锋枪一起向敌人阵地猛打，虚张声势地高声喊：“冲啊！”这下敌人以为他们找到了目标，不仅轻机枪像暴风雨一般地扫射，火炮也出来凑热闹。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后才发现上了当，射击声停止。

1952年10月，抢攻391高地的战斗就要打响了。11日夜，担负潜伏任务的500余名指战员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一片有3000米开阔地的潜伏区。邱少云带领的爆破组，潜伏在距敌人前沿60米处一个小土坎旁边的蒿草丛中。他们透过草丛紧紧盯住敌人的阵地，聚精会神地观察将要爆破的目标，并已暗下决心，坚决完成潜伏任务，彻底消灭敌人。空旷的山野里听不到枪声，也听不到人声。500多名全副武装的志愿军战士在半人高的野草当中已度过了近10个小时了。整个潜伏区显得非常宁静。上午10点多钟，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个班的李承晚军从地堡里钻出来，朝山下走去。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潜伏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邱少云和同志们屏住呼吸，天地间的一切像凝固住了一样。这时，战友们用眼神互相鼓励着：“沉住气，不要冲动，一定要遵守纪律。”这时走在最前面的敌人突然发现山下埋伏着一片志愿军，顿时吓得两腿发软，砰砰

砰地扫了一梭子，扭头就往山顶上跑。当敌人跑到半山腰时，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声从志愿军阵地传出。炮火筑起一道火墙，截住了敌人的逃路，将敌人全歼在山腰间。

一场危机过去了，潜伏区又恢复了平静。中午12时，一颗燃烧弹在邱少云身边爆炸，燃烧液溅到了他的身上，立刻燃烧起来。首先烧着他腿部的伪装，顿时形成了火团把他紧紧包围起来。一股强烈的灼热使邱少云本能地抽动了一下，在他的身后就是一条流水的小沟，只要后退几步，在泥水中打个滚，就可以把火压灭，保住自己的生命。但他深知这样就会被山顶上的敌人发现。为了500多战友的生命安全，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他不惊慌，不呼救，坚定地趴在地上，咬紧牙关，巍然不动。眼看着邱少云被大火吞噬而不能去救，战友们的心像在滚开的油锅里煎熬。但此时，理智要求大家谁也不能动，这是考验革命战士组织纪律性的严峻时刻。他们在为邱少云担心、难过，同时也相信他一定能经受住考验。

火焰仍在邱少云身上翻滚，身上的棉袄渐渐地烧完了，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上滚下来，他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以顽强的意志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他紧握钢枪，坚强地抬起头来，看看同志们，仿佛在说：“首长，同志们，我邱少云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再大的困难，绝不屈服。”在烈火持续的燃烧中，邱少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表彰邱少云烈士的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顽强意志，志愿军总部于1952年11月6日给他追记特等功，并于1953年6月1日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

中国共产党志愿军总部委员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于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并将邱少云的名字刻在朝鲜金化西面的391高地石壁上，让英雄的名字与英雄的山岭共存不朽。

特级英雄--黄继光

四川省中江县人，1951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第2营通信员，1952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同年10月19日，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战役中，他挺身而出，请求炸掉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当进到距离火力点30-40米时，一位战友牺牲，一位负重伤，他的左臂被打穿。他忍受剧痛冒着敌机枪的疯狂射击继续前进，在匍匐前进接近敌火力点时连投几枚手雷，但未能将敌火力点全部炸毁。在身边已无弹药的情况下，他毅然纵身扑向敌火力点，舍身堵住了敌人机枪的射击，为反击部队迅速消灭了敌人，夺回了阵地。他壮烈牺牲，时年仅21岁。

根据他生前的申请和表现，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一级英雄--杨连第

天津县四区北仓村人，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铁道兵部队。曾在修复陇海铁路 8 号高桥时，机智勇敢地攀上 40 多米高的桥墩，提前完成修桥任务，荣获登高英雄的光荣称号，1950 年 9 月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同年 10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第 1 师第 1 团第 1 连任副连长。195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9 月出席了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团国庆节归国观礼代表团代表，并应邀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他在朝鲜人民的帮助下，曾多次出色地完成抢修铁路大桥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朝鲜前线的战斗。1951 年 7 月，在抢修清川江大桥是，他带领 1 个排 12 次搭设浮桥，并创造出钢轨架浮桥，保证了正桥施工，使几次中断的大桥顺利通车。1952 年 5 月 15 日，他在清川江大桥指挥连队架桥时，被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光荣牺牲，时年 33 岁。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他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连弟连。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使用细菌武器

1952 年 3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的声明》。

《声明》指出：美国侵略军自 1952 年 1 月 28 日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复自 2 月 29 日起至 3 月 5 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 68 批，448 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

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并对临江、长甸河口地区进行轰炸扫射。对美国政府这一最野蛮和最残暴的侵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宣布凡属侵入中国领空、使用细菌武器的美国空军人员，一经俘获，即行作为战争罪犯处理。同时声明，所有因侵犯我国领空、使用细菌武器、并滥施轰炸扫射、虐杀中国人民而招致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担负完全责任。

中国抗议美国残杀战俘

1952年5月7日，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美国 and 南朝鲜方面，对朝中战俘人员进行了多次屠杀。1952年2月18日，美国方面在巨济岛第62号俘虏营对朝中战俘进行屠杀，其中75人被打死，139人被打伤；3月13日，美军又对朝中战俘进行了一次屠杀；3月20日，美国方面又在朝鲜釜山战俘营进行了一起屠杀朝中被俘人员的大血案，有86人被打死打伤。出于反抗，朝中战俘5月7日扣留了美方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并对美方提出了抗议。对于美军及南朝鲜军队残酷屠杀战俘和对战俘实行非人道待遇一事，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提出了严重抗议。扣留杜德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军部司令李奇微公然声称要用武力屠杀朝中被俘人员。为此，在5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会上，朝中方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向美方提出严重警告，并斥责美方企图强行扣押朝中方被俘人员的行为。5月1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人道的“自愿遣返”和强迫甄别的血腥政策，全力支持我方被俘人员的正义要求。

关 闸 事 件

1952 年 7 月 15 日，发生在粤澳边界间的枪战纠纷，后来人们将这次纠纷命名为“关闸事件”，也就是何贤平生经历的五大风险中的第三次风险。

那时中国与葡萄牙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关闸。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 1574 年。那时的关闸，高和宽均有一丈余，像内地许多古迹城楼一样，楼前悬一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样。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碑石一方，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也立有围杆。这座古关闸，是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所以，那时的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为的仅是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 6 张封条封闭着。

直到 1849 年，关闸始终是中国四大海关之一。1849 年 3 月 13 日，葡萄牙人头目亚马勤逐走了管理海关的中国官员，并砍倒围杆，毁了关闸。这次事件，使中国在近代史上又蒙受了一次屈辱。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吧，过了一百年后，仍旧在关闸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葡中双方暴力冲突事件，不过结局大相径庭。这百年后的关闸事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充分体现出挺起腰杆的中国人在外事纷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泱泱大国风范，与百年前在此烙烫下的屈辱痕迹，形成鲜明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何贤事后对人回忆说，那时的澳门关闸，双方都设有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大家都各有四五个哨兵。在澳门西洋兵里，有个黑人兵，而解放军这边，

也有个年轻的小战士。

1952 年 7 月 15 日，这只不过是澳门边防线上很平常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名战士在关闸放哨，见到对方的葡兵有一个竟是黑人。那时的边防战士哪里像现在的拱北海关人员那么见多识广，战士们平时很少见到外国人，而对黑人大兵更是好奇，所以一个战士禁不住用手指点比划了一番，又对黑人士兵露出笑意。

倒霉的就是这一笑。对方误会了，以为我们的战士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黑人士兵怒骂，我方士兵也黑起脸，双方语言不通，却都能从对方的脸上读出愤怒和不友好。

“砰砰砰”！突然间，葡兵们一梭子弹飞了过来，我方立刻做出反应，向他们投去个手榴弹，以示警告。不料，对方火气升级了，又接连发出十多枚炮弹。一时间炮声隆隆，炮弹落在我方前线的民房上，几间民房眨眼间毁掉了……

关闸立刻关闭起来，双方人员都不得进出。可闭了关，澳门即刻变成死城，那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问题。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了。

澳督觉到事情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他们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罗保找到了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方法。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

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广州梅花村 30 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叶剑英华主持会议，就此事紧张地开会商讨对策。

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内地做传达，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中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邦交关系，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萄牙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上甘岭战役大捷

上甘岭，是朝鲜中部金化郡五圣山南麓一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经过 1952 年 10 月 14 日开始的一场激烈争夺战，名扬天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使得上甘岭成为一座丰碑！

第一战役背景

（一）朝鲜战争自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经过第一阶段八个月的运动战，沉重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歼敌二十三万余人，其中美军十一万五千余，几乎相当于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第一年伤亡人数五万八千人的 1.9 倍，美军物资消耗平均每月八十五万吨，几乎相当于同期美国对北约一年半军事援助的数量。战争中美军投入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海军的将近一半，空军的五分之一，还有英、法、澳等国的部分军队，这与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产生了

深刻矛盾。而且美国国内厌战、反战力量日渐增强，国际上要求迅速结束战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面临着军事、政治上的巨大压力，美国从 1951 年五六月间开始暂停全面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

而与此同时中国方面，经过五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志愿军入朝部队已达步兵十五个军，地面炮兵七个师，高射炮兵四个师，装甲兵一个师，七十七万余，加上朝鲜人民军三十四万，总兵力一百十一万余。但是在技术装备上还处于绝对劣势，特别是缺乏空中支援，难以保障后勤运输的畅通，而且美军通过八个月的战争已逐步了解志愿军的战术，熟悉了志愿军的作战特点，使得志愿军难以成建制的歼灭美军，因此适时改变了战略，决定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多山的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巩固运动战中所取得的成果，迫使美军尽早结束战争。

就这样双方都不约而同感到以现有力量和手段是无法将对方赶出朝鲜，从而在 1951 年 6 月上旬起进入了战争的第二阶段——以防御为主的阵地战。鉴于双方力量上的相对均势，军事上已不可能迅速解决战争，双方于 1951 年 7 月 10 日开始了停战谈判。从此就出现了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战略相持局面，在这一时期，双方都采取了战略上的总体防御，战术上的局部进攻，企图打破对方的防御，取得主动，以配合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异常尖锐、复杂、曲折的政治外交斗争，就形成了打打停停、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局面。上甘岭战役就是这期间一次著名的战役。

（二）

1952 年 4 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桧仓志愿军总部召开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决定将战略预备队第十五军调往中部战线，接替第二十六军在五圣山、斗流峰、西方山一线的防御。会议结束后，彭德怀特地留下了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叮嘱他：“五圣山是朝鲜中部的关键，失去了五圣山，我们在两百公里范围将无险可守。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对历史负责！”会后不久彭德怀就因头部肿瘤，回国治疗。志愿军司令员一职由副司令员陈赓代理。可以说，半年后的上甘岭之战是彭德怀在朝鲜部署的最后一战，战役胜利的辉煌中就闪烁着这位元帅在排兵布阵上的卓越才智。

五圣山，位于朝鲜中部，平康东南约 19 公里，金化以北约 5 公里处，海拔 1061.7 米，南面山脚下，有五个高地犹如张开的五指，在上甘岭战役中双方殊死争夺的 597.9 和 537.7 高地就是其中的拇指和食指。五圣山西侧，便是斗流峰和西方山，三山如唇齿相依，形成天然防线。如果斗流峰、西方山失守，五圣山就会陷入三面受敌的险境，要是五圣山失守，那斗流峰、西方山就失去依托，整个中部战线便有全线崩溃的危险。西方山以西，则是宽达八公里的平康谷地，几乎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如同是群山环抱中的天然走廊，从汉城到元山的铁路、公路横贯其间。完全可以这么说，五圣山、斗流峰和西方山一线，系战争与国家命运于一身，其重要性无可匹敌。

负责防守这一地区的志愿军第十五军，前身是 1947 年 8 月由太行军区地方部队组建而成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秦基伟任司令，黄镇任政委，下辖三个旅，约两万余人，武器装备很差，有些战士只有大刀，甚至

还有不少人是没有任何武器的徒手兵。组建不久就编入陈赓兵团，南渡黄河，兵进豫西，转战伏牛山脉，在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尤其是 1948 年 10 月在郑州战役中仅以 305 人的伤亡代价，全歼国民党第四十军 11207 人，缴获大量美械装备，一跃成为中原野战军中装备最好的纵队。1948 年 11 月参加淮海战役，先后参与了攻克宿县、任桥阻击和围歼黄维兵团等战斗，在战役中首创土工作业近迫战术，在攻击双堆集的十一个纵队中最先攻入黄维的兵团司令部，共歼敌 8500 余。1949 年 2 月整编为第十五军，属二野第四兵团建制，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下辖三个师，全军约四万余人。1949 年 4 月作为二野渡江先遣军，在安徽望江县仅用五十分钟就突破长江防线，随即沿浙赣线飞兵疾进，横扫闽浙赣。尔后又接连参加广东、广西战役，席卷两广。在向大西南的战略进军中，长途行军 1300 公里，解放云南。1950 年 4 月起经半年多剿匪作战，基本肃清西南地区方圆五百公里范围内的股匪。三年半的战争将这支原来只不过是枪老兵新跑龙套的偏师，锤炼成一支兵强马壮的虎贲之师。

1951 年 3 月，由于第十五军一直在进行剿匪作战，战备程度高，士气旺盛，又没有担负地方建设任务，就作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参战。此时，军辖第二十九、四十四和四十五共三个师，（原辖第四十三师 1950 年 12 月改为云南昭通军区，另将原第十军第二十九师编入）全军约五万余人。入朝后，即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战役第一阶段，歼灭美军第二师三十八团大部 and 第三师一部，取得了不小的战绩。在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的撤退被美军的反击打乱，局势异常险恶，因连日恶战减员

高达 1.5 万，伤亡几乎三分之一的第十五军，被紧急调往南芝浦里地区实施防御，以阻止美军的快速推进，掩护友邻重新集结部署。在缺粮少弹的困难情况下，在角屹峰、朴达峰一线组织防御，抗击着美军在绝对炮火优势下的猛攻，战斗极其艰苦卓绝，阵地几度易手，每个阵地上都多次发生惨烈的白刃肉搏，十五军殊死恶战整整十昼夜，以 2000 人伤亡的代价，歼敌 5700 人，坚守住了阵地。对战线的稳定，粉碎美军行进间占领铁原、金化，切断东线志愿军退路的企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后，彭德怀满怀激情地致电十五军：“我十分感谢你们！”在彭德怀数十年军事生涯中，这样充溢着感情色彩的电报是非常罕见的，十五军在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由此可见一斑。战役结束后，元气大伤的十五军作为战略预备队，调往后方休整长达九个月，其间先后补充了 8000 老兵和 9000 新兵，恢复了元气。

十五军的军长秦基伟，湖北黄安人，（黄安因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出现过六十一位 1955 年授衔的将军，是出将军最多的县，有着“将军县”的美誉，并于 1952 年改称红安），1914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十岁亡母十一岁丧父而沦为孤儿，1927 年十三岁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9 年参加红军，因作战勇敢不到一年就升为排长，后历任第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二七四团团团长、红四方面军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在悲壮的西路军打通河西走廊战役中，他被俘后历经千辛万苦逃脱，回到刘伯承指挥的援西军部队驻地。抗战爆发后，跟随刘伯承挺进敌后，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秦赖游击支队司令、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太行

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等职。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太行军区司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二野第十五军军长。在数十年的战争中，他以作战中善于思考爱动脑筋而著称。朝鲜战争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昆明军区副司令、司令、成都军区司令、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国防部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接受了防御五圣山地区的任务后，秦基伟根据战争发展的形势，经深思熟虑提出了积极防御，持久防御的指导方针，要求建立起突不破的防线。但这一想法，在军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却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这主要是在长期国内战争中，习惯于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除了一些必要的阻击战外，基本不进行阵地防御战，使指挥员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思路比较狭窄，缺乏创造性。而在朝鲜战场上，山地连绵，地形狭窄，不便于部队迂回穿插，展开运动战。但面对美军的优势炮火组织防御战，如何坚守则是一大难题。军参谋长张蕴钰，知识分子出身，虽然抗战时期才参加革命，但在不长的战争经历中，就以熟知兵法善思敏行而见长，被秦基伟多次称赞为“我的好参谋长”，后来历任旅大防卫区副参谋长、第三兵团参谋长、导弹实验基地第一任司令、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创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 年被授予大校，1962 年晋升少将。——他认为没有认真准备的进攻，未打就先输了一半。我军火力正逐步得到加强，再依托有利地形和坑道工事，强大的后备力量，应该可以组织起有效防御。反击争夺，只是一种辅助战术和手段，而不应是主导方针。美军尽管具有

火力优势，但后备兵力严重不足，其在亚洲只有驻日本的两个师，美国本土也只剩六个半师，经不起阵地战的大量消耗，而且攻击精神也差，这些弱点决定了阵地防御战是可以行得通的。经过讨论，十五军终于确定了“寸土不让，坚决固守”的作战指导思想。

1952 年 4 月 20 日，十五军接管了第二十六军东起五圣山，西至斗流峰、西方山，正面宽约 30 公里，纵深约 20 公里，总面积 567 平方公里的防区。十五军进入防地后，立即开始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式防御工事，至 8 月，共构筑了 300 余条坑道，总长达 9000 米；堑壕、交通壕 50000 余米；反坦克壕四道；铺设鹿砦、铁丝网 5000 余米。——如此浩大的战场工程，是因为面对美军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没有制空权，地面炮火也很少的志愿军，坑道是唯一可行的山地防御选择。我们在谈及上甘岭的辉煌胜利时，不能忘却，这种无奈的创造，苦涩的选择，显露的是中华民族在科技、工业上的落后。此种落后，使得双方在装备上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十五军全军配属火炮为 5 门 122 毫米榴弹炮、24 门 75 毫米山炮、36 门 90 毫米加农炮和 12 门 57 毫米无后坐力炮，步兵随伴火炮为 12 门 120 毫米迫击炮、54 门 82 毫米迫击炮、162 门 60 毫米迫击炮和 144 门 37 毫米步兵炮，而当面美军第七师一个师就拥有 6 门 114 毫米多管火箭炮、24 门 155 毫米榴弹炮、72 门 105 毫米榴弹炮、36 门 107 毫米迫击炮，步兵随伴火炮为 54 门 81 毫米迫击炮、54 门 75 毫米无后坐力炮、81 门 60 毫米迫击炮；步兵武器由于十五军是第二批入朝部队，向苏联定购的装备已经到达，所以除了少数成色新性能好的武器外，其余都更新为苏式装备，步兵使用的轻武器中步枪与冲锋

枪各占一半，还属于是志愿军中装备好的，与美军相比以步兵连为例：十五军第四十四师一三零团四连，全连齐射，平均每秒每米正面可发射 2.32 发子弹，没有炮弹发射量；美七师第十七团 I 连，全连齐射，平均每秒每米正面共可发射 22.62 发子弹和 0.45 发炮弹，火力对比可谓悬殊！正是这种落后，让日后在上甘岭浴血苦战的优秀儿女付出了更大的牺牲和苦难。

十五军在进行构筑工事的同时，还利用五圣山地区地形复杂，林深草密的特点，开展称为“冷枪冷炮运动”的狙击活动。挑选优秀射手，以步枪、轻重机枪、单炮或单辆坦克，依托阵地采取固定或游击方式狙击敌方暴露目标，通过这种有组织的狙击，巩固阵地，消耗敌军，打击敌方士气。十五军在四个月的冷枪冷炮运动中歼敌高达 19982 人，其中一三五团歼敌就达 2000 余人，该团六连所防守的 537.7 高地，就因此被美军满怀恐惧地称之为“狙击兵岭”。

（三）

美国陆军上将马修·李奇微于 1950 年 12 月接替因在第二次战役撤退中遭遇车祸身亡的沃克中将，出任美军在朝鲜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 1917 年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在二战中担任美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参加过西西里、意大利和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的空降作战，战功卓著而升任第十八空降军军长，指挥美军在欧洲的所有空降部队，并被内定为对日本本土实施空降战役的指挥。战后，历任地中海战区司令、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美国代表、加勒比海战区司令和美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以诚实、机敏、富有攻击性而著称。1951 年 4 月，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兼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的美军五星

上将麦克阿瑟，因为桀骜不驯，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而被杜鲁门总统免去所有职务。李奇微随即接任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这位伞兵出身的上将“注册商标”就是乘坐敞蓬吉普视察前线，野战服的胸前挂钩上总悬着两枚甜瓜手榴弹，衣领上四颗耀眼将星的旁边总缀着伞兵徽，他解释说乘坐敞蓬吉普一是为了让士兵们能一眼看到他，知道他们的最高长官与他们在一起，从而鼓舞士气；二来有蓬汽车给人以虚假的安全感，谁都知道帆布或铁皮车蓬是根本挡不住枪弹，那还不如坐敞蓬车让人保持警惕和清醒。而随身携带手榴弹只是为了在多埋伏多战场陷阱的朝鲜，遇到危急时用以自卫。

李奇微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则由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接任，范佛里特 1915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比李奇微还早了两届，他所在的这届学员壮年之时正逢二战，全班 164 人有 59 人成为将军，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两位五星上将，被誉为“将军班”，而在军校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范佛里特却是仕途坎坷，这是因为一向以知人善任而闻名的美军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把他当作了另一个以酗酒成性而闻名的范佛里特，据说这是马歇尔在人事任免上的唯一差错。直到二战后期的诺曼底登陆时，他还只是第二十九步兵师的团长，因为师长在战斗中指挥无方，他才被指定代理师长职务，这才显露出他出色的军事才华，历任师长、军长。二战刚结束就被派往希腊，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肃清了人数多达十万的共产党武装，从而声名鹊起。他被认为是山地战专家，而且就像是专为战争而生的军人，极富军事才干，只是稍微欠缺一点政治头脑。在第八集团军司令一职上任伊始，就以坚决有利的反击，给刚结束第五次战役的志愿

军来了个下马威。他还是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极力主张以猛烈火力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减少己方的损失，在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1951 年 8 月夏季攻势中，对 983 高地的攻击时，九天中仅消耗的炮弹就高达 36 万发，平均每门炮每天 350 发，也就使得以后如此高的弹药消耗量被称为“范佛里特弹药量”。但在对 7731 高地和 851 高地的进攻中，损失惨重而毫无收获，使这两个高地被形象地称为“血岭”和“伤心岭”。

1951 年 8 月末，范佛里特提出了代号为“猛禽之爪”的作战计划，企图在元山实施登陆，攻击中朝军队的侧后，协同正面战线的部队取得突破。李奇微认为该计划规模之大，凭美军在朝鲜的现有兵力根本无法实施，而且发动这样作战将使刚开始的停战谈判彻底破裂，有引起战争升级的危险，当即予以否决。

1951 年 9 月，范佛里特又向李奇微提交代号“说服”的作战方案，计划以两个师在库底登陆，正面部队同时发起攻击，将战线推至平康——淮阳——库底一线。同时上报的还有第一军军长奥丹尼尔少将拟订的代号“指令”方案，作为后备方案。李奇微认为实施“说服”作战，极有可能会引发对平康——铁原——金化三角地区的争夺，战争的发展将会失去控制。而“指令”方案只攻击正面战线上的一些前沿阵地，既不会引发大规模战斗，又较容易达到目的。所以就批准了“指令”计划，范佛里特根据这一计划，于 10 月底发动了秋季有限目标的局部攻势，仍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1951 年 12 月，范佛里特的长子小范佛里特空军中校，在驾机轰炸物开里地区时被击落，生死不明。从此后，范佛里特报仇心切，攻击欲望惊人之强。1952 年 3

月，又向李奇微提出了以平康地区为目标的“还乡”作战计划，李奇微考虑到停战谈判刚有进展，此时发动攻势有点不合时宜，拒绝了这一计划。

1952 年 4 月，范佛里特制定了进攻西方山的“筷子 6 号”和攻击南江河地区的“筷子 16 号”作战方案，一起呈交李奇微。李奇微基本同意了“筷子 6 号”，但同时提出了两个附加条件，一是只动用韩国军队，而不使用美军；二是在进攻发起前必须要经过批准。但就在即将发动攻击前夕，5 月 7 日巨济岛战俘营的中朝战俘扣押了战俘营最高指挥杜德少将，以抗议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在这种情形下，李奇微只得将“筷子 6 号”计划无限期延迟。

1952 年 6 月，艾森豪威尔为参加总统竞选辞去欧洲盟军总司令，这一遗缺就由李奇微接任。而李奇微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兼远东战区总司令一职则由陆军野战部队司令克拉克上将担任。克拉克出身于军人世家，1917 年毕业于西点，是李奇微的同学，1942 年任北非盟军副总司令，参与指挥了北非战役；1944 年担任第五集团军司令，全权指挥盟军在意大利地区的作战，此时，李奇微任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还在他的指挥下；二战后，作为奥地利驻军司令兼高级专员，代表美国与苏联的科涅夫元帅就奥地利的中立问题，进行过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谈判。——选择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兼远东战区总司令，就是因为他有过与共产党国家谈判的经历与经验。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比较具有政治头脑，处事也谨慎。所以他一上任就拒绝了范佛里特提出的攻击平康谷地的计划。

1952 年 9 月，范佛里特又提出了代号“摊牌”行动

的“金化攻势”，攻击三角形山和狙击兵岭两个高地（即 597.9 和 537.7 高地）的方案，克拉克觉得这一计划攻击目标有限，估计只需出动两个营就可实现，加之停战谈判僵持不下，也确有必要在战场上有所动作，就同意了这一计划。

第二战役经过

（一）

1952 年 10 月志愿军十五军在五圣山一线的部署是：第四十四师并第二十九师的第八十七团，共四个步兵团、七个炮兵营和一个坦克团为右翼，各团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成 L 形部署于平康谷地东侧，与第三十八军防区相接；第四十五师三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营凭五圣山之险，防守左翼；第二十九军的第八十五、八十六团为军预备队。从这一部署上可以看出，秦基伟是把无险可据的平康谷地作为防御重点，不仅准备了绝大部分的炮火，而且所使用的步兵第四十四师，是十五军的主力师。与十五军相邻的第三十八军则是志愿军野战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因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赫赫战功而被誉为“万岁军”，这两个主力军联手防守平康谷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五圣山一线，山高坡陡，地形复杂，一般人都认为美军会选择这里发动攻势，相对所部署的兵力火力都少一些。熟悉十五军的人，还可以看出秦基伟排兵布阵是颇费苦心的，四十四师以野战攻坚见长，部署在地形平坦的平原地区；四十五师擅长防御，解放战争中曾多次出色完成阻击防御任务：1947 年 10 月在进击豫陕鄂边的作战中该师阻击国民党军精锐部队整编第三师二十余小时，为主力围歼敌第五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1948 年 3 月的洛阳战役中，该师阻击国民党军五大王牌

之一的第十八军,在敌猛烈炮火甚至使用毒气的情况下,坚守阵地达两昼夜之久,未丢失一处阵地,为总攻洛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48年10月郑州战役中,正是该师的一个团在薛岗以少敌众阻击北撤的国民党第四十军,一直坚持到主力赶到,才有了全歼四十军的辉煌战绩。入朝后,在五次战役中打出了堪称典范的朴达峰阻击战。——现在被安排在地势险要的五圣山,这样的部署可谓万无一失。

1952年9月,志愿军根据种种迹象分析,美军将在9、10月间发动较大规模的攻势,以配合停战谈判,施加军事压力。但对美军具体攻击目标,仍不得而知。原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接替回国出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决定先发制人,先敌发动进攻,打乱美军的计划。以正面八个军,从9月18日起,各自选择当面之敌三至五个目标,发动战术性进攻。根据这一命令,十五军四十四师以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和391高地东北无名高地为目标,四十五师则选择注字洞南山为目标。而即将成为美军攻击目标的597.9和537.7高地分别只有一个加强连和一个连的兵力防守,对美军的攻势一无所知。其实,早从8月起,五圣山一线美军就出现过许多不同寻常的行动,范佛里特和美韩军的军、师长来到五圣山对面的金化地区视察多达五次;而美韩军各级团、营、连长抵近597.9和537.7高地观察地形更是难以计数;美军工兵部队和劳工日夜施工,拓宽五圣山正面雄鸡山一带的公路。进入10月美军在金化公路终日施放烟幕,掩盖庞大车队的繁忙运输,仅观察到的就有25万辆次,平均每日高达2100辆次,以每辆汽车运输物资2.5吨计算,总运输量达62.5万吨;在五圣山

上空活动的侦察机架次明显增多；美韩军的小股部队出击次数也非常频繁，很显然是在进行总攻前的试探性攻击；五圣山正面美韩军的炮火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并开始有计划地逐步摧毁五圣山一线的志愿军防御工事；四十五师前沿阵地连续有三名哨兵被敌捕去；10月5日更有韩二师三十二团一个名叫李吉求的上尉参谋向四十五师投诚，报告韩二师即将和美军共同发起对五圣山的攻击。这么多如此显而易见的征兆，却都没有引起志愿军足够的重视，这主要是上至志愿军总部、第三兵团，下到十五军、四十五师各级指挥员都认为如果美军发动攻击，最大可能就是在平康谷地，那里地势平坦开阔，又有公路、铁路，最有利于美军发挥其机械化和炮火优势，而五圣山地区，山高坡陡，加上地形狭窄，无法展开大兵团，也无从发挥美军的优势，自然美军不会选择这里攻击。这种思想是如此普遍和固执，直到10月7日晚四十五师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与会者还一致认为美军最有可能的攻击方向是平康谷地，所以四十五师的重点是准备对注字洞南山的战术反击。

10月8日，在板门店举行的停战谈判会场上，美方首席代表哈里斯单方面宣布无限制休会，率领美韩代表团退出会场。同一天，克拉克正式批准了“摊牌”作战方案。范佛里特立即赶赴美第九军军部，连夜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10月9日，美第九军根据作战会议的精神下达了预先作战号令：夺取三角形山和狙击兵岭（即597.9和537.7高地），将战线前推；美第七师以不超过一个营的兵力，攻击三角形山；韩第二师以不超过一个营的兵力，攻击狙击兵岭。

10 月 13 日，范佛里特确定总攻开始时间为 14 日凌晨四时。当天午夜，美韩军的攻击部队进入出发阵地。

(二)

根据志愿军作战条令规定，军以下规模作战称为战斗，所以战斗开始后被称为 597.9 和 537.7 高地战斗。这两个高地后面的山洼里有个才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上甘岭。一年多前，志愿军还在这个小村庄里召开过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研究第五次战役。但经过五次战役双方拉锯激战，上甘岭村庄已成为一片废墟，只是作为一个地名，出现在地图上。直到二十多天后，战斗发展到了战役规模，才以这个村名将此次战役命名为上甘岭战役。

597.9 高地由东北和西北两条山梁组成，好象英文字母 V，又像是个三角形，所以被美军形象地称之为三角形山，共分为十二个阵地，东北山梁上依次是 2 号、8 号和 1 号阵地，2 号阵地的左前方有个小山梁，上面就是整个高地的最前沿 11 号阵地；西北山梁上依次是 6 号、5 号、4 号和 0 号阵地；高地主峰则是 3 号阵地，主峰前面的突出部是 9 号阵地，9 号阵地的右后方是 10 号阵地，左后方是 7 号阵地。其中 9 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位置非常重要，日后成为双方殊死争夺的目标。防守此地的是第一三五团的九连和八连的一个排，为一个加强连的兵力。

537.7 高地是两个南北相对形同驼峰的山岭，南山被美军占领，北山则在志愿军手中，（应确切称之为 537.7 高地北山，本文简称为 537.7 高地，下同）上面有九个阵地，组成一个不规则的十字形，从西到东依次是 9 号、3 号、4 号、5 号和 6 号阵地；由南到北依次是

1 号、2 号、7 号和 8 号阵地，其中 8 号阵地是最前沿的突出部。整个北山高地由第一三五团一连防守。

10 月 14 日四时，美韩军以 320 门大口径火炮、47 辆坦克、50 余架飞机对十五军 30 公里防御正面开始火力准备，其中对五圣山前沿 597.9 和 537.7 高地的轰击特别猛烈，使用了 300 门火炮、27 辆坦克和 40 架飞机，火力密度高达每秒落弹六发。如此猛烈的炮火，使得在坑道中的志愿军守备部队觉得简直就像是乘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颠簸，强烈的冲击波激荡着坑道，不少人牙齿都磕破了舌头、嘴唇，甚至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小战士被活活震死！幸存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不约而同以地狱来形容，其恐怖由此可见。——十五军四个多月苦心修筑的野战防御工事在如此炽烈的炮火下荡然无存！

坑道里的守备部队步话机在炮击刚开始就立即呼叫千米之外的 448 高地营指挥所，但炮火实在太猛烈，步话机的天线刚刚架起，就被炸掉，在短短几分钟里，坑道里储备的十三根天线全数被炸毁，仍无法与指挥所沟通联系。而电话线更是被炮火炸得不成样子。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冒着铺天盖地的炮火前去查线，他一路上边躲避炮火，边接上断线，随身携带的整整一大卷电话线用完，还差了一截！已经多处负伤的牛保才来不及多考虑一手抓起一头断线，用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线路，用生命换来了三分种的通话时间，在营指挥所的一三五团副团长王凤书就在这宝贵的三分钟里向坑道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炮火也同时惊醒了位于四公里外真菜洞的四十五师师部，当时四十五师只有师长崔建功在指挥岗位，师政

委聂济峰正在三兵团政治部学习，副师长唐万成则在基层部队检查工作，参谋长崔星回国参加国庆观礼还没回来。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师部与前线部队的联系完全中断，对敌情我情一无所知，崔建功只得命令师侦察连派人去前线了解情况，第一批人在半路上牺牲了，第二批两个人几经周折终于来到 597.9 高地的 5 号阵地，此时阵地上只剩下一个战士了，美军正蜂拥而来，他俩毫不犹豫立即投入战斗……。师部知道具体情况已经是 14 日的黄昏了。

十五军军部设在上甘岭以北二十多公里的道德洞，14 日一天军部只知道美韩军对四十五师正面五圣山前沿的 597.9 和 537.7 高地、二十九师和四十四师正面的 391 高地、芝村南山、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419 高地都发动了攻击，其他具体情况一无所知，秦基伟只好命令五圣山侧翼的观察所每半小时报告一次情况，同时请求左右邻的三十八军和十二军通报各自正面的情况。秦基伟认为当面美韩军只有美第七师和韩第二师，共两个师的兵力，单以这两个师的兵力是不可能同时攻击几个方向的，其中必然只有一个是主攻方向，其他则是牵制性的佯攻，但要立即判断出哪个是主攻，现在根本无法做到，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就在各级指挥员心急如焚的时候，上甘岭的战斗全面展开了！五时，美军经过一小时炮火准备后，开始火力延伸以压制纵深目标。同时，步兵开始冲锋，最先与美军接火的是九连 597.9 高地 11 号前哨阵地上的一个班，但班长使用兵力不当，一下就把全班投入了战斗，在美军猛烈炮火下，很快蒙受了巨大伤亡，等打退美军四次冲锋后，就只剩下一个战士了，他只好退入坑道坚

持战斗。防守 2 号阵地的八连一排见 11 号阵地失守，排长立即组织两个班前去反击，力求乘敌立足未稳夺回阵地，但这两个班在半路上就遭到了美军炮火覆盖射击，只剩五个伤员被迫退回 2 号阵地，这样一来，一排反击未成，反而损失兵力大半，连防守 2 号阵地都很困难了，十一时许，2 号阵地就因守备兵力伤亡殆尽而告失守。东南的 7 号阵地因此陷入孤立，随即也被美军占领。只有最关键的 9 号阵地，由九连副指导员秦庚武指挥三排防守，秦庚武见美军炮火异常猛烈，如果在阵地上一下投入兵力越多，那么伤亡也就越多越快，所以他只在表面阵地上同时投入三个人，伤亡一个就从坑道里补充一个，打得从容不迫，9 号阵地因此成为 597.9 高地的中流砥柱，始终顶住了美军的进攻。9 号阵地是主峰的门户，位置极其重要，只要 9 号阵地不失，那么 597.9 高地就可保无忧。经一上午的激战，美军攻击部队七师三十一团的二营、三营损失均超过了 70%，美军比较忌讳部队成建制消耗，就未敢再使用一营，将三十一团撤下去休整，换上第三十二团接着再战，一直打到黄昏，也未能攻下 597.9 高地。

537.7 高地上，也同时遭到了攻击，韩军第二师三十二团以一个营分三路发动猛攻，守备部队一连依托被炮火严重摧毁的阵地英勇坚守，战斗之顽强被韩军战史称为史无前例，韩军地面部队攻击连连被击退，只得召唤美军的航空兵火力支援，美军出动了二十余架 B—26 轰炸机投掷凝固汽油弹，阵地成为一片火海，韩军乘势猛攻，最前沿的 8 号阵地只剩下三个伤员，无力再战，正准备退入坑道，却被已经冲上阵地的韩军的一挺机枪压制在离坑道口十余米处，这挺机枪附近正巧是因多处

负伤而昏迷的孙子明，他被枪声惊醒，看到这情景，大吼一声扑了过去，韩军的机枪手猝不及防被吓得魂飞天外，掉头就逃，孙子明刚想把机枪掉过头去射击，另外一股十多个敌人已经涌了上来，他见来不及开火，一把抓起身边的三颗手榴弹，朝着这股敌人扑去，与敌同归于尽，他也就成为在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三十八个勇士中的第一人！直到十二时许，经过了七个多小时的激战，韩军攻上了主阵地，再经过二十多分钟惨烈无比的白刃肉搏，才占领了阵地。至下午二时，一连仅存二十余人，退守坑道，537.7高地除9号阵地外的其余表面阵地都告失守。

九连和一连在激烈的战斗中，将战前储备的弹药消耗殆尽，共发射了近四十万发子弹，投掷手榴弹、手雷近万枚，由于长时间高强度持续射击，武器损耗也非常惊人，总共打坏10挺苏式转盘机枪、62支冲锋枪、90支步枪，占全部武器的80%以上！——战况之激烈，可见一二。

黄昏时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得知在白天战斗中失去了一半的表面阵地，立即命令一三五团团团长张信元连夜组织反击，夺回阵地。并让二线的一三四团团团长刘占华即刻赶到师部，熟悉情况，准备参战。

美韩军占领阵地后，因为战斗激烈异常，官兵都疲惫不堪，也没时间构筑工事，只是用麻包简单地筑起了一些临时野战火力点。志愿军的反击部队共四个连，太阳落山后就准备完毕，进入攻击出发位置，十九时在没有任何炮火掩护下发起进攻，原计划采取偷袭，但被美军发觉，随即改为强攻，美韩军立足未稳，顶不住志愿军生力军的冲击，经二个多小时的鏖战，反击部队就将

白天失去的阵地全数收复。在这场夜间反击中，又有两个都是排长的孙占元和粟振林，身负重伤后，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为了永志纪念，粟振林烈士的家乡河南林县将县城南关街命名为振林街。孙占元被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追授“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金星勋和一级国旗勋。

当晚十时，四十五师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讨论调整部署事宜。会上决定：报请军部批准，暂停对注字洞南山的反击，将为反击而储备的所有弹药、补给、器材，于 15 日二十一时前全部转用于上甘岭方向；为避免上甘岭两高地因部队建制过多而引起指挥上的混乱，由一三五团团团长张信元指挥 597.9 高地作战，由一三三团团团长孙家贵指挥 537.7 高地作战；炮兵由副师长唐万成和十五军炮兵副主任靳钟统一指挥；一三四团为二梯队，尽快完成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加入战斗；为便于指挥，团师各级指挥部重新展开，一三三团团部前移至上所里北山，一三四团和一三五团组成五圣山联合指挥所，师部前移到德山岷。

在第一天的战斗中，美韩军共投入了七个步兵营和十八个炮兵营，飞机五十余架，两百余架次，消耗炮弹三十余万发，航空炸弹五百余颗，两个面积仅 3.7 平方公里的高地，在如此罕见的猛烈炮火轰击下，原本长满枝繁叶茂的树木，被炸成寸草不剩的光山，而且山头的岩石被整整削去了两米！坚实的土层全都成为粉尘状的虚土！根本来不及散去的硝烟完全遮蔽了太阳，使得很多幸存者都认为那个晴朗的日子是个阴天！而十五军四十五师在这两个高地的守备兵力仅两个连又一个排，加上全力准备反击注字洞南山，支援上甘岭方向的火炮只

有 3 门 105 毫米榴弹炮、6 门 75 毫米山炮、6 门 90 毫米加农炮和 12 门迫击炮，根本无法与美军 300 余门大口径重炮抗衡，几乎是纯步兵作战，而且由于美军的炮火封锁，守备部队与后方联系中断，又得不到任何增援，就是在这样的兵力火力对比极端悬殊、后勤补给极端困难情况下，以伤亡 550 人的代价，打退了美韩军数十次的进攻，并通过夜间反击夺回了白天丢失的阵地，使美韩军付出了高达 1900 余人的死伤一无所得！

15 日，美韩军再度猛攻，又是一整天的残酷恶战，日落时分，美第七师终于拿下了 597.9 高地西北山梁上的 6 号、5 号、4 号、0 号阵地和主峰，韩第二师也占领了 537.7 高地大部分阵地。——直到此时，上甘岭的战斗已持续了两天，志愿军还没有判明美军的作战企图。志愿军总部虽在当天下午致电十五军，但那是十五军 13 日上报的反击注字洞南山计划的答复，指示根据其他部队的经验，反击敌营以上部队据守的阵地，代价太大，而且因敌兵力较多抵抗也激烈，战斗不易迅速解决，故对注字洞南山的反击暂不进行为宜。电文中只字未提上甘岭战斗，因此完全可以说，经过两天的激战，志愿军总部首长还没有意识到在上甘岭是美军的主攻方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美军此次“金化攻势”准备之充分，战略之狡诈。

秦基伟两天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激烈战斗，与前线的联络全部中断，具体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即使报上来的战报，也多有不确之处。就在这种情况下，秦基伟一直在苦苦考虑范佛里特的作战企图到底是什么？凭当面美军现有兵力不可能同时进攻五圣山和西方山两个方向，到底哪个方向是主攻呢？当 15 日除上甘岭仍在继续

激战外，其余地区美军的进攻被击退后都逐渐平息了。久经战阵的秦基伟就从这个迹象中察觉到了蛛丝马迹，——平康谷地地势平坦，便于美军发挥其机械化优势大举突击，但攻击部队侧翼暴露在十五军和十二军的火力威胁下。而在五圣山地区，由于 597.9 和 537.7 高地是整个战线的突出部，没有侧翼遭受攻击的后顾之忧，距美军占领的鸡雄山又很近，能够得到直接支援，其后方的金化地区交通发达，物资和人员的机动都极为便利。一旦攻下五圣山，则西方山也就失去了屏障，自然唾手可得，而且五圣山地势险要，志愿军根本不会想到美军会从这发里起进攻，可以收到出其不意之效。西方山一带部署着志愿军的精锐之师，五圣山一线则是相对较弱的部队，又可以避实击虚。

尽管秦基伟已经敏锐地判断出了美军的主攻方向，但他始终对平康谷地放心不下，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一直认为范佛里特极有可能还有一手，那就是当十五军调动在西方山的部队后，范佛里特就会利用美军机动能力强的特点，迅速撤出在五圣山的部队，再迅速投入西方山，这样的话，胜负就难以预料了。所以，在以后的战斗中，不管局势如何困难，他始终不肯动用在西方山四十四师的一兵一卒。

16 日，美韩军继续猛攻不止，四十五师先后已有 15 个连投入战斗，秦基伟当即决定，四十五师改为主攻，四十四师则改为助攻；军、师组织火炮向上甘岭机动，并组成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建立后方供应机构，加强后勤保障，除原先储备的弹药外，另为一线部队每连增加配备 8000 枚手榴弹，三个月的补给品储备量，并积极组织向坑道补充弹药、食物和饮水。

四十五师，这支长期充当配角跑龙套的部队终于得到了补偿，在这样一场举世罕见的大战中当一回主角。无论在范佛里特还是秦基伟眼里，四十五师都比四十四师要弱，但这是从两个师攻击力上的对比，四十五师由于长期作为偏师，经常为保障主力攻击而担负阻击防御任务，有着丰富的防御战经验，形成了顽强坚韧寸土必争的战斗作风，在这一点上，范佛里特无疑是选错了对手。现任师长崔建功，1915 年出生在河北魏县的一个家道中落的进士家庭，1934 年为家事愤而出走，在汉口投军参加了东北军的第一零九师，1935 年在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俘虏，随即参加了红军，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政治部敌工干事，抗日战争中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敌工股股长、营教导员、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政委。直到 1945 年 10 月，解放战争刚开始的邯郸战役中，因太行军区七分区司令张廷发在战斗中负伤，临时指定他来指挥，这一仗他尽展其指挥才干，率部坚守阵地两天两夜，将敌援军击退。——当晚就被刘伯承任命为七分区代理司令，从此就由政工改行，成为指挥作战的军事主官，后历任副旅长、旅长、师长。朝鲜战争结束，回国后历任副军长、昆明军区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同一天，美军还在朝鲜东海岸的通川库组织了大规模两栖登陆演习，造成侧翼登陆突击的姿态，以吸引志愿军的注意力，分散牵制志愿军的力量。

17 日，战斗进入第四天，越来越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阵地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高地。由于战场地域狭窄，最多只能展开两

个营的部队，双方只能采取逐次增兵的战术，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一个班的投入作战。这天，韩军第二师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志愿军在阵地上挖有坑道。这是四十五师的一个火线运输员送弹药时，因为连日炮火轰击，地形地貌完全改变，他在阵地上寻找坑道口时被韩军俘虏，他在审讯中随口说我们挖有坑道，你们打炮就躲进去，打完炮再出来。也许他觉得这不算什么秘密，但却解决了美韩军几天来一直困惑不解的难题：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怎么还会有人生存下来？对此美韩军极为重视，特意派韩二师的中校情报参谋带了精干侦察人员前往核实，这才搞清楚，志愿军果然利用坑道对付炮火轰击。

18 日，美第七师和韩第二师出动番号同为第十七团的部队，依托已占阵地，进行强力扩张。美第十七团参加过二战，曾在太平洋上与日军激战，建立过累累功勋；韩第十七团则是韩军最精锐的部队，长期作为韩军唯一的机动打击部队，配属美军参加过多次重要战斗，颇得美军的赞赏。在这两支劲旅的全力攻击下，四十五师守备部队虽拼死抵抗，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济，被迫退入坑道坚持作战。上甘岭表面阵地开战以来，第一次全部失守！

五个昼夜的血战，四十五师投入的兵力已多达近二十个连，这些部队经过激战，最多的不过三十人，最少的还不足十人。崔建功和刚从第三兵团政治部学习赶回来的政委聂济峰商议了战况，决定在 19 日晚倾注全力，将一直没舍得使用的七个连尽数投入，争取一举夺回阵地。为了避免白天运动时遭到敌炮火杀伤，参加反击的七个连除作为预备队的一个连外，其余六个连于 18 日晚

连夜就向上甘岭运动，崔建功特意叮嘱一三四团团团长刘占华，参加反击的一三四团八连只负责反击不担负守备，因为八连是四十五师的王牌，不到关键时刻崔建功是不会动用的，他可不想让八连在防御中消耗殆尽。——该连前身是刘伯承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警卫营三连，以战无不胜著称，抗战初期就凭借战斗中的缴获，全连清一色的三八大盖，九挺歪把子机枪，这种装备在太行山的所有八路军部队中首屈一指。解放战争中最能显现八连风采的是在淮海战役中，攻击黄维兵团时，该连作为团的尖刀连，仅二十分钟就突破了由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陈诚系统起家部队第十八军中的头号王牌第十一师据守的小白庄，并马不停蹄一举攻占四个村庄，战斗中全连伤亡得只剩下九人，但仍依靠俘虏补充到 140 人，战斗力依然不减！四天后又担任纵队的尖刀连，攻击杨围子，纵队下达的任务是摧毁 12 个地堡，撕开 80 米宽的突破口，结果八连仅十分钟就消灭 50 个地堡，扯开宽 400 米的突破口，为九纵最先突入双堆集黄维兵团司令部立下头功，要知道杨围子的守军也非等闲之辈，是国民党军嫡系精锐第十四军的建军师第十师，八连的勇猛由此可见。入朝后，在五次战役中又获军授予的“出国作战第一功”锦旗，朴达峰阻击战中，该连七班班长柴云振率十余战士，七分钟就攻下三个山头，当攻下第三个山头时，只剩下柴云振一人，他毫不畏惧，用阵地上美军遗留的弹药，独自一人打退了美军的反扑，并乘胜夺取了第四个山头，对整个战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后他被授予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但他因为重伤回国治疗，伤愈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退伍还乡。——直到 1983 年十五军才知道他在四川老家，就在《四川日

报》上连日发表寻人启事，这才将失踪数十年的英雄找到，把几十年前的军功颁发给他。1986 年他应邀随志愿军代表团访问朝鲜，途经北京时老军长秦基伟专门将他请到家中，设宴款待，以表达一位老将军对一位老战士的敬意！

18 日晚，八连 140 余人就在连长李宝成指导员王文用的带领下，向 597.9 高地一号坑道运动，上 597.9 高地必经的高地北侧一条 1500 多米宽的山坳是美军炮火的封锁区，一条用炮火铺就的死亡之路。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好多部队都在这片炮火封锁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典型的就是 24 日晚十五军军部警卫连 96 人通过这片封锁区，伤亡达 72 人，占 75%。但八连可是非同寻常的精锐之师，在通过前先将这片区域的地形、地貌、道路以及美军炮火和照明弹的发射规律摸清楚，然后派出尖刀班将威胁部队通行的七个敌军地堡一一炸掉，这才出发，全连以疏散队形，时而冲刺，时而匍匐，时而卧倒，时而跃进，沿着半山腰悄无声息地向一号坑道运动。到了高地，带路的七连通讯员却因炮火将阵地轰击得完全变了形，而找不到坑道口。就在四下寻找中，连长李宝成无意间掉下了坑道，这才找到了坑道口，八班长崔含弼自告奋勇担当向导，把部队带进坑道，他在满地弹片碎石的阵地上来回爬行二十多趟，将全连带入坑道，自己军衣被磨成一片褴褛，胸腹和腿臂全都血肉模糊，战后他被授予“钢铁战士”的光荣称号。——至 19 日凌晨四时许，八连仅以 5 人伤亡，几乎满员地进入了一号坑道，奠定了当晚反击胜利的基础。

八连整个运动过程太过隐蔽寂静，不仅美军一无所知，连他们经过的六号坑道里的战友也没发现，六号坑

道里有一三四团一营营长李正庸指挥的一营残部二十多人，一营是 15 日夜反击上的阵地，在坑道里已经坚持了三天，只要再坚持几小时就可配合反击部队，里应外合夺回阵地。但由于通讯中断，他们不知道反击部队已陆续上了高地，只待天黑发起反击，中午十一时许，美军包围了坑道口，手雷如雨点般落下来，李正庸完全丧失了继续坚守的信心和勇气，独自一人冲出坑道，坑道里的其余人一见，军心大乱，也随着向外冲，被美军候个正着，遭到了美军的火焰喷射器喷射，无一幸免。更严重的是六号坑道被美军加以利用，改建成一个坚固的火力点，使得当晚反击的一三五团六连为夺下这个火力点付出了伤亡超过全连三分之一的巨大代价，以至于差点无力攻下 0 号阵地。带伤逃回的李正庸受到开除军籍的处分，被遣送回国。

19 日太阳刚落山，十五军集中 46 门 90 毫米以上口径重炮和火箭炮第二零九团的全部 24 门十六管 132 毫米火箭炮，对 597.9 和 537.7 高地实施猛烈炮火准备。——特别要提的是这种十六管火箭炮，1941 年由苏联沃罗涅日兵工厂研制成功，是四五十年代最具威力的压制火炮，十六管联装，运载车同时就是发射车，火力猛，机动性高，二战中刚投入使用时出于保密原因，没有命名专门的名称，只是在炮架上有个生产厂的字母标记“K”，就被苏军士兵亲昵地叫做“咯秋莎”，那是苏联姑娘常用的名字，也是一首优美的流行歌曲名字。而德军则因其发射时的独特声音，把它叫做“斯大林管风琴”。志愿军所装备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紧急向苏联购买的，堪称志愿军的军中宠儿，备受优待，行军路上所有的人车都会不约而同为它让道。由于其发射时会产生大量火药与

烟雾，极易暴露发射阵地，所以确定火箭炮参战时都事先选择好发射阵地和炮击目标，计算好射击诸元，然后由警戒部队护卫开道，直奔发射阵地，展开后立即开火，射击一完就火速撤离。一般只在阵地上停留四五十分钟，美军根本来不及组织报复性还击。在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火箭炮团以营或团规模出动七次，毫发未伤，同时给予了步兵强有力的炮火支援。——这次炮击极为成功，一举摧毁美军 75% 的防御工事。

炮火射击刚一延伸，步兵随即开始反击。537.7 高地地形简单，易攻难守，反击的三个连攻势如潮，仅二十分钟就夺回了全部阵地，便按照事先规定，转入防御。这场激烈反击的重头戏是在 597.9 高地。已进入坑道的八连等炮火开始延伸射击，就冲出坑道，首先攻下 1 号阵地，接着向 3 号主峰阵地冲击，被东侧一个地堡火力所阻，八连两次组织爆破均未成功，负责掩护的机枪手赖发均人枪俱伤，他拿起一颗手雷带伤冲去，在向地堡接近途中，又多处负伤，但他一直匍匐到距地堡两米处，然后趴在地上稍事休息，积攒最后的体力，一跃而起，连人带手雷扑到地堡上，一声巨响与地堡同归于尽！几乎在同时，东南山梁上的 8 号阵地，四连一位叫欧阳代炎的副排长，双腿被炸断后，毅然滚入敌军群中，拉响手榴弹！八连夺下 3 号主峰阵地继续推进，在攻击 9 号阵地时被美军主地堡密集火力阻拦，这个主地堡是以一块巨石掏空建成的，由于角度制约，十五军曾集中十多门火炮轰击也未能将其摧毁，苗族战士龙世昌带着爆破筒冲了上去，就快要接近地堡了，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左腿齐膝被炸断，但他仍顽强地向地堡爬去，终于爬到了地堡前，将爆破筒从射击孔中插进去，地堡中的

美军马上又将爆破筒推出来，龙世昌再向里推，双方僵持着，龙世昌用胸脯死死顶住爆破筒，就在这时爆破筒爆炸了，地堡与他一起在火光中消失了，八连乘势收复 9 号阵地。

从另一个方向反击的一三五团六连，经过大半夜的血战，攻占了 6 号、5 号阵地，伤亡殆尽再也无力向前推进了，二营代理参谋长张广生率领五连二排赶来作为二梯队，继续攻击，这才夺回了 4 号阵地。当攻到 0 号阵地时，这一个加强连只剩下 16 人了，张广生叫通师部，直接向师长崔建功报告，崔建功厉声命令：“八连已占领主峰阵地，如果你们攻不下 0 号阵地，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反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 0 号阵地！”0 号阵地的美军凭借着由四个地堡组成的子母堡竭力抵抗，张广生和六连连长万福来将剩余人员编成三个小组，实施连续攻击，但三个小组伤亡殆尽还没能完成任务，此时，万福来身边已经没有一个战斗人员了，他心急如焚，跟随张广生的营部通讯员原来也是六连战士的黄继光，和六连通讯员吴三羊、肖登良一起请战，张广生立即将这三人编成一组，指定黄继光为班长，去完成爆破任务。黄继光什么也没有说，带着两人就向前冲去，并不像后来报道中的还说什么豪言壮语，那纯粹是杜撰，因为在军情如火的紧急情况下，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六连指导员冯玉庆用机枪掩护三人向地堡冲去，这三人果然机灵，交替掩护，很快炸掉了两个子堡，但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只剩黄继光一人了，他继续向主堡跃进，突然他也中弹倒地，仍带伤匍匐前进，顽强爬到主堡前投出手雷，由于主堡很大，手雷只炸塌一角，里面的人换了一个射击孔又开始射击，此时黄继光

已七处负伤，没有任何武器，他爬到地堡的射击死角，向后面招了招手，冯玉庆恍然明白他的意思，对张广生和万福来叫到：“黄继光要堵枪眼！”话音未落，黄继光一跃而起，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主堡的射击孔，冯玉庆端着机枪冲上阵地将枪膛中的所有子弹泼进地堡，这才转身抱起黄继光，紧跟着冲上阵地的万福来注意到黄继光身上原先的七处伤口，竟无一滴鲜血，他明白黄继光最后一滴鲜血已经洒在前进的路上了，但黄继光仍在弥留之际用生命谱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至此，上甘岭 597.9 和 537.7 高地全部阵地被尽数夺回。10 月 19 日也因此以黄继光、赖发均、欧阳代炎和龙世昌等人为代表的广大忠勇将士用生命和血肉所谱写的辉煌，永铸十五军和志愿军的史册！

战役结束后，黄继光被追授“二级战斗英雄”，因伤回国在黑龙江阿城医院治疗的万福来得知后，作为亲眼目睹黄继光这一壮举的唯一幸存者，冯玉庆和张广生都在以后的战斗中牺牲了，他觉得不把当时的详细情况讲述出来，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英雄？所以他忍着伤口的疼痛，请人代笔记录下他的口述，上报十五军政治部。根据他这份材料，1953 年 4 月，志愿军总部决定追授黄继光“特级战斗英雄”，同时撤消以前的“二级战斗英雄”，并追记特等功。同年 6 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追授黄继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荣誉称号，并追授金星勋和一级国旗勋。

中央军委随后发布命令将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二营六连命名为“黄继光连”。直到今天，黄继光连每天的晚点名，连长都要首先高呼第一兵的光荣名字：“黄继光！”全连齐声应答：“到！”

四川省政府决定将他的故乡中江县石马乡改名为“继光乡”，作为永远的纪念。

十五军刚刚恢复阵地不过一个多小时，天就亮了，20 日一早，美军出动 30 架次 B—26 轰炸机对上甘岭进行地毯式轰炸，300 余门重炮同时实施轰击，40 多辆坦克由于受地形限制无法实施集团突击，干脆抵近高地作为固定火力点，直接支援步兵进攻。美军投入战斗的步兵共三个营，采取多路多波次集团冲锋，后三角队形，兵力由小到大，一波接一波，在宪兵队的督战下，轮番冲锋。

志愿军代司令邓华知道这一情况，指示秦基伟敌军以营团兵力在狭窄地域实施密集冲锋，是用兵上的极大错误，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歼敌。秦基伟将这一指示传达给崔建功，要求部队树立起“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放开打。并告之全军都在关注你们，而且会全力支援你们！

激烈的炮火使得整个上甘岭都被硝烟所笼罩，相隔百米就无法看到信号枪的光亮，双方只好都使用迫击炮发射信号炮弹来进行联络。

黄昏时分，部队已连续一天一夜的激战，伤亡巨大，后援无济，无力再战，只得放弃表面阵地退入坑道，除 597.9 高地西北山梁上的四个阵地外，其余阵地均告失守，崔建功原先苦心安排只攻不守的王牌八连无法撤下，继续在上甘岭战斗，此时仅剩 15 人，在连长李宝成的率领下退入一号坑道。

当晚军参谋长张蕴钰赶到四十五师师部，听取作战情况报告，崔建功汇报部队伤亡已超过 3500 人，一三四团和一三五团总共只剩下二三百人，全师已经没有一个

完整的建制营了，张蕴钰大为震惊，责问为什么不及时报告？一三四团团团长张占元表示还能组织机关和勤杂人员继续战斗，张蕴钰痛心不已。秦基伟知道这一情况立即在军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决定从军部的直属部队和机关中抽调人员补充四十五师。鉴于四十五师已无力组织反击，便改变战术，以坑道斗争与小分队反击为主要手段，消耗疲惫敌军，为主力调整部署准备大规模反击赢得时间。

十五军的上级单位第三兵团也做了部署调整，以四十五师全力争夺 597.9 和 537.7 高地，确保坑道，争取时间为以后的反击创造条件。以二十九师接替四十五师除这两高地外的所有防务，另将十二军第九十一团调到平康以北地区，归十五军指挥。战役第一阶段对表面阵地的反复争夺遂告结束。

在七个昼夜的激战中，十五军投入了四十五师三个步兵团共二十六个连，炮兵十九个连各型火炮 46 门，火箭炮六个连共 24 门，抗击美韩军七个团共十七个步兵营，十八个炮兵营共三百余门火炮，与之反复争夺，战况殊为激烈，阵地几度易手，十五军伤亡 3500 余人，毙伤敌近 7000 人。

（三）

战役的第二阶段就是最艰难的坑道斗争阶段，597.9 高地共有三条大坑道，八条小坑道和三十多个简易防炮洞。当时三条大坑道和五条小坑道都在守备部队控制下，其中八连进入的一号坑道是主坑道，位于 1 号阵地下，是最大的坑道，呈“F”形，全长近 80 米，高 1.5 米，宽 1.2 米，左右还各有一个叉洞，顶部是厚达 35 米的石灰岩，坑道的两个洞口都向北朝着五圣山方向。

美军虽然占领了表面阵地,但坑道仍在志愿军手中,坑道里的部队随时可以与反击的部队里应外合,对于美军而言是极大的威胁,坑道一日不除,美军一日不得安生,因此 20 日以后的战斗就是以坑道为争夺焦点。

上甘岭守备部队的残部退入坑道之初,由于建制被打乱,弹药匮乏,又与上级失去联系,缺乏坚强领导,对坚持坑道的意义还不很清楚,因此秩序混乱,军心涣散。以一号坑道为例,坑道里有 80 余人,来自十六个连队,其中伤员 55 人,武器装备随意摆放,一天里竟发生了九起枪械走火事故!无线电通讯也是一片混乱,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共有二十一部步话机,由于推广了一位步话机员的发明,才解决了在炮火下架设天线的难题,使用时将软天线缠绕在手榴弹的手柄上扔到坑道外,在满地弹片手榴弹柄的阵地上既不会引起注意,又难以被炮火破坏,随用随扔非常方便。刚退入坑道,各单位都是焦急万分,一起呼叫,但步话机频率少,这二十来部一齐使用,相互干扰影响,谁也听不清,最后是 537.7 高地主坑道的步话机员陈文均提议,分清主次,避免自我混乱,先主坑道,再排班坑道,依次报告,这才结束了混乱。

十五军得知坑道情况后,就于 21 日晚派一三四团二营教导员李安德率领军警卫连的 79 人和一三四团七连的 17 人借着夜色的掩护潜入 597.9 高地一号坑道,传达了军师关于坚持坑道的作战决心,并成立坑道党支部,进行统一领导。所有一号坑道里的部队都编入八连,由八连连长李宝成指挥。接着在坑道党支部的领导下,对坑道进行了管理整顿,使得坑道部队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巨大的伤亡使得战地救护工作骤然增加了，火线救护人员冒着猛烈的炮火从阵地上将伤员抢进坑道，但代价实在太太，曾有过为抢救一个伤员而牺牲了七人！因此四十五师只得下令在炮火猛烈时停止抢救伤员，同时严令火线运输员将物资送到后不得空手返回，必须带回一个伤员。即使从阵地上救下的伤员，也还得经过二公里的山路送至营包扎所，经简单处理再后送十余公里外的军师野战医院，这一路上不仅山路崎岖难行，还有美军五处飞机固定封锁点和多个炮火封锁区，很多伤员在半路上就停止了呼吸，军师野战医院的医生几乎是昼夜不停地进行抢救，他们的辛劳丝毫不比战场上的战士逊色！

经过多日血战，双方都已筋疲力尽，不约而同稍做休整，战场上出现了少有的短暂寂静。

秦基伟见四十五师伤亡较大，呈请第三兵团为四十五师补充 4000 新兵。同时预见到战役继续发展下去，单凭四十五师是不够的，开始考虑动用军的预备队二十九师。

22 日战斗再度打响，争夺的焦点就是一号坑道。美军对坑道口用无后坐力炮抵近射击；用炸药包爆破；向坑道里投掷手榴弹；甚至使用 P—51 飞机低空俯冲扫射……美军火力又猛，坑道口又窄，眼看情况危急，李宝成立即召唤纵深炮火支援，用炮火制止美军对坑道口的破坏。

天色一黑，坑道部队就组织小分队出击，四下炸地堡、摸哨兵，搞得美军草木皆兵，夜不得宁。尤其是二号坑道的部队在四连指导员赵毛臣的指挥下，在坚持坑道斗争的十四天里，组织了十一次夜袭，严重威胁着美

军。

尽管如此，坑道里的部队情况还是日渐恶化。为了改善坑道部队的处境，四十五师决定于 23 日晚组织一三五团五连协同坑道里的八连实施反击，力争夺取 1 号、3 号阵地。

23 日天刚黑，火箭炮团以一个营 8 门火箭炮对 597.9 高地进行了两次齐射。可惜由于高地面积太小，大多数炮弹都落在山下，只有十余发命中预定目标，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随后步兵发起了攻击，八连在副连长侯有昌指挥下，冲出坑道由主峰向东北山梁进攻，五连则从东北山梁顶端的 2 号阵地向主峰攻击，实施两面对进合击。五连自一年多前五次战役中的朴达峰阻击战中因麻痹大意，对美军夜袭毫无防范，致使广德山阵地连同配属的 3 门 60 毫米迫击炮一同被美军夺去后一直备受批评，正一心想在战斗中洗雪耻辱。但五连受领任务时间急迫，还来不及仔细观察地形就投入了反击，加上连长求战心切，没有组织战场侦察，指挥部队直扑 2 号阵地，结果陷入美军的预设伏击圈，在美军密如暴雨般的枪弹下，全连伤亡过半，只剩下十多人幸存，当然无力攻取 2 号阵地了。而正是因为五连的失利，八连失去了策应，孤军奋战，经过九次反复争夺才攻下 1 号阵地，然后再继续向 3 号主峰阵地推进，美军则因解除了五连的侧翼威胁，没有后顾之忧乘机向 1 号阵地反扑，李宝成只得于 24 日凌晨三时下令放弃反击退守坑道，此次反击八连出击的部队只剩下 5 人，在五天中第二次损失殆尽！

秦基伟接到战况报告，心情异常沉重，他意识到这次反击不同以往顺利恢复大部甚至全部阵地，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军占领了阵地已经好几天，不仅熟悉了

地形，构筑了工事，而且利用四十五师的一些工事、坑道，大大增加了反击的困难所致。经过这次反击，四十五师的伤亡已经超过了 4000 人。

志愿军总部和第三兵团知道这情况，如此惨重的伤亡，连久经战阵的第三兵团代司令王近山都震惊不已！才几天时间在这么两个连防守的高地上，一个满员的步兵师就拼光了。——王近山，与秦基伟同乡，湖北红安人，1915 年出生，1930 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一级一级打上来。抗日战争开始后就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跟随刘邓近二十年，是刘邓极为倚重的虎将，以其强悍的战斗作风勇冠三军，历任八路军副团长、团长、旅副政委、代旅长、旅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兼第十二军军长。在战争中先后负过八次伤，从这些战伤就足见其勇猛，因他在战场上厮杀起来如痴如疯，因而得了个“王疯子”的绰号。他当了高级指挥员后，每逢战斗总得有六七个警卫员跟随，这些警卫员就是负责连拖带抱阻止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最能表现他的作风是 1943 年 10 月，奉命率一个团化装成百姓，昼伏夜行，途中不求战不恋战，尽快驰援延安。10 月 23 日在山西临汾以北的韩略村，他见这里是日军占领区的心脏地区，日军戒备极其松懈，就决定组织伏击战，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要知道他的任务不是寻找战机作战，而是不求战不恋战全速行军赶路，在此没有友邻支援，孤军作战的情况下，打胜了也没有功劳，打败了则是责任重大！结果伏击的日军车队正巧是日军支

那派遣军步兵学校学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其成员全是日军中高级军官，歼敌 120 余人，其中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六名大佐联队长和近百名中佐、少佐军官。为此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王近山不但是个猛张飞式的骁勇战将，而且很有谋略，1947 年 7 月襄樊战役中，他受命率部攻打襄阳，襄阳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有过多次攻防战例，王近山根据襄阳守军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出奇制胜的“撒山攻城”的作战方案，刘伯承见此方案，未等战斗打响就已拍案叫好：“襄阳已在我掌中了！”，果然，仅八天就全歼守军两万余，攻占襄阳，被朱德誉为：“杰出的小型典范战役。”朝鲜战争中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和秦基伟一起对上甘岭战役的战役指挥作出了巨大贡献。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回国后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副司令、公安部副部长。1964 年执意与结发妻子离婚，当时离婚被视为生活作风腐化，遭到上级和战友的劝阻，但他为人倔强，对待这些意见态度很抵触，因此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被撤消公安部副部长的职务，降为河南一农场的场长，真正是解甲归田。现在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竟然因婚姻问题遭到如此严重的处分。直到 1969 年任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向中央仗义直言，才重新任命他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1978 年 5 月他去世时，老上级邓小平见到上报的悼词，提笔将他的职务改为南京军区顾问，才使他的丧事得以按大军区正职的待遇举办。——王近山让秦基伟仔细考虑，照此情景是继续打下去还是放弃，做最后的决断。

秦基伟随即召开作战会议，商讨这一问题，经过讨论，认识到虽然十五军现在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但美军

困难也不小，同样巨大的人员伤亡对于后备兵员枯竭的美军而言无疑是致命的，现在正是双方比意志比韧劲的关键时刻，而且上甘岭已经成为全朝鲜的焦点，需要十五军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会议还对前一阶段作战上的战术问题进行了检讨，制定了下一阶段的作战方案。

从 10 月 23 日起，上甘岭的战斗不仅成为朝鲜战场聚焦之处，新华社也开始连续两个月集中报道，一时间上甘岭两个面积仅 3.7 平方公里高地为朝鲜、中国甚至全世界所密切关注。

由于白天抗击美军对坑道的破坏和夜间的主动出击，坑道部队平均每天有一个班的伤亡，为此几天来崔建功一直抽调机关人员向坑道增援补充，一个连，一个排，甚至一个班不断派出，师团两级机关几乎连勤杂人员都用光了。

24 日晚，秦基伟将军部的警卫连 96 人由连长、指导员带领，派往 597.9 高地一号坑道，指导员王虓是秦基伟太行山时期的警卫员，跟随秦基伟长达五六年，多次在战场上冒死掩护过秦基伟。结果在通过上甘岭山脚下的炮火封锁区时，遭受到巨大伤亡，只有 24 人到达一号坑道。牺牲的人中就包括王虓，令秦基伟痛心疾首，十五军自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还从没用上军警卫连，初次上阵损失就这么惨重，直到战役结束秦基伟还痛心不已。

25 日，范佛里特来到美第九军军部主持部署调整，将受到重创的美第七师撤下战场，进攻 597.9 高地由韩第二师接替；韩第二师右翼团的防务交给韩第六师，集中兵力攻击上甘岭；另将韩第九师调到金化以南的史仓里，作为战役预备队。当晚，八连在夜袭中就发现了这

一情况，随即向团部报告。由于韩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远不及美军，志愿军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不料韩第二师以东方人的思维和创造，对坑道的破坏比美军更毒辣，他们用迫击炮吊射坑道口；用毒气弹、硫磺弹熏；用巨石块堵洞口；用铁丝网缠绕成团堵塞通气口；从坑道顶部凿眼装药爆破；……美军忙了五天，一筹莫展，而韩二师才一天就将二号坑道炸塌了近 30 米，坑道里的四连被倒塌的土石压死 2 人，压伤 6 人。一号坑道的两个洞口也被炸塌，只剩下碗口大小的透气孔，八连伤亡了 37 人才将洞口重新掏开。四十五师立即将四门 75 毫米山炮前推，专门轰击破坏坑道口的敌人。

敌军的破坏还不是坑道部队最大的威胁，缺粮断水才是最严重的，美军对坑道部队与后方的交通线实行严密炮火封锁，使得坑道部队粮尽水绝。火线运输员付出几条生命的代价送进坑道一袋压缩饼干，但干燥至极的口腔和食道根本无法吞咽，饥渴成为最大的敌人。在极端困难下，坑道部队只得用尿来解渴。但严重缺水的人体所产生的尿液又少又骚，战士逐渐摸索出一些方法减轻异味：像用毛巾包住掺上牙膏的泥土来过滤尿液等。可不久连尿液也越来越少了。后方时刻关注着坑道部队艰苦卓绝的坚持，只有坑道部队的坚持才能消耗敌人，赢得准备反击所需要的宝贵时间。秦基伟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组织向坑道运送物资，火线运输员一批接一批，前仆后继向坑道运输。在整个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的伤亡率高达 90%，甚至超过了坑道部队的伤亡率，通往上甘岭两个高地的山路上，洒满了火线运输员的鲜血，大量的物资也因此损失在路上，送进坑道的微乎其微。由于饮水难以运输，只要容器中弹就极易流失，所以主

要运送的是既能解渴又能充饥的萝卜。一直到第九天，也就是 28 日夜，运输连指导员宋德兴和两个火线运输员才冲过了炮火封锁，将三袋萝卜和一些慰问品送进了一号坑道，那个夜晚简直就是八连最盛大的节日。但萝卜上火，多吃心里难受，所以坑道部队建议送苹果。于是十五军连夜从后方紧急采购了三万多公斤苹果，秦基伟等军师首长也以个人名义出钱买，并在苹果筐上写上名字，派人送往坑道，以示对坑道部队的关心。但美军炮火封锁实在太猛，大筐苹果难以送上去，为此十五军政治部专门下令：凡送入坑道一筐苹果者记二等功！要知道在战役进行中，即使是一线部队，包括黄继光等烈士也都是先报功，一律等战役结束再行评定。因此这个二等功完全称得上是重赏了。可仍没有一筐苹果送进坑道，最后送进一号坑道的只有一只苹果！于是，“一只苹果”的动人故事就在坑道里产生了，并被写进了中国的小学课本，成为教育一代又一代人的真实教材。至于这个苹果是谁带进坑道的，今天已无法查清了，但这只苹果所表现出的人民军队团结友爱，永远留在无数人的心中。

坑道里最受煎熬的要数那些无法转下高地的伤员了，坑道里连一滴酒精，一卷绷带都没有，伤员只好任凭伤口发炎糜烂，全靠坚强的意志和自身的体质支撑着。而且为了不影响战友的情绪，伤员都自觉强忍疼痛，一声不吭，很多伤员都用嘴紧咬着床单，有的至死嘴里的床单都没法拿下来！——谈起这些，坑道里的幸存者都唏嘘不已。坑道里的卫生员竭尽全力进行救护，有的一整天用棉花团收集坑道角落的泥水，再用纱布过滤，最后烧开让伤员能喝上一口水；有的夜里跟随出击的小分队出坑道，捡拾照明弹上的降落伞、尸体棉衣里的棉花

和断了的枪管，回来做成绷带和夹板，替伤员更换包扎、固定断肢，因此战后报功最多就是坑道卫生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评为特等功的一三三团二连卫生员陈振安，他在炮火连天弹如雨下的战场上——一人救下了 144 名伤员，并在坑道精心护理长达十昼夜。随着战斗的进行，阵亡者越来越多，坑道里地方太小，只好把尸体在坑道的叉洞里叠起来放置，令所有人惊奇的是，这些尸体在温度高达 30 度的坑道里，存放了十四天，竟无一具腐烂！科学都无法解释的奇迹，活着的人只能用英灵地下有知来解释。

在整个战役里坑道坚持时间最长的是由丁鸿钧任班长的一三四团五连四班，他们是参加 10 月 14 日夜间接击来到 597.9 高地的，丁鸿钧指挥有方，在两天里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毙伤敌 150 余人，自己无一伤亡。因弹药耗尽才于 15 日下午退守 2 号阵地——一个只有 15 米深的小坑道。他们依靠夜间从阵地收集的弹药、两箱饼干和坑道里储存的两桶水，在坑道里坚持。他们没有步话机所以无法与后方联系，后方也因此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他们仍然在这个小坑道里坚持，美军一个连对这坑道进行了多日破坏，一筹莫展，最后只得在洞口架起三道铁丝网，筑起两个地堡，采取围困战术。一直坚持到第十天，他们饥饿难耐，眼看再无法坚持下去，丁鸿钧和班里的四个党员召开了党小组会，决定由丁鸿钧突围出去，到一百多米外的二号坑道向上级报告他们的情况，听取下一步行动的指示。丁鸿钧匍匐而行，进入二号坑道，经四连指导员赵毛臣批准，撤到二号坑道。这才于 27 日晚在二号坑道四连部队的策应下，突围而出，全部转移到了二号坑道，在二号坑道继续战斗，前

后共达二十个日夜，成为坑道坚持之最。

在上甘岭的两个高地中，537.7 高地地形比较简单，反击成功率较高，每一次反击，就轮换一批坚持坑道部队，补充一些弹药、药品、食品和饮水，因此 537.7 高地坑道的环境相对还比较好。而 597.9 高地反击成功不多，坑道部队几乎得不到物资和人员补充，处境极为艰难。但战士们以无畏的精神、高昂的战斗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缺粮、缺水、缺氧种种困难，一直坚持着。

25 日十五军在道德洞的军部召开军、师两级军事主官和炮兵、工兵指挥员的联合作战会议，认为 597.9 高地地势险要，该高地的得失是上甘岭战役胜利的关键，应集中兵力先对 597.9 高地实施决定性反击，力求全力恢复表面阵地，反击成功后争取巩固，然后再争夺 537.7 高地。会上决定二十九师师长张显扬率领八十六团和八十七团，投入上甘岭作战；西方山方向的四十四师则和加强给该师的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对防区正面实施反击，钳制当面之敌，配合上甘岭方向的战斗。动员军、师机关勤杂人员，担负四十里山路的火线运输，并从二十九师抽调三个营抢运弹药、物资，保证反击的物资需要。四十五师则坚持提出不使用二十九师，单靠自己师组织力量实施反击。他们这一想法的出发点是在我们手里丢失的阵地，要凭我们的力量夺回来。但秦基伟要搞的是决定性反击，不是零敲碎打的小反击，不恢复阵地绝不停止！他完全估计到了战斗的残酷，预见到不仅要用上二十九师，还极可能要动用配属给十五军的十二军九十一团。

王近山判断上甘岭已发展成战役规模，十五军已无力继续下去，不仅要用到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还

将会使用到九十二团，就指示十二军军长曾绍山预作一些参战的必要准备。并从其他地区抽调 67 门大口径火炮，加强上甘岭的炮兵力量；从各部队抽调出 1200 名新兵，补充四十五师，整补重建十四个伤亡最严重的连队；还调来了一个高炮团，加强防空火力。

志愿军总部也根据战场发展及时调整，原定 10 月 22 日结束的秋季战术反击，延长至 11 月底。命令十五军左右邻的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六十五军、六十八军在各自防区的正面发动攻击，策应上甘岭战斗。十五军则利用坑道部队消耗吸引敌军，赢得调整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同时鉴于美军第四十师、第三师已分别到达芝浦里、铁原地区，极有可能接替现有兵力扩大作战规模，而十五军连日作战消耗已很大，纵深守备兵力空虚，就将刚从金城地区后撤，正开往后方休整的第十二军取消原休整计划，转往五圣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视战况投入战斗。志愿军后勤部负责保障供应，以每门炮 500 发炮弹的标准准备十一万发炮弹，组织运力昼夜抢运，总部后勤部留作机动的两个汽车运输连也投入上甘岭的物资运输，对十五军的需要，全力保证。

从 28 日开始，十五军就以无后坐力炮对 597.9 高地敌防御工事，实施预先破坏射击，再以迫击炮轰击阻止美军修复工事，为 30 日的大反击创造条件。而 537.7 高地上的一三三团，在军师的几乎全部炮火都已转到 597.9 高地的情况下，为配合大反击，不断组织进攻。至 30 日，该团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连可投入战斗，仍以一个排甚至一个班，不停顿发动进攻，牵制着敌军在 537.7 高地的力量，使其无法抽调兵力增援 597.9 高

地。

从 21 日至 29 日,坑道部队夜间主动出击达 158 次,其中仅 9 次失利,其余均获成功,累计歼敌 2000 余人,大量消耗了敌军,并极大破坏了敌军阵地的稳固。与此同时,纵深部队为支援坑道部队,先后以二到五个连不等的兵力对 537.7 高地组织过七次反击,曾三次夺回了全部阵地。在 597.9 高地,以两个班到九个排的兵力组织过五次反击,曾一度占领主峰。这些反击,都使坑道部队得到了物资和人员的补充,增强了坑道的力量,为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十五军的另一战场上,西方山地区的四十四师对当面之敌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从战术上积极配合五圣山战场。四十四师主要的攻击目标是 391 高地,该高地位于铁原东北十公里,南北两座山峰,形同驼峰,距一三零团主阵地发利峰仅 2000 米,严重威胁着十五军与三十八军的结合部。对美韩军而言,391 高地是至关重要的前哨阵地,一旦失守,在正面九公里范围就再无险要可凭,将直接影响整个金化防线。双方对这个高地都视为生命,拼死相争,经过激烈争夺,在 10 月中旬形成志愿军占北峰,美军占南峰的局面。上甘岭打响后,四十四师就以此高地为主要目标,进行争夺战,以牵制美军。当 27 日原先在 391 高地的韩军精锐第九师调往上甘岭,由美三师接替,乘着两军换防之机,四十四师一举夺占南峰,美三师全力反扑,双方激战三天,造成西方山全线吃紧,范佛里特只好将刚在上甘岭受到重创而撤下的美第七师,不经休整补充就调到金化、铁原一线,以防万一。范佛里特还迫于 391 高地的巨大压力,从上甘岭抽调出五个炮兵营加强西方山方向,美军这一剜肉补疮

之举，大大有利于四十五师上甘岭方向的作战。上甘岭战役结束时，391 高地的争夺还在进行，直到 11 月 30 日，四十四师才确实占领并巩固了 391 高地，战斗中共歼敌 4000 余人。四十四师这一作战，不仅有效牵制了美军，分散了其在上甘岭的兵力火力，有力保障了上甘岭的胜利，而且将战线前推十公里，大大改善了在平康谷地的防御态势。因此受到了志愿军总部的通令嘉奖。

(四)

以 10 月 30 日夜开始的决定性大反击为标志，战役进入了恢复巩固阵地的第三阶段。

美军占领 597.9 高地表面阵地后，随即调来了工兵营和韩军的劳工营，日夜不停抢修工事，共修筑了 70 多个永备火力点，部署了 14 门无后坐力炮和 65 挺重机枪，构成了完整的火力配系。韩第二师接防后，在一般情况下最多容纳两个连的高地上部署了整整四个连，还在高地南侧的反斜面部署了两个连，作为浅纵深的反击力量。这样的防御无论兵力还是火力，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10 月 30 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军以 133 门大口径火炮和 30 门 120 毫米重迫击炮，向 597.9 高地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炮击持续达四个多小时，日落时分才沉寂下来，韩军惟恐志愿军乘机发动攻势，立即爬出隐蔽部抢修被毁的工事。不料一个半小时之后，十五军的炮火又突然开火，对高地进行了五分钟的炮火急袭，接着开始炮火延伸，韩军以为志愿军攻击迫在眉睫，急忙进入阵地准备迎战，谁知志愿军的炮弹猛然又回落在高地上，被打了个正着，这么几次真假延伸射击，高地守军的伤亡已经过半。二十二时，火箭炮团 24 门火箭炮进入阵地

对敌纵深炮兵阵地和二梯队集结地区实施面积射击，几乎完全压制了敌纵深炮火。——这是志愿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炮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体现了志愿军的炮兵经过连日的战火考验，终于逐步成熟，炮火的运用合理精熟。与美军在火炮数量上的对比从战役初期的 1：10 缩小到 1：4，炮火组织指挥上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十五军将所有火炮按射程远近分为五个炮群，采取二线分散配置，由军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制定了统一的阵地分区代号，以便迅速精确进行射击；坑道与炮兵指挥所直接建立联络，使坑道部队可以随时召唤炮火支援，并为炮火校正目标偏差；各型火炮根据性能不同，赋予不同的使命：榴弹炮、加农炮负责压制敌炮火，摧毁敌工事，打击敌二梯队；火箭炮采取面积射击主要杀伤敌纵深炮火和有生力量；迫击炮机动使用，主要拦截敌集团冲锋，射击其他火炮难以打击的死角。十五军的步炮协同日渐完善，美军在上甘岭伤亡的 70% 是被志愿军炮火杀伤，这就是炮兵在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10 月 30 日二十二时二十五分，四十五师和二十九师出动十一个连，其中坑道部队三个连，发动了决定性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残酷，一个排往往一次冲锋就所剩无几，但部队仍一个连接一个连前赴后继，冲锋一浪接一浪，一路猛攻。一三四团六连攻下 9 号阵地后只剩下 4 人，随即就被韩军夺去，后面的七连紧接着再攻，没有半点踌躇犹豫！配属八连的六连二排在向主峰 3 号阵地攻击中，尖刀班只剩下班长吕慕祥，他已五处负伤，仍向主地堡爬去，爬到地堡边却因手臂负伤扔不动手雷，他拼出最后的力气，扑上地堡拉响了手雷！由于巨大的伤亡，战斗中干部倒下，战士随缺随提，先任命战后再

补批。正如王近山在战前作战会议上所强调的，要有巨大伤亡的准备，每个战士不仅要准备当班长、排长，还要准备当连长、营长。果然就有参军三个月的新战士十几天后就当上连长，因为比他资历老的都已经伤亡殆尽，自然非他莫属。

经四个多小时的激战，10月31日凌晨二时许，一三四团七连终于击退了韩军的反扑，守住了主峰3号阵地。至此，反击才告一段落。尽管没有恢复所有阵地，但主峰和1号、7号、8号、9号等主要的阵地都已夺回。韩军担任守备的四个连，全部被歼。崔建功反击刚结束就命令一三五团二营代参谋长张广生统一指挥597.9高地上的所有部队，迅速就地组织整编，投入防守。张广生请求速送手榴弹和手雷，并报告因为高地上被炮火炸成遍地虚土，无法挖掘工事，要求送麻袋来筑工事。崔建功火速向后方求援，志愿军总部马上从相对平静的西线部队调集了144卡车的手榴弹、手雷和其他弹药，四十五师的后勤人员千方百计搜集了2000个麻袋，火线运输员乘着天亮前的短暂黑夜，突击将这批弹药和麻袋送上了高地。

10月31日天刚亮，韩二师三十一团和埃塞俄比亚营就联合发起攻击，反击部队顽强防御，又是整整七个小时的恶战，韩军三十一团几乎损失殆尽，完全失去了战斗力，直到战争结束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埃塞俄比亚营也付出极大代价，伤亡过半，597.9高地主峰依然在十五军手中。星夜赶来督战的美军第九军军长詹姆斯少将见到部队的伤亡如此惨重，只得下令停止进攻。至此，反击部队历经九个半小时的惨烈血战，终于巩固了597.9高地主峰，在这九个半小时的战斗中，十五军创

造了在上甘岭战役中弹药日消耗量的最高记录：子弹 30 余万发，手榴弹和手雷 3 万余枚，爆破筒 260 根，炮弹 2.1 万发。

秦基伟认为战局照这样发展下去，美军的失败将不可避免，他判断美军除了动用韩第九师外，因为其后备兵力短缺，没有足够的二梯队，要么主动结束战斗，要么就只有使用第一八七空降团了。而一八七空降团投入战斗，只能更加暴露其兵力上的严重不足。

11 月 1 日，美韩军的炮火猛烈程度仅次于战役第一天 10 月 14 日，美第九军调来了韩军的精锐部队第九师的三十团。该团曾经在白马山顶住了志愿军头等主力三十八军五个团整整十天的强攻，为韩九师赢得了“白马师”的荣誉称号。韩三十团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兵分四路向 597.9 高地猛攻，该团的战斗力确实较强，于当天下午十五时许，有两个排攻上了主峰，但还没等喘口气，就被四十五师的守备部队赶了下来。韩三十团攻了一整天，总共发动二十三次营连规模的集团冲锋，徒然伤亡 1500 余人，毫无收获。

十五军似乎意犹未尽，当晚二十九师八十六团的两个连发起反击，将 597.9 高地其余阵地全部恢复。但四十五师的伤亡也不小，守备部队的兵力少到只能控制五个阵地，秦基伟只得将调归其指挥的十二军三十一师的九十一团八连调上 597.9 高地，接替四十五师无力再守的七个阵地，从这天起，十二军的部队开始参战。十二军是王近山一手带起来的部队，是第二野战军各部队中的佼佼者，攻防兼备，在解放战争中曾屡立战功。此次参加上甘岭作战，军长曾绍山极为重视，亲自点将，指名由三十一师政委刘宣带领九十一团参战，九十一团更

是十二军中的精锐团，该团原来属十一军建制，前身是黄麻起义部队组成的红军鄂豫皖边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解放战争中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旅十九团，曾在定陶、宿县和淮海战役中屡建奇功，后整编为解放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来朝鲜后参加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中攻势极为凌厉，是所有攻击团队中突破最深的，第二阶段战局突变，美军以装甲部队与机械化部队混编成机动性极强的特遣队，实施反扑，将志愿军战线多处割裂，九十一团由于突破最深，因此后撤的距离也最远，达 90 公里，全团在断粮七天的困境下，靠沿途搜寻到的一些杂粮充饥，从美军包围圈的缝隙中夺路突围，不仅未丢一名伤员，未少一枪一炮，还带回来一百多俘虏，充分显示了该团出类拔萃的战斗力。王近山审时度势决定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余下的两个团全部配属给十五军。

11 月 2 日，正如秦基伟判断的，范佛里特将一八七空降团投入了战场，该团是美军最早组建的空降部队之一，原番号为第八十二空降师的第五零五团，在二战中参加过欧洲战区的西西里岛、诺曼底、萨勒诺、阿萨姆等多次重大战役的空降作战，战功卓著。1944 年又调往太平洋战区，参加对日作战，番号改为一八七团，隶属于第十一空降师，可惜只赶上了菲律宾战役的阿加山口空降作战，还来不及大展身手，战争就结束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原准备在仁川登陆中使用，但因种种原因到达朝鲜时，仁川登陆已结束两个多月了。随后 1950 年 10 月 20 日在肃川、顺川地区，1951 年 3 月 22 日在汶山里地区两次实施团规模空降，但都由于时机稍晚而扑空。

然后一直作为美第八集团军直接指挥的机动力量，现在范佛里特却将其作为普通的步兵团投入上甘岭，一方面表现出范佛里特孤注一掷的疯狂，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美军缺乏后备兵员的致命弱点。

该团一上阵，就让十五军感到非比一般，无论装备、攻击队形，还是战术运用，都是首屈一指。官兵全部身着新型防弹背心，手持自动武器，攻击时先施放烟雾，以班排为单位的小股部队进行试探进攻，探明对手兵力、火力后，再在密集的弹幕射击掩护下，发动连、营规模的冲击。攻击队形先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的突击队，中间是由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等火器组成的火力队，最后再是二梯队集群，层次清晰，具有较强的攻击连续性，一旦攻击不成，便退回出发阵地，摆放对空指示布板，引导飞机航空火力支援，然后再攻击。

此时的十五军也已是久经考验了，步炮协同近乎完美，一八七团好几次都还没接近主峰阵地，攻势就被纵深炮火所粉碎。但一八七团毕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战斗力比一般部队强的多，士气也高，攻击依然一浪接一浪，直到下午十六时，终于攻占了 10 号阵地，但九十一团八连随即就有十多个战士跟着炮弹的弹着点冲了过来，一阵手榴弹，又把阵地夺了过去。十七时许，1 号阵地上只剩下两个伤员了，九十一团八连派出了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前去增援，一番苦战，将敌人打退，可也只剩下了朱有光和王万成两人，刚要整修一下工事，美军又蜂拥而上，负伤的朱有光一跃而起，冲入敌群拉响爆破筒。爆炸的硝烟还未散去，王万成也抓起爆破筒扑向另一群敌军，——他就是日后影片《英雄儿女》中主人公王成的原型。

这天配合美军进攻的韩军损失也非常惨重，仅先锋连就阵亡 31 人，伤 84 人，几乎全连覆没。十八时许，天色全黑，美韩军的进攻方才停止，依然寸土未得。

十二军九十一团团团长李长生来到上甘岭，他发现高地上有着多达十几个连的建制部队，为避免多建制所引起的指挥混乱，他将九十一团九个连采取“车轮战”，一个连一个连投入战斗，每个连不管伤亡如何，一律只打一天，就撤下来休整，连长则留下来，作为后一个连长的顾问，如此类推往复。这样不仅避免了指挥上的混乱，也使各连都保存了一批骨干。

11 月 3 日，九十一团七连接替八连投入作战，这天战斗非常激烈，七连的伤亡很大，运输弹药的八连炮排见形势危急，主动加入战斗，但才到了下午十五时许，七连加上八连的炮排就所剩无几了，原定第三天参战的九连就开始以两个班为单位，一批一批向上增援。

11 月 4 日，李长生根据这几天的战斗发现美军每天的攻击都是早上八时开始，他判断在这之前美军肯定是在某处集结，便派出了精干的侦察分队连夜前去侦察，这些侦察兵果然不负期望，凌晨四时发现美军的攻击部队正在 597.9 高地南侧的一片树林里集结，李长生决定先发制人，对其实施炮火急袭，四时三十分，火箭炮团 24 门火箭炮就按照侦察兵所报告的方位进行了齐射，美军的攻击部队遭到了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只得重新组织兵力，这天的进攻直到中午十二时才开始，而且攻击强度明显减弱。

11 月 5 日，十二军三十一师全面接过 597.9 高地防务。九十一团几天战斗只剩下一个连没有参战，当晚九十三团的一个营投入了战斗，三十一师的后续部队也逐

步进入战斗。三十一师，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在抗日战争中战无不胜，被誉为“太行山拳头”；解放战争中被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旅，更是战功卓著，定陶战役活捉国民党军精锐部队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攻取宿县生擒交警第十六总队中将副司令张绩武；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生俘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后整编为第十一军三十一师，1950 年编入十二军序列。

当天的战斗韩军以第二师三十一团主攻，三十团以一个营担负助攻，在志愿军顽强抗击下，徒有伤亡，下午十五时就草草结束攻击。就在这天的激烈战斗中，涌现出了著名的孤胆英雄胡修道。胡修道是九十一团的一名新战士，从拂晓起就战斗在 597.9 高地的 3 号阵地上，连续打退韩军七次冲锋后，全班只剩下胡修道和滕士生两人了。中午开始，韩军加强了攻击，火力越来越猛烈，滕士生以及后来增援的另两名战士全部伤亡，阵地上只剩胡修道一人，而且还负了伤，但他毫不畏惧，裹伤再战，独自一人又英勇地击退了韩军多次进攻，从拂晓至黄昏，胡修道和他的战友，先后击退韩军从一个排到两个营规模总共四十一次进攻，寸土未失！其中仅胡修道一人就毙伤韩军 280 余人，创造了孤胆作战的光辉典范。

战后，胡修道被志愿军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被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金星勋和一级国旗勋。

范佛里特于下午赶到金化野战医院，慰问伤员，鼓舞士气。

同日，中朝联合司令部通令嘉奖十五军。十五军迅速将这一嘉奖令印发成号外，散发到每个阵地，以激励

士气。

第三兵团鉴于十二军参战，上甘岭的战斗已发展成战役规模，重新调整了作战指挥系统，以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为首组成五圣山指挥所，统一指挥十五军的二十九师、十二军的三十一师和三十四师；由炮兵第七师师长颜伏为首组成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所有参战炮兵；上述两个指挥所统归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指挥。同时将已连续作战二十三天的四十五师撤出战斗，补充休整。其在上甘岭防务交由三十一师，另以三十四师的两个团为预备队。

当晚满身硝烟，却是辉煌与荣耀等身的四十五师奉命撤下战斗了二十三个昼夜的阵地，艰苦的坑道斗争极大摧残了身体，走出坑道的人普遍患有色盲、夜盲和风湿，而更多的人却永远留在了上甘岭。一号坑道先后进入的官兵有三四百人，最后只有八人生还！19日晚间上高地的一三四团八连，只剩下连长李宝成、指导员王土根和通讯员三人。李宝成在撤回的路上，见路边一段不足一米的树干上，嵌满了子弹和弹片，粗粗数来不下一百，他让通讯员扛回来，准备留作纪念，后来被陈列在十五军的军史展览馆。而王土根带回的军旗，十四天前还是崭新的，八连每一次反击，就插上阵地一次，沐浴过数不清的枪林弹雨，现在这面不到两平方米的旗帜上，竟然密密麻麻布满了多达 381 个弹洞，1962 年中国军事博物馆建成开放时，这面记录了上甘岭辉煌的军旗就是最珍贵的藏品之一！四十五师的炮兵、通讯、观察和后勤机构仍留在原地，继续保障十二军的作战，其余部队全部撤出上甘岭战区，至兵马洞地区休整。与此同时，李德生率三十一师师部人员抵达德山砚四十五师师部所

在地，开设五圣山指挥所。

11月6日，美第八集团军新闻发言人向新闻记者坦言：“美军在三角形山（即597.9高地）确实失败了。”这一天，恰巧是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式就职的日子，朝鲜战争巨大的伤亡才使得美国民众将竞选口号是结束朝鲜战争的艾森豪威尔选为新总统，希望这位在二战中曾指挥过诺曼底登陆的前陆军五星上将尽早结束这场噩梦般的战争。

597.9高地的形势稳定后，战役的重点自然转移到了537.7高地上，李德生指定三十一师副师长李长林坐镇九十二团指挥所，指挥537.7高地的反击。

11月8日，九十二团到达上甘岭，秦基伟只给了三天的准备时间，计划11日发动反击。李长林向秦基伟反映，部队刚经过长途行军，没有弹药，不熟悉地形，三天的准备时间太短，反击恐怕难以奏效。秦基伟随即表示在537.7高地坑道的部队已经断粮断水十余天，情况异常危急，而且再拖延下去，韩军的阵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反击的困难会更大。自从10月29日的反击，一三三团有四个连进入537.7高地，经过激战后仅剩24人退守七号坑道，由于随后十五军全力集中于597.9高地，对七号坑道十一天中没有任何支援，其中17人冻饿而死，余下的7人于8日凌晨突围。秦基伟获悉后，殊为愧疚。李长林见此，再无话可说只得克服一切困难，加紧进行反击准备。为确保反击的胜利，李长林决心以九十二团最精锐的红军连一连的一个排于反击之日前一晚秘密潜伏在高地下，实施中心突击；以三营兵分两路，对高地实施两面夹击，形成向心攻击之势。

11月11日，原定反击时间为十八时，但中午过后

天气突变，雨雪交加，能见度很低。秦基伟当即决定乘此天气，敌机无法出动的有利时机，提前两小时发起攻击。但一连的尖刀排已经潜伏在高地下，为隐蔽起见既没有携带无线步话机，又没有架设有线电话，无法通知。九十二团团长李全贵只得临时改由原担任二梯队的一连三排担当突击任务。十五军炮火准备共使用火炮近百门，发射炮弹万余发，创造了战役期间每小时发射炮弹的最高记录。炮火准备刚停，九十二团的一个营又两个排就冒着纷飞的雨雪发起了进攻。由于几十天的激战，537.7 高地的地形完全被炮火打得变了形，而九十二团担负攻击的连、排长战前也只是在 1000 多米外看过 537.7 高地朝北一侧的地形，对高地的地形极不熟悉，好多班排都把自己的攻击目标搞错了，但凭借着出色的单兵作战技巧和小部队作战经验，即便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仅一个多小时就完全占领 537.7 高地，与坑道部队会合。秦基伟立即命令抓紧抢修工事，准备迎击美军反扑。由于反击时在狭小地域里投入部队过多，因此伤亡也大，九十二团反击部队共伤亡 300 余人，占反击部队总数的 60%。

11 月 12 日清晨，韩军第二师三十二团就开始了反扑，该团在整个战役期间因为伤亡巨大进行过三次整补，由于韩军自 1952 年起在美国的支持下组建了新兵训练所和陆军训练中心，所有新兵都必须经过九周的军事基础训练才可编入部队，而班排长都必须经过训练中心严格培训才能任职，所以战斗力比战争初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即使是刚补入部队的新兵也都因为经过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具有基本的作战技能，而反观志愿军一方，补充的新兵几乎都是刚入伍的，连最基本的瞄准射击、

投弹都还是在行军路上突击学习的，其战斗力自然无法与韩军的新兵相提并论，因而部队的战斗力日渐衰竭。

——537.7 高地的防御态势极为险恶，坑道因多日炮火轰击而大都倒塌，临时抢修的一些简易野战工事，根本承受不起炮火的轰击，加上美韩军还可以从注字洞南山和 537 高地进行火力支援，537.7 高地守备部队是在几乎没有防御工事的条件下应付三面火力，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很多战士是利用炮击的弹坑来躲避炮火，鏖战一直持续到下午十七时许，九十二团只掌握着 1 号、6 号和 9 号阵地的各一半，而付出的伤亡又高达 300 余。

11 月 13 日，九十二团继续依托着三个都只有一半的阵地，顽强坚守，尤其是在 6 号阵地上的二连一排 19 人，利用战斗的短暂间隙，就凭着双手，挖成一条交通壕、五个防炮洞和七个单人掩体，就凭着这些简易工事，与敌苦战了整整一天，击退了敌十一次攻击。九十二团虽然还控制着一小部分阵地，但投入战斗的两个营已伤亡惨重，难以继续作战，李全贵团长只得将正在担负火线运输的二营调上来，二营原是为了保证反击作战急需的弹药而被抽调去进行火线运输的，武器装备都在后方统一保管，现在要紧急上战场只好用伤亡者的武器和战场上搜集到的敌军武器匆匆装备起来，当晚对 537.7 高地进行了反击，除了 7 号、8 号阵地外，一举将其他阵地都夺了回来。原本李全贵团长还准备组织反击，将这两个阵地也夺回来，但李德生鉴于九十二团已经伤亡了 1400 人，不愿将九十二团消耗殆尽，命令九十二团将阵地移交九十三团，撤下来整补。

11 月 14 日，九十三团除一营仍在 597.9 高地外，二营三营全部投入 537.7 高地。该团前身是赫赫有名的

“朱德警卫团”，抗日战争期间的 1941 年 11 月，为保卫黄烟洞兵工厂与日军激战八昼夜，将来犯之敌击退，因而荣获“黄烟洞保卫战英雄团”的称号，也是十二军的精锐团队。

激战至 11 月 17 日，九十三团的两个营因伤亡过大，丢失了五个阵地。当晚三营参谋长赵小山亲自率领四十余人组成的突击队，全力奋战，也只夺回了三个阵地。

三十一师投入五个营又一个连，激战七天，仍没有保住完整的 537.7 高地。

11 月 18 日，三十四师之一零六团由炮兵部队抽调的卡车运送，紧急从休整地调到上甘岭。该团从九十三团手中接防的 537.7 高地阵地，尚缺 7 号和 8 号阵地，这两个阵地与美军占据的 537 高地主峰山势相接，距离只有 50 米，防御难度极大。而且没有什么军事价值，纯粹是为了替朝鲜多争取一些国土。李德生不愿再为这两个阵地付出战士的生命，特意嘱咐一零六团团长武效贤，对这两个阵地不必部署部队，只用炮火控制。李德生还给一零六团加强了一个营，要求该团能坚持到底，不再使用其他部队。

一零六团是由 1938 年陈再道在冀南地区组织的抗日武装发展而来，解放战争时期是中野六纵的主力团，在鲁西南战役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进军中，立下过显赫战功。现任团长武效贤，二十六岁就当上了团长，是十二军最年轻的团长，带兵打仗的行家里手，在他任营教导员时，营里就出了闻名全军的“爱兵典型”王克勤；在后来当师长时，又出了训练尖子郭兴福，并总结出“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推广。

清晨五时，一零六团刚接防还不到三小时，韩军第

二师的进攻就开始了。韩军此次进攻的目标是 6 号阵地，6 号阵地是 537.7 高地西侧的突出部，地势又高，是西侧防御的要点，如果失守，不仅西面阵地不保，东面的 1、2、3 号阵地也很难守住，并且还能威胁到纵深的 448 高地。因此双方对 6 号阵地的争夺殊为激烈。韩军先是以 4 架飞机进行轰炸，接着又是长达近一小时的炮击，整个 537.7 高地落弹两万余发！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6 号阵地上唯一的一个坑道被炸塌，八连连长文法礼等二十多人全部牺牲。炮击过后韩军以一个连的兵力对 6 号阵地发起了集团冲锋。守备部队拼死抗击，双方的激战一直到次日，即 19 日晚，终因部队伤亡过大，6 号阵地落入敌手。

20 日四时，九连就发动了反击，一班负责主攻 6 号阵地，经数小时恶战，终于将 6 号阵地夺回，而一班也只剩高守余一人了，天刚亮，韩军的攻击就开始了，高守余从天亮到黄昏，用手榴弹、爆破筒独自裹伤而战，击退了韩军六次冲锋，这中间由于韩军密集的炮火封锁，他得不到任何支援，一天就吃了口袋里三颗祖国慰问团带来的糖果，坚守住了至关重要的 6 号阵地。战后，他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孤胆英雄”的称号。到了黄昏时分，作为首批上高地的部队三营经过三天激战，已经连一个完整的排都没有了。武效贤只好将二营调了上来，考虑到已经指挥三天战斗的三营长权银刚对地形、敌情都比较熟悉，指定由他继续指挥二营。

武效贤见三天部队就伤亡了 600 余，照这样打，他的这个加强团最多能守十天，所以就向李德生请求改变战法，他认为守住 537.7 高地的关键是保存部队，在 537.7 高地北侧山脚下，有两个总共可以集结一个加强

连的屯兵洞，但从山脚到山顶还有五百余米的路程，在敌猛烈炮火下，增援部队通常有一半人就在这五百米路程上伤亡了，他建议在这五百米的路程上，每五十米挖一个防炮洞，在距山顶二十米处再挖一个能容纳一个排兵力的坑道。这样，部队沿着防炮洞进行蛙跳式运动，最后在坑道里集结，阵地上伤亡一个，就从坑道里补充一个。可以大大减少在运动途中的伤亡，集中最大兵力坚守阵地。李德生采纳了这一建议，给了他一周的时间按这一计划修筑工事。

一零六团在 12 门榴弹炮和 40 门迫击炮的火力掩护下，冒着夜间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突击修筑。团政治部号召：一昼夜挖掘一米以上的防炮洞就给予记功！经一周的艰苦努力，终于在阵地上挖掘了七条坑道、十二个屯兵洞和五个防炮洞，建成了完备的防御体系。这样，一零六团只需集中兵力坚守关键的 6 号、2 号阵地，其他阵地白天用炮火控制，晚上组织小部队出击，一下子伤亡大减，士气大增，不仅有足够的兵力完成防御，还有多余的兵力进行反击。至 25 日，除 7 号、8 号阵地外，其余阵地全部恢复并得到巩固。

11 月 25 日，韩二师伤亡已逾 5000，第四次撤下战场整补。由军团预备队韩九师接替其攻击。

12 月 3 日，韩第九师发动了对 537.7 高地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仅空中支援的飞机就高达 200 架次，地空火力的联合轰击持续两个多小时，整个高地被爆炸的烟云所笼罩，2 号阵地坑道终于承受不住猛烈的轰击而倒塌，二连一个加强排除一人外全部被埋在坑道里，炮火刚一延伸，韩九师一个团就蜂拥而来，2 号阵地上唯一没有来得及进入坑道而躲在岩石缝里的战士，端着

爆破筒冲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因这个加强排全部牺牲，所以这位勇敢的战士的姓名也就无从查起。又是一整天惨烈的争夺，阵地易手十余次，黄昏时分，韩九师终于不支，撤出了战斗，阵地再次得到了巩固。经此一战，韩九师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

12月15日，一零六团顺利完成使命将537.7高地移交给二十九师。

战史上一般就把11月25日作为上甘岭战役的结束之日。

第三 战役小结

(一)

上甘岭战役从10月14日至11月25日，历时四十三天，双方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投入的兵力、兵器逐步增加，由战斗发展为战役。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二十九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二十五次，营以下冲锋六百五十三次。最终只失去了537.7高地前沿的两个班阵地。

战役中志愿军共投入步兵为十五军四十五师之一三三团、一三四团、一三五团，二十九师之八十六团、八十七团；十二军三十一师之九十一团、九十二团、九十三团，三十四师之一零六团，合计十五军5个团，十二军4个团，共9个步兵团加上战役中陆续补充的2000余新兵，共4.3万余人。投入炮兵部队有：炮兵第二师、炮兵第七师、火箭炮第二零九团，第六十军炮兵团，共11个炮兵营，计火箭炮24门、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10门（不含迫击炮）。高炮部队有：高炮第六零一团、六一零团各一部，高炮独立第二十营、独立第三十五营，计高炮47门。

供应各种物资 1.6 万吨，实际消耗 1.1 万吨。其中弹药 5514 吨，平均日消耗 128 吨，战役中共发射炮弹 40 余万发。这一物资消耗量为我军战史上所罕见。为保障后勤供应，共投入运输车辆 2163 台次，火线运输人员 8500 余人，动员民工 6 万余人。

十五军阵亡 5200 余，伤 6200 余；十二军阵亡 1900 余，伤 2300 余。合计阵亡 7100 余，伤 8500 余，共伤亡 1.56 万。击毁敌大炮 61 门，坦克 14 辆，歼敌 2.5 万余，其中美军 5200 余。敌我双方伤亡比为 1.6：1。

美韩军共投入步兵 10 个团又 2 个营，其中美第七师 3 个团、韩第二师 4 个团、韩第九师 3 个团、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空降兵 1 个团：美军第一八七空降团。地面部队合计 11 个团又 2 个营。加上补充的韩军第一零五编练师和 4 个新兵联队，共 6 万余人。炮兵十八个营，105 毫米口径以上火炮 300 余门。坦克 2 个营，170 余辆。航空兵 1 个大队，飞机约 100 架，共出动约 3000 架次。

消耗炮弹 190 余万发，航空炸弹 5000 余枚。最激烈时一天中就消耗炮弹 30 万发，航空炸弹 500 余枚。

美方宣称杀伤志愿军 1.9 万，自身伤亡 0.9 万。

（二）

上甘岭战役是在两个连阵地上进行的，作战地域之狭窄，投入兵力之多，战役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猛烈，伤亡之惨重，战斗之激烈，都是古今中外战争史所罕见。

上甘岭是对志愿军以坑道为骨干防御体系的严重考验，通过这次战役显示了坑道在敌优势火力下进行防御作战的巨大作用，使志愿军取得了依托坑道进行防御的初步经验。战役中，守备部队主要以坑道为依托，利用

阵地上的既设工事进行防守，坚守坑道只是在表面阵地失守的情况下为保存有生力量，疲惫消耗敌人，赢得反击准备所必须的时间而不得已所采取的手段。而且坚持坑道斗争必须在坑道里人员、物资条件允许，与上级通讯联系畅通的情况下，坚持一定时间，并要抓紧时机向坑道及时补充人员和物资，还必须要有纵深部队的战术、火力、物质、精神的有力支援。同时，坑道部队也要积极组织班、小组为单位的小规模偷袭、强袭、骚扰等战斗活动，对占领表面阵地之敌进行反击或牵制。纵深部队则要组织狙击手或火炮压制敌对坑道口的破坏，切实保护坑道。恢复阵地的基本方法是组织强有力的反击，其具体方式可以是坑道内外部队相互配合，里应外合；也可以将部队事先运动进坑道，再依托坑道发动反击。并且要有反复争夺的充分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通过战役的实践，志愿军也摸索出一整套坑道战术，主要是“少、近、狠、快”。少是指使用兵力要少，一般以一两人对付敌班进攻，以小组对付敌排进攻，以班对付敌连进攻；近就是指将敌放到 20 米至 30 米的近距离再开火，既能使敌猛烈炮火失去作用，又能给进攻之敌沉重打击；狠是指对突入阵地之敌要力争全歼，把敌打痛，使其产生恐惧；快是要求从坑道跃出快、战斗结束回撤快，反击距离不超过 100 米为宜。这样可以节约兵力，减少伤亡，完成防御任务。

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解决了在敌极其猛烈的火力之下减少伤亡，保存有生力量的难题，有效地削弱了敌在技术装备上的优势。即便在失去表面阵地的情况下，守备部队仍能退守坑道来配合二线部队实施反击，抗击并粉碎敌之进攻，证明了坑道在以劣势装备进行坚

守防御中的优越性。

在作战中，炮兵的作用进一步得到提高，虽然志愿军发射的炮弹数量只相当于美韩军的 21%，火炮的口径也多不及，但通过灵活的机动和集中使用，已经能够与敌炮兵进行大规模的炮战。具体应用上，反击中，在步兵攻击前实施炮火准备，一般可摧毁敌工事 70%以上；防御中，以集中火力拦截敌冲击队形或阻止其在占领表面阵地后扩张战果。据不完全统计，美韩军在战役中的伤亡有 70%是被志愿军炮火杀伤的。

因为作战区域狭小，美韩军又多采取集团冲锋，攻击队形密集，攻防转换节奏快，在志愿军所装备的武器中，马克辛重机枪火力虽猛，但枪体笨重，结构复杂，又需要加水冷却，使用极不方便；捷克轻机枪射击精度高，但卡壳率较高，需要不断抹油维护保养，也不适应激烈的战斗；苏式轻机枪火力猛，但射击时弹匣转动声响大，夜战中容易暴露目标；苏式五零冲锋枪枪体轻便，射击速度快，但弹匣容量小，转眼之间子弹就消耗完了。相比较之下，投掷弹药深受欢迎，特别是加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更为战士所青睐。很多战斗几乎都是靠手榴弹和手雷取胜的，四十五师在 23 天的战斗中，就消耗 10.65 万颗手榴弹，4.6 万颗手雷和 1500 余根爆破筒，这还不包括搜集敌方遗弃的手榴弹、手雷。

完全可以这么说，上甘岭胜利的三大法宝就是坑道、火炮和手榴弹。

这场战役也反映了后勤在现代化战争中重要作用，志愿军在战役中物资消耗之大，尤其是炮弹的消耗量，是史无前例的。志愿军后勤机关在秋季反击作战的物资储备基础上，实行重点保障，对上甘岭的所有需要竭尽

所能予以满足，还动用了后勤部门留做机动力量的汽车连加强运输保障。十五军也组织师、团机关人员，甚至使用战斗部队进行人背马驼的火线运输，但从纵深到前沿的运输线，由于美军严密炮火封锁，无论人员的增援，还是物质的补充，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效果并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坑道部队的困难。

在极端残酷艰巨的战斗中，志愿军政治动员工作的威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十五军开展了“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硬骨头运动，并在强调与阵地共存亡的基础上，提出了阵地要存，人也要存，对革命英雄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战役中涌现了许多以无比的英勇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危急时刻与敌同归于尽、以身体堵塞枪眼的英雄壮举。在坚持坑道斗争中，面临敌军的破坏、坑道里空气浑浊、缺粮断水、建制混乱的情况下，组织临时党支部和党小组，领导官兵团结奋斗，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终于配合纵深部队恢复了阵地。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才是胜利的最重要原因。

（三）关于上甘岭战役，长期以来，有着三个问题一直存在分歧。

其一，上甘岭与五圣山的关系，很多人认为上甘岭一失，五圣山就会不保。五圣山确实是当时志愿军中部战线的咽喉要点，一旦失守将会震撼全局。而上甘岭战役双方拼死争夺的两个高地仅仅是五圣山的前沿门户，要知道五圣山海拔 1061.7 米，几乎是这两个高地的一倍，而且山势极为陡峭险峻，据说，秦基伟登上五圣山观察地形，下山时因山路太陡，无法走下来，竟然是坐着顺山坡往下滑。要攻占这样难以通行的山峰，简直是

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即使上甘岭的两高地全部失守，五圣山也不一定会失去。在上甘岭的鏖战，主要是从停战谈判实现就地停火的原则考虑，为朝鲜尽量多争取一些国土。冷静理智地想，为了这样 3.7 平方公里的山地，付出了 1.56 万人伤亡的代价，是否值得？

其二，关于什么时候判明美军的主攻方向。不少资料包括一些权威的史料，都认为从战役的第二天起，志愿军就已判明了美军的主攻方向。其实，15 日志愿军总部给十五军的电报，是关于反击注字洞南山计划暂不进行的答复，只字未提上甘岭战斗，何以证实判明了主攻方向？上至志愿军总部、第三兵团，下到十五军，15 日都没有兵力部署上的变动。对美军的作战意图、主攻方向都是经过三四天的战斗才逐步明确的。为此，秦基伟在战后的总结会上还对战役最初几天由于没有及时判明敌主攻方向，致使上甘岭地区的兵力、火力部署都较少，一开始就处于被动而进行自我检讨。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秦基伟对自己的要求之高，治军之严。十五军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处变不惊，反应迅速果断。并顶住了美军第一天猛烈进攻，寸土未失，足以显示出十五军高超的军事素养。

其三，关于战役中十五军与十二军的关系，有的认为十二军仅仅是扫尾巴收摊子；有的则认为战役应一分为二，前 23 天是十五军，后 20 天是十二军。实际上，十二军投入 4 个团，占参战部队的 44%；伤亡 4200 余，占战役总伤亡的 27%；歼敌 1.2 万，占总歼敌数的 48%。绝非是简单的扫尾巴。另外 11 月 5 日，志愿军总部的命令中明确将十二军五圣山指挥所划归秦基伟指挥，而且十二军参战时，十五军炮兵、观察所、后勤机关仍担负

着保障作战的使命，应该说十二军是配属给十五军的，作为战役的二梯队投入作战的，一分为二的说法是过于草率了。十二军是一支比十五军历史更久远的部队，上甘岭战役前，十五军还可以说是默默无闻，而十二军早就因累累战功名扬天下，此役配属给十五军，识大体明大局毫无怨言，使得十五军在指挥上毫无顾虑，显示了一支老部队的谦虚与成熟，而战役中同样不凡的表现，为战役的最后胜利画上了圆满句号。可惜被十五军的辉煌所掩盖，很多人并不知道十二军在上甘岭的出色战绩，令人惋惜，但其同样光荣的功绩是不应被忽视的。

上甘岭一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向世界显示了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美第七师和韩第二师在战役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迫使美军将战略预备队美第二十五师和韩第九师调上来，进一步加剧了其后备兵力不足的缺陷，并彻底消除了中朝方面关于能否在美军绝对优势火力下坚守阵地的忧虑，使得战线更加稳定，从而加速了谈判的进程。

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因为此战中的指挥得当，职务也逐步升迁，最后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88年在我军第二次实行军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参与战役后半阶段作战指挥的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后升任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沈阳军区司令、国防大学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十五军在战役中涌现出以特等英雄黄继光为代表的各级战斗英雄共 12383 人，占该军总人数的 27.5%，以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八连为代表的英雄集体 200 余个。在四十三天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

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就有三十八位之多！这种视死如归的壮烈与坚持坑道十四昼夜的顽强，使得上甘岭成为五六十年代英勇顽强的代名词，上甘岭的精神成为一代人学习的榜样。也激发许多艺术家以上甘岭为素材，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等。

1961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成立空降部队，空军司令刘亚楼从三支陆军挑选出的骁勇劲旅中，一下就选中了十五军，从此，十五军就成为中国唯一的空降军，这一殊荣就源自上甘岭的辉煌。

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工

1952 年 8 月 1 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 6 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以毛主席为首的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锹土，奠下纪念碑的基石。后经全国广泛讨论，确定碑型。到 1952 年，全国优秀的建筑师和专家们共设计了一百多种图案，经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各界人民的意见，归纳、修正成最后的图样。

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 3000 平方米。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共高 37.94 米。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台阶。

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 50.44 米，南北长 61.5

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汉白玉大型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渡江战役为主题。在渡江战役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装饰性浮雕，主题分别为支援前线 and 欢迎人民解放军。

浮雕高 2 米，总长 40.68 米，共有约 170 个人物形象，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史实。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

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碑身是一块长 14.7 米、宽 2.9 米、厚 1 米、重达 60 多吨的大石。碑身正面（北面）镌刻毛泽东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整座纪念碑用 17000 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肃穆庄严，雄伟壮观。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 7 个组，进行工作。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纪念碑于 1952 年 8 月 1 日正式动工修建，1958 年 4 月

22 日落成，同年 5 月 1 日隆重揭幕。

小资料

1952 年 2 月 1 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大会，公审 7 名大贪污犯。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因贪污罪行严重（宋贪污 6.4 亿元以上，薛非法所得 23 亿元以上）又拒不坦白而被判处死刑。

1952 年 4 月 9 日，授予郭沫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典礼在莫斯科举行。郭沫若在授奖仪式上说，我在此接受奖金，不仅是我个人的无上光荣，也是中国人民的无上光荣。他即兴朗读了他的诗作《光荣与使命》，以表达他激动的心情。

2 月 29 日 美国飞机共 14 批 148 架次侵入我国安东（丹东）、抚顺、凤城等地。先在抚顺后来又在其他地区散步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对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

3 月 8 日 我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我国人民，侵犯我国领空。

3 月 14 日 政务院 128 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其任务是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3 月 19 日 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其他病媒昆虫。

7 月 10 日 人民日报发表《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在美国政府不顾国际禁令，向朝鲜和我国进行细菌战的

时候，我们更有必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8 月 中央防疫委员会在北京举办爱国卫生运动展览，并先后在北京、广州、昆明、武汉巡回展出，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到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2 月 8 日至 13 日 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决定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列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会议奖励了 150 个爱国卫生模范单位和模范个人。

世界部分

世纪回眸

世界“雾都”的劫难

素有世界“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每当春秋之交，经常被浓雾所笼罩，像是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据统计，伦敦的雾天，每年可高达七八十次，平均 5 天之中就有一个“雾日”。英国著名的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就曾写道：“绝大部分伦敦人所呼吸的别无他物，老是一些又浓又浊的烟雾，外加一种又脏又臭的气体直入肺腑，使得全伦敦患粘膜炎、哮喘、肺结核的人比全世界患这些病的总人数还一要多。”

然而谁会想到，在不知不觉间，伦敦的茫茫大雾竟成为杀害众生的刽子手：1952 年 12 月 4 日，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推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期间，有 4700 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雾散以后又有 8000 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1952 年 12 月 3 日清晨，伦敦气象台报告说，一个冷峰将在夜间通过，中午气温可达到 6 摄氏度，相对湿度约为 70%。对于本地来说，这是个难得的好日子，一个可爱的冬日。

这一天，从北海吹来一股风，吹遍了整个英格兰，将英国中部的工厂和城市居民住户中烟囱内冒出来的团

团浓雾吹到了九霄云外，因而空气变得十分清新怡人。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灾难正悄悄地来临。

傍晚时分，伦敦正处于一股巨大的高气压气旋的东南边缘，较强劲的北风围绕着这个反气旋顺时针吹着。第二天，即 12 月 4 日，这个气旋中心已到了伦敦以西几百公里处，沿着通常的路径向东南方向移动。上午风速变小。云层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时至中午，乌云把太阳全部遮住。伦敦上空阴霾弥漫，气象台温度表的读数为 3.3 摄氏度，相对湿度上升到 82%。12 月 5 日，一个异常的情况出现了。伦敦气象台的风速表测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量度——风速表读数为零。据当时专家的估计，此时风速不超过每小时 3 公里。整个伦敦处于无风状态，到处都是雾，站在泰晤士河桥上四面望去，恍如置身在白茫茫的云端。

浓雾中，多家店铺白天都掌着灯，马路上只有少数有经验的司机开着车灯在行驶。飞机航班已被取消，火车只能缓缓移动，只有地铁仍在快速移动。一些地方能见度在 1 米之内，人们刚走几步便迷失方向。一位医生要出诊，甚至雇佣盲人做向导。美国卫星教育部大气污染防治局局长普兰特博士这样描述到：“当一我们乘坐的飞机抵达伦敦时，因为伦敦机场浓雾弥漫，所以飞机只得在伦敦南 32 公里的多意奇机场着陆。在机场，刚一推开机舱门，一股硫黄和煤烟的气味扑面而来。下了飞机，听人说夜里在伦敦街道上散步，口中似乎有金属的味道。鼻子、咽喉及眼睛受到了辛辣的刺激，很像剥洋葱时的感觉。傍晚，从旅馆的窗户往下望去，经过的人群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用围巾、口罩、手套等捂着鼻子。”

烟雾穿门入室，加速了支气管和心脏病人的死亡，

数以千计的居民感到胸口窒闷，并伴有咳嗽、喉痛、心慌、恶心等症状发生。从烟雾发生的第一天起，受烟雾毒害的病人接连不断地被送进病房，哮喘和咳嗽声充塞着整个医院，危重病人临终时的痛苦情况难于言表，尸体不断地被拉走……直至 2 个月后，恐怖气氛仍然笼罩着伦敦。

大雾一直持续到 12 月 10 日方才散去，强劲的西风带来了北大西洋清冷的空气，吹散了伦敦上空阴霾，也拂去了人们脸上阴云。灾难过后，科学家们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终于弄清楚烟雾毒害的原因。煤炭燃烧时释放出的烟尘中含有一种三氧化二铁的粉尘，它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氧化成硫酸液滴附在烟尘或雾滴上，一旦被人体吸入，就会产生胸窒闷、咳嗽、喉痛、呕吐等症状，使支气管炎、肺炎、肺癌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成倍增加。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遭到指控

生物武器是和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并列的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一。对于使用生物武器的指控主要是针对冷战时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在 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和苏联指控美国对中国和朝鲜使用了大范围的生物武器制剂，细菌和毒菌病原体以及昆虫传病媒介，1952 年又一次做出指控。他们声称生物武器制剂的使用攻击了人类、植物和牲畜。这个指控被组织成为世界范围的宣传运动，并提交到联合国；这不仅仅是新闻传播的简单问题。美国政府官员否认了这项指控，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可能确定这项指控到底是正确的还是虚假的。然而，1998 年 1 月，日本报纸产经新闻的记者发表了从

前苏联档案的十二份文件中得到的发现，提供了确实和详细的证据，证明了这项指控是人为捏造和欺骗性的。其中一份文件（其中的片断）的日期是 1952 年 2 月 21 日，其他十一份文件的日期是从 1953 年 4 月 13 日到 6 月 2 日，是在斯大林 1953 年 3 月 5 日逝世后的四个月期间。尽管这十二份文件远不能构成事件的完整历史，他们还是至少部分地描述了这项指控是如何由中国官员和苏联顾问密谋出来的，并指出了参与这个过程的几个具体人物的名字。这篇文章简要提供了这项指控的历史以及这些文件揭开的主要事实。

1950 年 6 月 25 日，北朝鲜侵略了南朝鲜。中国的军队力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1950 年 10 月开始跨过了鸭绿江加入了战斗。在 1951 年春天，中国的新闻媒体三番五次地宣称美国在使用化学武器（毒气）来对付中国部队。（共产主义新闻媒体已经声称美国把芥子气运到了朝鲜。）同时，中国也开展了可以看作是对后来的指控的准备运动，指控美国正准备使用生物武器。（这两场运动下面都会进行更详细的讨论。）第一次记载的对美国确实使用生物武器的指控发生在 1951 年 5 月 8 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或北朝鲜）的外交部长给联合国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发了一封电报，声称美军在 1950 年 12 月到 1951 年 1 月期间在朝鲜使用细菌生物武器并引起了天花的蔓延。几周以后，这个问题基本不再提起，一直到 1952 年初。

1952 年 2 月 22 日，北朝鲜的外交部长又向联合国秘书处签署了一份官方声明，指控华盛顿实施了生物战。（很明显这份声明在 1952 年 3 月 29 日才转交给联合国。）它指责美国在 1 月 28 日、29 日、2 月 11 日、13 日、15

日、16日、17日向北朝鲜领土空投了多种感染鼠疫、霍乱和其他疾病的昆虫。两天以后的2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公开支持北朝鲜的指控。3月8日，周恩来扩大了对美国的指控，声称在2月29日到3月5日之间美国派了448架飞机不少于68次进入中国东北空投携带细菌的昆虫。导致蔓延的人类疾病包括鼠疫、炭疽病、霍乱、脑炎和一种脑膜炎。周恩来还声称华盛顿散播了动植物疾病——飞禽败血症，以及十一次传播四种不同的植物疾病——使用十八种不同种类的昆虫和蛛形纲动物（蜘蛛和壁虱）以及小型啮齿动物作为传播媒介。他指出一些散布媒体——受到感染的抓斗、纸质封套、棉布容器以及各种各样的陶制和金属制的分格散发炸弹。

中国和北朝鲜政府试图通过使用两个他们自己选择的国际委员会来支持他们的指控，而这些操作是在高度强迫之下的。1951年9月，国际民主律师协会决定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到朝鲜去调查违反国际法的各种情况。在对使用生物武器的主要指控作出之后，委员会立即于1952年3月5日到19日之间访问了北朝鲜，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去了中国。在北京他们于1952年3月31日和4月2日签署了两份报告：有关美国在朝鲜所犯的罪行的报告，其中强调了对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指控，和有关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³⁾。这些报告作为正式战争罪行起诉书看起来意图非常清楚。第二份报告控诉美国违反了1925年日内瓦协议和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结论是：

我们认为以上所报告的事实构成了美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种族灭绝行为和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它成为笼罩在整个世界之上的巨大威胁，其极限和后果都是

不可预见的。

1952 年 4 月 7 日，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查委员会签署了一份更为明确的指控战争罪行的报告：

美国政府，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野蛮无耻的侵略时，不仅犯下了侵略罪行，还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和违反国际公约和法律以及战争惯例和法律的罪行我们要求这些美国政府和军队的负责人以及美国科学界中的腐化分子被冠以战争罪犯的罪名，被全世界的人民审判，受到严厉制裁。

据报道，这个中国政府的委员会于 1952 年 3 月 15 日开始了研究，假定是这一组人收集了证据，材料和证言呈交给了第二个国际团体——共产主义导向的世界和平委员会召集的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的事实调查国际科学委员会，也叫国际科学委员会。在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中国代表

宣布中国和北朝鲜政府认为国际红十字组织不具备能够摆脱政治影响的足够自由，从而不能够在这个领域实施无偏见的调查。这项反对后来扩展到联合国的特殊机构——世界健康组织。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是约瑟夫·尼德汉姆博士，一位著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他在 1942 到 1946 年间是在中国的英国科学代表团的领导。在那段期间，他担任（民族主义者）中国军队医疗管理局的顾问，并参加调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况。尼德汉姆也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 1952 年 6 月 23 日到 8 月 31 日访问北朝鲜和中国之后，国际科学委员会也写出了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的事实的调查报告，于 1952 年在北京发表。巨大的篇幅

包括 669 页有关的昆虫学、传播媒体、病原体、传染病学等等的详尽的背景资料，这些是委员会自己不可能得出的结论，因为他们的所处的位置和时间都不允许。国际科学委员会引证的事件和事件的种类比法学家报告的更少，反过来也比中国媒体声明报告得更少。两个委员会的调查非常类似。他们没有作出任何自己的实地调查或者分析。他们接受他们所接到的证言，并把它作为事实来报告。他们没有独立地证实过任何呈给他们的人造物品和材料。这些因素在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后的一些早期讨论中被清楚地提出来了。委员会中的瑞典代表在 1952 年 9 月从中国返回后告诉报纸 委员会的工作的科学基础就是代表们暗中相信中国和北朝鲜的指控和证据的事实。尼德汉姆博士自己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他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给他看的鼠疫杆菌确实如中国人所说的是来自一群反常的野鼠，他回答说，正如先驱日报报道的那样：我没有证据。我们接受中国科学家的话。有可能整个事件是一种爱国的阴谋。我情愿相信中国人不是在演戏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人民军的部队惯常性感染斑疹伤寒，霍乱和痢疾。另外，在去北朝鲜途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穿过中国东北，那是当时鼠疫流行的地区。联合国的部队，和朝鲜和中国的战斗员一样，遭受朝鲜出血热的折磨。在 1950 年晚冬和 1951 年早春，报告说天花和斑疹伤寒遍布朝鲜，不论是南部还是北部。联合国指挥部采取大批接种和大量使用杀虫剂滴滴涕，滴滴涕的空中喷洒普遍到了农村。在北部，成千上万的中国医疗工作者被派到前线后面的地区，匈牙利和东德的自愿医院单位也被派到了朝鲜。后来被称

作朝鲜出血热的疾病以前在朝鲜还不为人知，但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的中国东北地区已经流行，在那里驻扎着北朝鲜分遣队，他们在 1949 年以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并组成北朝鲜侵略军的突击部队。具体是在朝鲜中部的一个条状地带，这些北朝鲜军队作战的地方后来又被朝鲜出血热仍在流行的联合国部队重新占领。

中国和北朝鲜政府从没有声称击落过一架载有传播生物制剂的工具或生物制剂本身的美国飞机，虽然最终中国宣称 1952 年 2 月 29 日到 3 月 31 日之间就有 175 组美国飞机进行 955 次突击，在中国东北上空投放细菌武器。对于朝鲜的情况，中国声称美军已经在朝鲜 70 多个城市和县散播细菌武器根据不完全统计，有 804 次。中国确实获得了 25 个左右被捕获的美国飞行员的招供。许多招供包括大量的关于被指控的传播细菌武器的细节：炸弹的种类和空投的其他容器，昆虫的种类，他们携带的疾病，等等。在大量的技术细节当中点缀的是不计其数的在当时中国标准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共产主义修辞，例如帝国主义者，资本主义华尔街战争贩子，等等，这些让所有的观察者都怀疑这些招供是否出自那些假定证实它们的人之手。在美国空军返回美国之后这些招供都被否认了。曾是地面部队的犯人向国际科学委员会承认了他们在朝鲜用大炮散布细菌武器—传染病菌炮弹。

有几点和朝鲜战争细菌武器的指控高度相关的重要历史背景必须重提，因为它们形成了导致这项指控的环节链。第一点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细菌武器试验。这包括了在中国的占领区广泛系列的细菌武器研究设施和在中国试验性地使用细菌武

器。日本细菌武器研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 731 部队，基地在中国东北，由石井四郎将军率领。然而，还有另外三个细菌武器研究组织，100 部队，1644 部队和另外一个，每个部队都独立地在自己的指挥官的命令下行动。大多数高级军官和这些部队的官员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几天逃回了日本。他们的最高官员后来在日本由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审问，他们作出了一个关键的极其不得体的决定，这对加强后来对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指控的可信度起了很大作用：美国政府豁免了石井四郎将军，他的所有下属以及其他日本生物战部队的成员，换取了日本在战时生物战研究和开发中获得的技术情报。即使是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中国媒体发表文章重提二战期间日本的生物战，并谴责美国和日本准备生物战争。这些指控通常包括在抗议日本重整军备当中。

第二点是当苏联军队占领部分中国东北时，他们捕获了一些 731 部队的成员。在要求美国交出部队的其他高级官员而被拒绝之后，苏联于 1949 年 12 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市在一次战争罪行审判中审判了 12 个前 731 部队的成员。苏联然后要求美国释放石井四郎，和浦仪皇帝一起，接受审判，这个要求美国也拒绝了。在审判的时候，有两次迈克亚瑟将军的部队错误地否认了知晓任何关于战争期间日本细菌战的事情。在对哈巴罗夫斯克的审判进行汇报的时候，浦拉达说美国正在准备新的反人类罪行，也就是说，细菌战役。在 1950 年春天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又有一系列的苏联媒体报道指控美国正在准备细菌战争。审判的程序用英文发表了。从这些受审的人员那里得到的证据使苏联（和中国）获得了详细的关于细菌武器运输系统和日本在中国生产的方法

的技术描述。三年以后，这些就是他们指控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的方法。1952 年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的首章就是题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细菌战的关联。

此环节链的第三个环节是在 1951 年的前 5 个月，中国报纸和电台不断地提及石井四郎和日本战时细菌武器的试验，哈巴罗夫斯克的审判，石井四郎后来受雇于美国，以及对美国准备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

1951 年 1 月 9 日报道说迈克亚瑟和他的部队保护了日本战犯，特别是石井四郎，并雇佣了他和他的同事；

1951 年 3 月 7 日报道说石井四郎受雇于美国政府来指导在美国的细菌武器的生产；

1951 年 3 月 22 日报道说迈克亚瑟正从事于大规模细菌武器的生产，为的是对付朝鲜军队和人民并确定了迈克亚瑟的指挥部所花费在细菌生长媒介上的钱的金额。

1951 年 4 月 30 日报道说美国军队在使用中国人们志愿军作为他们细菌试验的试验品，并且指出在京都附近一个地点生产细菌武器制剂（京都这个地点是一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疫苗生产基地，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实际上购买日本生产的疫苗用于南朝鲜的公众健康问题）。在 北朝鲜政府的指控当中，美国还犯有在 Kochzhoko 岛和日本细菌战的战犯合作使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作细菌武器的试验的罪行。（联合国安理会文件 S/2684；指的可能是 Koje 岛）。

这一系列宣传在 1951 年 5 月 8 日北朝鲜外交部长作出美国在北朝鲜散布天花的声明时达到了顶峰。中国在 1952 年 5 月 19 日，5 月 24 日和 5 月 25 日进一步作出声明，说美国正在准备细菌战，并充分特别强调美国使用

战俘(在这里是朝鲜战俘)作为试验品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室测试。在 1951 年 6 月 22 日最后一次声明后,中国的运动结束了,尽管北朝鲜的声明持续到 7 月份,然后他们也停止了。

最后一点是在以上提到的 1951 年春的宣传运动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在 1951 年 3 月 5 日到 13 日之间发起了一场指控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毒气的运动。除了一系列的媒体报道之外,还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主任李德川博士向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 1951 年 3 月 14 日会议的一次呼吁,正式指控美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和毒气:

在朝鲜不断遭受战败之后美国侵略者无视世界舆论,并公开违反国际法,在朝鲜前线使用毒气我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坚决对美国当局提出抗议,全世界 68 个国家的一亿红十字会成员发出要求正义的吼声,并行动起来防止美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使用毒气的残暴行为。

中国声称美国在使用飞机传递之外还使用毒气炮弹,并宣布了收集了毒气弹壳并拍照。莫斯科电台和中国新闻社报道说²⁴ 军炮兵部队的列特拉瓦莫斯已经承认了美国在使用毒气。在指控中提到名字的唯一一种毒气是氯气。氯气是军事上最没有用处的气体,因为它在战场上能够达到的浓度很少能够致命。值得一提的是对美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在国际律师协会的美国在朝鲜的罪行报告中得到强调。然而这个报告说化学武器的使用发生在 1951 年 5 月 6 日到 1952 年 1 月 9 日之间。而中国的运动第一次开始谴责美国使用化学武器是在 3 月 5 日,后来在 1951 年 5 月 6 日前又指控了十次。1952 年 2 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力克也指控美国在

朝鲜使用化学武器。中国对美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零星地持续到 1953 年 5 月。然而当第二个组织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法学家的报告作出六个月后提交他们的报告时，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却只字未提。也没有提到所谓的使用中国和朝鲜战俘进行细菌武器的试验的指控。毫无疑问 1951 年化学武器的指控不具备正确性，在 1952 年对主要细菌武器的指控过程中也没有重复提起。那些西方公开表示相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对细菌武器的指控的人也从未提起先前的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最后有两点值得注意。在 1950 年春末夏初，就是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还有一场运动指控美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投放克罗拉多甲虫，为的是毁坏他们的马铃薯作物，使他们的人民挨饿，引发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因为生物战争包括使用感染人、动物和农作物的疾病制剂或传病媒介，这也是对使用生物武器的指控。东德发表了保罗·莫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和森林部的国务卿在 1950 年 6 月 15 日提交的报告，指控美国飞机在 1950 年 5 月到 6 月空投克克罗拉多马铃薯甲虫。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但是据说甲虫是在美国飞机飞行的路线下方发现的。东欧的媒体登载了据说是连在降落伞和气球上的马铃薯甲虫的容器的照片。1951 年 5 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部长指控西方帝国主义者今年又一次在我们的田地里散播克罗拉多甲虫，这一次远到东部的斯洛文伐克。另外在 1952 年 5 月，莫斯科声称一个在朝鲜招供的飞行员也承认了在 1950 年往东德投放克罗拉多甲虫。在随后的几年，波兰和东德学校的孩子经常短途旅行被送往波罗的海岸寻找甲虫。

在 1950 年，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也发出斯德哥尔摩呼

吁(或者斯德哥尔摩和平情愿书),要求无条件地把原子武器作为侵略武器禁止。这个呼吁书也把核武器和其他两种武器——生和化学武器共同列为大规模杀伤武器,在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获得了上百万的签名。在 1952 年的运动中,一个同样模式的抗议细菌战的呼吁书在 4 月 1 日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朝鲜都不属于联合国。因此就得由苏联在联合国推进这个指控,似乎是很明显苏联通过共产党,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其他前线组织安排了国际抗议。似乎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也进行了大量的新闻协调,还有更有帮助的协作。这场宣传运动还和其他同时进行的运动结合起来:1951 年初,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的院长发起了一场国内的憎恨美国人(或憎恨美国)的运动,1952 年 2 月 22 日宣布对生物战争的指控一天后,进行了反殖民主义战争国际日的庆祝活动。1952 年 3 月中旬到 4 月中旬的四周时间里,苏联报纸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报道对生物战争的指控。在中国,大概同一时期,报纸对细菌战役的报道比从前整个朝鲜战争都更广泛。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和平条约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约定签署。

美国作出的第一个官方否认是在 1952 年 3 月 4 日,答复 2 月 22 日北朝鲜外交部长的指控。美国国务卿笛恩·阿齐森说,我愿意绝对地毫不含糊地说明这些指控完全是虚假的;联合国部队没有使用过,也没有正在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武器。阿齐森在 3 月 26 日和其他场合重复这项否认。马修·瑞德维,联合国在朝鲜的部队的司令在 3 月中旬否认了这些指控,并补充到,这些指控很明显是为掩盖共产主义者没有能力来对付每年在整个中国

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流行和不能正当的照顾很多受害者而设计的。马修·瑞德维将军在 1952 年 5 月 22 日给美国国会的信中说联合国部队没有在任何时候使用过任何形式的细菌或毒气武器。联合国秘书长特莱格为·列也否认了这些指控。在 1953 年 3 月 14 日，当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力克把对细菌战的指控引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工作之后，美国代表本杰明·科恩重复了美国的否认。当苏联代表把被俘美国飞行员的招供分发给联合国全体会议第一委员会时，欧马尔·布来得利将军，美国参谋长最高联席会议主席，递交了否认书（1953 年 3 月 25 日），还有飞行员所属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团的指挥官们也作出了否认。

和美国官方否认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当时美国相关政策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62 号文件上发表，在 1950 年 2 月 17 日通过的事实。这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62 号文件说美国除了报复之外不会使用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武器。在 1953 年 4 月 2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147 号文件中（在朝鲜的可能行动的分析）中，同样的句子出现在标题下面，目前以下限制适用于联合国部队作战。这项政策只有在 1956 年 3 月 5 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5062/1 文件中作出变动，那是朝鲜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了。相关生效的条款允许美国首先使用：

在武装部队的军事效力会因为使用这些武器而增强时，美国会准备在普遍战争中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使用它们的决定要由总统作出。

很多人看得出来，这代表重大的转变。在普遍战争这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说明，但是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指挥部使用了除草剂和催泪气体。

美国政府对这些指控所作出的反应的第二部分和它的否认同样重要，或者更加重要。这就是立刻向联合国要求一个有能力的国际组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或者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现场调查。在他 3 月 4 日的第一篇声明中，阿齐森请求指控他们的国家允许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进行调查。就是在一周后，阿齐森直接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提出请求，请求他们在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曾请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调查对日本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还有在 1952 年，所说苏联阵营的国家的红十字会直接申请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对美国的暴行采取行动。24 小时之内，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 3 月 12 日申请中国和北朝鲜进行必要的配合。印度政府提出协助调查，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提出派一个由三位瑞士成员，两位印度人，一位巴基斯坦人组成的小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 3 月 28 日和 3 月 31 日又发出了同样的信息，并且在 4 月 10 日最后一次补充道如果他们到 4 月 20 日没有收到答复，他们就会认为他们的建议被拒绝了。在 4 月 30 日，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明确停止了努力。中国和北朝鲜都没有直接回复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唯一的答复是 3 月 6 日苏联代表马力克给联合国的，拒绝了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提议。中国确实在 3 月和 4 月在新中国通讯社作出回应，大篇幅谩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

委员会的行为标志着它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最邪恶无耻的同谋和走狗。它这么急于进行调查的背后目的明显是想看看美国侵略者空前无耻的罪行所产生的效果，并用一个毫无价值的报告来洗脱作恶者的罪行。

中国控告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或世界卫生组织调查

的唯一目的是收集情报，用于衡量细菌武器的效力。（但是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作为一个宣传平台还是可以接受的：在 1952 年 7 月 27 日中国代表在加拿大的一次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反对在朝鲜的残忍行为的提议。）中国和北朝鲜也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给疫区提供援助的建议。

1952 年 7 月，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要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进行调查的问题。他们提交了一个草案，号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进行调查并向联合国汇报。安理会的投票是十票赞成一票反对—苏联投了反对票。美国然后又提交了第二份草案，说安理会应该从作出指控的政府和当局拒绝允许进行公正的调查中得出结论，这些指控一定没有实质内容和虚假的；并可以谴责捏造和散布这样虚假指控的行为。对这个草案的投票是九票赞成，一票弃权，一票反对—还是苏联。1952 年和 1953 年在联合国全体会议上和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也有广泛的争议，不同的国家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澳大利亚，有些国家的政府把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文件提交给他们自己的科学家，而在所有情况下，他们报告说这样的评估得出的结论就是细菌武器没有被使用—或者更甚，基于这些证据，这些指控在观察员看来是荒唐可笑的。

在 1952 年和 1953 年联合国关于处理对细菌武器的指控的整个过程中，苏联不断地强调美国从来没有认可日内瓦公约这一点（公约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美国直到 1975 年才认可），并重复地号召美国这样做。美国最后作出一次努力促使联合国进行调查：1953 年 4 月 8 日，联合国的政治委员会批准了美国关于任命一个委员会进

行调查的建议。投票是 52 票赞成，5 票反对，3 票弃权。前一天，苏联突然出乎意料地收回它对细菌战的指控，作为它真诚争取和平的证明，以美国收回它的要求联合国对指控进行调查的提议为条件。美国高级官员认为苏联作出令人吃惊的极大转变仅仅是上个月斯大林死后苏联从事的整个‘讨人喜欢’运动的一部分。4 月 23 日联合国大会以 51 票赞成，5 票反对和 4 票弃权接受了美国的提议。在 7 月 28 日，联合国大会主席汇报说由于中国和北朝鲜拒绝协助，委员会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尽管新发现的文件证明苏联官员至少自从 1953 年就知道这些对细菌武器的指控是虚假的，至今苏联官员或者俄罗斯官员从未说明过对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是错误的。事实上，在 1982 年和 1983 年，苏联媒体继续重复了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了细菌武器的指控。还有很多其他情况，苏联利用对美国准备或者使用生物武器的错误指控来反对美国。在 1986 年至 1987 年间在无数次几乎涉及所有大洲的小型事件中进行过指控。

然而，通过省略或者间接手段，有不少明显的承认的情况。当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报告在 1969 年发表时，其中有以下陈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把细菌（生物）制剂用作战争武器的军事经历。联合国的报告是由十四个国家的代表签名的一致同意的文件，包括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没有特殊提及朝鲜战争细菌武器的指控，这个句子含蓄地承认了没有此类事件发生过。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注意到这几行相关文字或者意识到它的暗示，只有几位专家除外。两年以前，在 1967 年，苏联军事出版社印制了一本用于

培训军事部队的技术手册《细菌武器以及如何防御》。书中包含了对细菌武器的历史性回顾，根本没有提到朝鲜。在手册中紧接着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是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落叶剂的描述。另一个 1985 年出版的更为普及的《二战期间的苏联历史》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也许这当中最为显著的是 1988 年斯密诺夫将军，多年来直接参与苏联生物武器项目的苏联时代的卫生部长出版了一本题为《战争和传染病》的书。书中也没有提到所谓的朝鲜战争中细菌武器的指控，书中唯一关于朝鲜的是讨论联合国部队感染朝鲜出血热所遭受的痛苦。

取决于人们怎么理解一行文字，有一个很小的可能：有一次中国官员也考虑通过间接手段暗示同样的事情。1984 年 9 月当中国建议签署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约时，一位中国政府发言人说中国有一次是细菌和有毒武器的受害者。（附加了强调）。当时媒体报导理解为这是指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它的作用是省略了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和北朝鲜保持了对朝鲜战争细菌武器的指控，直到今天，还在无数的出版物中重复这项指控。在毛泽东去世时，或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和美国关系密切的顶峰时期也没有官方的改变。有很多关于标准的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武器的指控的印刷品。

中国当局发表了两个有关朝鲜战争细菌武器的指控的文件，一个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聂荣臻作出的，另一个是毛泽东对十天前聂荣臻发给他的相关信息的答复。1988 年出版的一个中国在朝鲜战争

期间的历史的书中包含了额外的材料，还有几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回忆录。这些都提到或者引用了上述的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最后，这些材料被两个在中国出生的现在在美国教书的历史学家于 1994 年和 1996 年在专题著作中进行了讨论。

1952 年 1 月 28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汇报说敌军飞机散布了天花病毒，2 月份还有进一步的报告。陈建认为 1 月 28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报告是第一次关于美军在朝鲜使用生物武器的汇报。2 月 18 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发出信息：

除了派(细菌学)专家(到朝鲜)进行进一步调查之外，我们已经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把所有在(战场)发现的昆虫传病媒介送回北京进行实验室化验，来证实这些昆虫到底携带了什么细菌。试验结果两天后出来，但是我们的专家估计四种病菌，例如霍乱，伤寒，鼠疫和猩红热是最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对志愿军)加强瘟疫预防和治疗。我们必须要求苏联提供细菌学专家和材料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张曙光陈述道聂荣臻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的总后部的卫生部门进行准备了。这比获得的第一个苏联文件，2 月 21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的日期早三天。最早(官方)发表的两分中国文件之一是毛泽东在 1952 年 2 月 19 日的答复，其中毛泽东用一句话指示周恩来注意这件事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付它。在这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概括了反细菌战的六项紧急措施：加速从前线送回来的昆虫传病媒介的实验室化验来确定所有的疾病病菌。立即派防疫队伍带着疫苗，电力和其他设备(前往朝鲜)。对世界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揭露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

行。并使用新闻媒体迫使美国对这场细菌战的后果负责。指示全国抗美援朝协会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抗议并要求大会发起反对美国细菌战役的运动。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发电报要求调动(普通士兵)进行传染病预防,同时命令东北军事指挥部也(为可能发生的病毒传播到东北)作好准备。给苏联政府发电报请求协助。

2月28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发了另一封信,这是两份公开发表的文件中的第二份。信上说美国仍然把昆虫细菌引入第38军和第50军驻地我们已经动员了44个中国科学专家—11个昆虫学家,15个细菌学家,6个传染病学专家,4个毒物学家,7个病理学家和1个营养学家—他们将于第二天2月29日飞往前线。

我们可以注意到三点。这时距1951年春天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短暂的运动几乎有一年了。第二,如果中国内部来源显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报告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是在1952年1月,那么1951年春的指控一定是欺骗性的。最后,从聂荣臻2月18日给毛泽东发电报到毛泽东2月21日给斯大林发电报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计划和作好指控的基础工作是不可能的。即使是1月28日到2月20或21日的时间也不够做这些事情。周恩来的备忘录推测起来是在传染病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的一个严重问题后才写的。

从前获得的信息指出中国有自己的调查委员会,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席李德川带领,但是也说明了只是在3月12日才被中国和平委员会号召成立,有附属人员25名,加上上面提到的专家们,只是在3月19日才前往中国东北和北朝鲜⁽⁴³⁾。那时,民主律师组织已经到了北

朝鲜两个星期了。然而，聂荣臻的信清楚地显示了专家队伍一定是在他写信的 2 月 28 日之前就组织好了的，并且他们在 3 月 4 日律师们抵达朝鲜之前就前往朝鲜了。推测起来并不是偶然，律师队伍的报告列出了对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的指控从 1 月 28 日开始，并一直持续到 3 月 4 日他们到达北朝鲜。中国当局在公开声明中宣称在中国领土东北开始的细菌战役不早于 2 月 29 日，这明显和聂荣臻的信相矛盾。

乔恩·哈历代和布鲁斯·库明斯 1988 年写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一本书中有一张 1952 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的照片。照片的说明写的是毛泽东用两句俏皮话问候代表们（原文如此）：不用大惊小怪！他们试图使用了生化武器，但不是那么成功嘛，’和‘他们空投的那些没有感染的昆虫是什么。’（44）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聪明的，因为虽然中国当局最终声称美国飞机将近进行了一千次细菌武器制剂和传播媒介的空投，他们告诉两个委员会由于美国如此大规模的努力而感染生病的人数是很少的。第二句话是难以置信的：两个委员会的报告，中国对国际机构的官方指控，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等等都声称那些昆虫是感染了病原体的。毛泽东的话可以马上解散任何真正的科学委员会并送他们回家。

1952 年联合国秘书长列嘲笑对细菌武器的指控。布雷克·齐斯合姆博士当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曾经参与过二战期间英国-美国-加拿大联合细菌武器研究开发项目，他说如果进行了细菌战，马上就会被人知道，因为上百万的人已经死亡了。西奥多·罗丝布瑞是美国战时细菌武器研究开发项目的主要人物，他曾经在 1947

年和 1949 年写了两本这个主题的书。他在 1960 年评价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时写道他说不出是否把它作为一部幻想小说来读，还是作为不正常的流行病研究来读，并且在第二种情况下它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完全不能接受。

由哈伯恩起草的兰德公司的报告发表于 1952 年 4 月，发表得非常早，最终看来是在主要的生物战争的指控的中期，但是这个报告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这些指控的进展。它对其动机的主要结论是指控毒气和细菌武器的运动的时间和内容表明它是为了应付特殊的状况而发起的，而且开展时注意的是战术上的而不是战略上的目标。哈伯恩判断这些战术上的目标是主要影响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美国国务院的情报和研究办公室的一份报告发表的时间也非常早，在 1952 年 6 月 16 日，但是看到了这些指控的更大的动机：

这些细菌战的指控的三重性质—残酷的暴行，国际法和裁军—以及世界和平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对它的支持，反映了它作为一个新的宣传主题对于莫斯科的价值。每年自定形式的和平运动已经把几个问题作为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基础：在 1950 年是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在 1951 年是五大政权和平盟约。

在 1957 年，马顿·施内德在荷兰也得出结论说这些指控纯粹是宣传，换句话说，是捏造出来的。

除了这两个都是由国际共产主义支持的委员会以外，对细菌武器的指控还有两个主要的西方支持者。两个人都长期和中国有联系，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极有同情心。詹姆斯·恩的科特是一个加拿大牧师，他出生在中国，是一个传

教士的儿子。他本人也成为一名传教士，于 1925 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中国传教。他是加拿大和平委员会的主席，于 1952 年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中国为这些指控作证，方式同那两个委员会一样。他是唯一一个根据中国官员提供的信息宣称美国实施了为期三周的细菌武器的烟雾喷洒的人。他的儿子史帝分·恩的科特是一个历史学家，继承了他的父亲，为这些指控进行辩护。

第二个人约翰·鲍威尔也是在中国出生的。他的父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立了中国每周回顾。鲍威尔在中国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并在 1945 年他 25 岁的时候，成为中国每周回顾的编辑和出版商。在朝鲜战争中这张报纸的立场就是南朝鲜侵略了北朝鲜。鲍威尔在中国呆到 1953 年 6 月，然后返回美国。

在 1971 年，最初的主要关于这些指控的学术研究发表在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化学和生物战争的文献上。在这种背景下，分析的目的不是争取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而是叙述历史来说明证实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的困难问题所在。因此它完全侧重于检查两个委员会的报告，他们操作的模式和他们对证据的描述。结果是人们从这两个报告提供的材料中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不是这两个委员会选择的结论—因为他们对给他们看的或告诉他们的证据出处都没有任何独立的了解。他们只不过是相信了所有的事情—或者更精确地说，根据他们的政治倾向。库可森和诺丁汉姆在一次更简短的检查当中使用了某些类似的分析方法并写道，有关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的问题，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目前作者的观点是没有使用和几乎是一致同意整个事情作为共产主义宣传而一笔勾销。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难以接受这意味着什么。当一位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1977 年写一篇论文主要概括和重申这两个委员会的报告中的材料并完全接受他们的结论时，他也指出西方公众意见的主流现在已经认为中朝的指控完全是宣传，但又补充道：但是，没有几个评论家费很大的劲儿明确地叙述这意味着什么。然后他用几行文字概括了这可能意味的东西，但是不能接受其中的暗示。

哈历代和库明斯在他们 1988 年写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中发现他们也处于同样进退两难的困境：

如果一个人要相信西方的案例，也必须通过它的逻辑结论，那就是北朝鲜和中国上演了宏大的欺骗的戏剧，包括动员了中国和朝鲜的成千上万人；使许多中国医生和科学家还有不计其数的次要人物，以及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高级人物来伪造证据，撒谎和制造出至少是一起极其罕见的医学骗局。尼德汉姆当时自己也承认一次爱国阴谋——也就是说一个巨大的骗局——是可能的。

然而后来在 1979 年和 1986 年的私人交流中，尼德汉姆保持了他最初在美国在朝鲜使用了细菌武器的立场。在 1986 年他写道前几年所发表的一切动摇并排除了我从前有的百分之三的怀疑。所以现在我是百分之百确信了。哈历代和库明斯的结论是目前的证据看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威廉姆斯和瓦莱斯在他们 1989 年写的关于 731 部队的书中有一章篇幅很长，是关于朝鲜战争细菌武器的指控的，他们也接受了指控的有效性。

另外有三个严肃的分析出现在 1984 年，1989 年和 1992 年。第一个是由一个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查里斯·考得雷发表的。考得雷不相信美国使用了细菌武器，但是

他对指控的目的有不同的理解。他提到指控的国际和谈判效用，但是他强调了在中国和北朝鲜邻近战争前线的后方区域内战争对公共健康的要求：

成千的士兵出去收集昆虫。很多天警察也驱赶市民做同样的收集。细菌武器的指控实际明显证明了是一种做事方法在内部对细菌武器的呼吁实际达到了为了阻止 1951 年情况再次发生进行医药预防的大规模运动的目的。

考得雷认为这些指控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在国内动员中国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抵抗传染病的公众健康运动。这是美国高级官员在 1952 年否认细菌武器的指控时提出的论点。

1989 年马克·赖恩在一本关于中国预料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书中有一部分囊括了对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指控。赖恩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考虑中国的指控是否是一个间接的方法来威慑制止美国在那次冲突中使用核武器。这个论点被亨利·基辛格和爱丽斯·喜于 1957 年和 1962 年概括提出过。在 1957 年，基辛格写道：

中国对我们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也显示了在心理问题上的共产主义技巧。这可能是为了防止我们用原子武器轰炸中国领土的计谋。

在 1962 年爱丽斯·喜也主要讨论了这个动机，对哈伯恩承认这个假设：

1952 年中国共产主义在对细菌武器的宣传运动中偶然提及原子武器，因此表明了这次运动是为了防止美国可能进一步使用原子武器而设计的，为了缓和国内对原子弹的焦虑和保持抵抗精神而设计的。

赖恩确信中国军事官员是认真对待细菌武器的指控

的，尽管他注意到关于化学武器的指控这所谓的化学武器的使用从来没有象生物武器那样成为人们高度注意的主题，引发媒体运动。如果这些指控是错误的，它在操作上所暗示的东西也让赖恩感到困惑：

如果对细菌武器的指控是中国从始至终策划的，第一眼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计划，包括协调准备和提交那些心照不宣的虚假的物质证据和上百名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证言。尤其有疑问的是怎样领导或引诱那些被送往朝鲜和中国北部的记录和抗击细菌武器的众多病理学，昆虫学，动物学，传染病学的杰出专家们（大多数都在欧洲和美国的一流学校里接受过教育和培训）捏造出那众多详细的报告和陈述呢？即使是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后来从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故意的还是疏忽的，泄漏过有关这样一个伪造的运动的任何方面呢？另外如果这些指控是虚假地捏造的，这似乎又暗示着对成千上万普通士兵，农民和市民的故意欺骗（主要是以秘密安插证据和获得作证等等的形式），继而接着欺骗成百个来到感染地区考察所收集的证据和作证的外国游客，代表团和通讯记者。赖恩接着得出了以下结论：

看来中国的细菌武器运动，无论它是否是全部或部分捏造的，也不管它是对现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现象的反应结果，它一定可以被看作是国际政治和心理学领域内非常成功的，甚至是绝妙的高招。基于武器的性质，证明指控真假的问题，和并非不合理的对美国实际或者将要使用细菌武器的怀疑，这场运动是帮助阻碍或者结束任何细菌武器的试验性使用的既直接又实际的方法，也是加强国际上对这些或者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谴责的方法。

最近的分析是历史学家牧恩写的。和赖恩一样，他大量使用了解密的美国 1945 年以后关于对使用生化武器的准备和执行阶层决策的美国档案，但是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牧恩绝对确信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牧恩强调美国高级官员的否认，美国要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或世界卫生组织对指控进行调查，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62 号文件的事实，美国除非是报复，不然不会使用化学、生物或放射性武器的政策声明从 1950 年 2 月 17 日开始生效，直到 1956 年 3 月 15 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 1562/1 号文件代替。然而，牧恩也注释到：

象所有的指控一样，它们从来没有被完全洗脱罪名；疑问至今还存在这个情形显示出这些指控还存在着一旦作出一项指控，就不可能完全证明它不成立，因为武器的性质使它几乎是看不见的。如果证明使用了它是困难的，那么要证明没有使用它是不可能的。疑问从未被完全排除过

土耳其和希腊加入北约

1952 年 2 月 18 日，土耳其和希腊加入北约。

北约成立于 1949 年 4 月 4 日，其宗旨是加强成员国在集体防务和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共同努力，促进北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和福利。北约成立时只有美国、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挪威、荷兰、葡萄牙和英国 12 个成员国。

在过去 50 多年里，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北约曾先后进行了 5 次扩充。

1952 年 2 月 18 日，土耳其和希腊加入北约。1955

年 5 月 5 日，联邦德国加入北约。1982 年 5 月 30 日，西班牙加入北约。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北约迅速调整战略，以全方位应付危机战略取代前沿防御战略，通过北约东扩竭力向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拓展影响。

从 1992 年起，波兰等东欧国家相继提出加入北约的请求。1995 年 9 月 28 日，北约正式公布东扩报告。1996 年 12 月 10 日，北约在布鲁塞尔举行外长会议，主要讨论了北约东扩、同俄罗斯关系和北约内部改革等问题。

1997 年 7 月 8 日，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正式决定，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加入北约。1999 年 3 月 12 日，上述三国正式成为北约新成员，从而使北约的成员国增至 19 个。

2002 年 11 月 22 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北约决定邀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北约。

1952 年芬兰举行夏季奥运会

地处北欧的瑞典和芬兰是现代体育开展较早的国家。历史上它们各自举办了一届夏季奥运会，在会徽中充分体现了北欧人的健美与活力。

1952 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会徽图案的设计简洁而清晰，主要表现了奥运主会场的标志性建筑奥运塔楼和奥运五环，意味着光辉的奥林匹克来到了千湖之国芬兰；同时，世人也能感悟到芬兰人对奥运的那份深深的敬仰和渴望之情。

冬奥会挪威奥斯陆举行

此前申办冬奥会的还有美国的普莱西德湖和意大利的科蒂纳丹佩佐。

奥斯陆是挪威的首都，始建于 1048 年，1624 年毁于大火后重建，改名为克里斯蒂安，沿用到 1925 年。奥斯陆工业发达，得益于水力资源，裘皮加工业有名，有裘皮之都之称。奥斯陆有人口 48 万，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景色迷人，空气清新。北部霍尔门科伦山是挪威人的滑雪乐园，几百年来在这里举行过无数次滑雪比赛，驰名世界的霍门科伦滑雪大赛，就因在这里比赛而闻名，山巅上建有宏伟壮观的滑雪跳台，跳台下建有灯光照明的人工滑雪道，长 5 公里，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比赛即在此举行。奥斯陆市内世界著名的比斯雷特速度滑冰场是奥运会滑冰的主要场所。冰雪运动是奥斯陆人民最喜爱的运动。每年 3 月第一个星期天是滑雪节，这一天，奥斯陆男女老少都外出参加滑雪运动。挪威之所以在冬季奥运会上成绩出色，与它雄厚的群众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冬奥会从 1924 年开始，都是在偏僻的小山镇举行的，而本届是冬奥会第一次由大城市承办。

本届冬奥会首次在主体育场燃烧奥林匹克火焰，但与夏季奥运会不同的是，火种不是来自奥林匹亚，而是取自挪威冰雪运动奠基人诺德海姆生前居住过的莫尔盖达尔村。火炬接力途经之处。都是曾在北欧运动会、奥尔门科伦滑雪大赛和冬季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挪威选手所在的城市和村镇。大会期间，挪威组委会赠送一面奥林匹克五环旗，这旗后来便成了冬奥会会旗。

参加本届冬奥会的有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32 名运动

员，其中女运动员 108 人。首次参加的有新西兰、葡萄牙，日本又回到了奥运会。战后德国分为前民主德国和前联邦德国两个国家，前联邦德国参加了本届比赛。

本届比赛项目首次列入女子 10 公里越野滑雪。山地滑雪中的山地两项被取消了，改为传统的 3 项：大回转障碍滑雪、回转障碍滑雪和快速降下。

本届冬奥会的头号新闻人物是早已驰名冰坛的 28 岁老将马尔·安德森，他一人包下 1500 米、5000 米、10000 米 3 个项目的金牌。但挪威队未能像 1936 年那样包下全部冠军，500 米赛时，美国的肯·亨利和唐·麦克德莫特分别夺得了金、银牌。

上届男子花样滑冰冠军美国的理·巴顿这次又再度夺得桂冠。女子花样滑冰桂冠则被英国新星珍·阿特韦格夺得。

挪威在滑雪赛中再次取得出色成绩，哈·布伦登夺得 18 公里金牌、西·斯洛特维克在两项全能中获胜、阿·贝格曼在跳台跳雪中夺冠。但在 50 公里赛中挪威失利，芬兰的韦·哈库利宁和埃·科莱赫迈宁分取了该项的冠、亚军。4X10 公里接力赛芬兰轻易拿到了金牌。而第一次列入比赛项目的女子 10 公里越野滑雪，以吕·维代曼为首的芬兰 3 名选手，囊括了全部的奖牌。上届越野滑雪赛中曾三夺金牌的瑞典，本届接连失利，只得了两枚铜牌。

山地滑雪项目中的男子大回转障碍赛，挪威的斯·埃里克森对地形了如指掌，较轻易地取得了金牌。不过他却在回转障碍赛中输给了奥地利的奥·施奈德，只得了亚军。意大利 33 岁的山地滑雪老将泽·科洛在快速降下赛中，轻松地获取了金牌。上届山地两项女子冠

军，奥地利的格·约胡姆·拜泽尔，本届获快速降下金牌；两个女子障碍滑雪项目的金牌均为 20 岁的美国姑娘安·劳伦斯夺得。

冰球赛共 9 个队参加，加拿大蝉联了冠军，美国居亚军，瑞典队获铜牌。

本届冬奥会共举行了 22 个单项比赛，挪威再次居领先地位，共获金牌 7 枚、银牌 3 枚、铜牌 6 枚；美国也夺得了除 1932 年外的最好成绩，获金牌 4 枚、银牌 6 枚、铜牌 1 枚；芬兰队金牌 3 枚、银牌 4 枚、铜牌 2 枚。

奥运会进入苏美抗衡的年代

伦敦奥运会前一年，即 1947 年 6 月，国际奥委会于斯德哥尔摩就 1952 年奥运会会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时世界一些城市对主办奥运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第十四届奥委会只有伦敦一家申请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第十五届则有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雅典、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洛桑、费城、斯德哥尔摩、芝加哥 9 个城市同时提出了申请。会议期间，各个城市都派来了由市长率领的代表团游说，气氛相当热烈。通过投票表决，赫尔辛基赢得主办权。

芬兰这个国家虽然人口不多，幅员不大，但体育运动相当普及，在冬、夏奥运会都取得过优异成绩。为奥林匹克运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40 年战争迫在眉睫，当日本东京宣布不承办奥运会时，芬兰毅然接过了这项任务，并积极进行了准备。赫尔辛基，亦名赫尔幸福，是芬兰首都和主要海港。当它被选为 1952 年奥运会会址的消息传开后，人群雀跃，举国上下投入了准备工作，赫尔辛基仅有 40 多万人口，

预计奥运会期，从世界各地到来的客人——旅游观光者、新闻记者、运动员和体育官员等，将达 7 万人。无疑这对一不大的城市将造成很大的压力，他们周密地考虑了城市建设，为客人到来后的住宿、交通和食品供应等作了妥善的安排。他们扩建了作为主体场地的赫尔辛基运动场，将原先只能容纳不到 5 万人的看台扩大为 7 万人，运动场附近，修建了供游泳、体操和球类比赛的各类场馆。另外，还有两座宏伟壮观的建筑物：一座是为纪念马蒂·耶尔维宁在 1932 年奥运会夺得标枪冠军的白塔；另一座是芬兰长跑骁将帕沃·鲁米的青铜像维妙惟肖，展现了鲁米往昔驰骋田坛的雄姿。这两座纪念物，也是芬兰作为“标枪之国”“长跑之乡”的象征。

运动会于 7 月 19 日至 8 月 3 日举行。应邀参赛的有 69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5 名运动员，其中女子 518 人。首次参加的有巴哈马群岛、加纳、危地马拉、香港、以色列、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泰国和南越。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联邦德国也首次应邀参加了奥运会。中国奥委会因当时国际奥委会某些领导人蓄意制造“两个中国”行为受阻，故仅参加了 1 项男子仰泳和 8 月 3 日闭幕式。首次参赛的苏联队，对这届运动会非常重视，共派出 295 名运动员，数居各国首；其次是美国，为 286 人；东道主列第三，共 260 人。英 257 人、法 246 人、意 226 人、瑞典 206 人、联邦德国 205 人。

大会于 7 月 19 日当地时间下午 1 点正式开幕。气候不佳，但观众台上座无虚席。当阔别田坛多年的帕沃·鲁米高擎火炬进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高呼“鲁米！鲁米！”年过半百的鲁米，一边频频点头向观众致敬。当

芬兰另一名长跑明星汉·科勒赫迈宁从鲁米手中接过火炬，点燃塔上火焰，大会进入了高潮。掌声、欢呼声和熊熊燃烧的奥林匹克火焰，使人们沉浸在狂热的气氛中。

本届奥运会可说是大面积丰收的一次运动会，以破世界纪录为例，举重有 5 项，射击有两项，游泳有 1 项，而田径更是突出：男子全部 24 个项目有 21 项打破或平奥运会纪录。其中三级跳远、链球、十项全能和 4x100 米接力均为世界新纪录；女子 9 项，有 8 项奥运记录被刷新，其中 200 米跑、80 米栏、铅球和 4x100 米接力创世界纪录。有的项目是一破再破，如女子铅球，破奥运会纪录的为 21 人次，男子 3000 米障碍为 16 人次，链球为 13 人次，等等。这在奥运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与上届整个比赛只有 4 项世界纪录，而田径连一项都没有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也说明，长期战争的影响已逐渐消失，一大批训练有素的优秀选手已涌现在世界体坛。如果说以往届次中有过以鲁米、欧文斯、布兰克尔斯—科恩为英雄的奥运会，则赫尔辛基的杰出人物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埃米尔·扎托皮克。

扎托皮克是 50 年前后田坛长跑骁将，有“人类火车头”之称。他曾先后 6 次刷新 5000 米、10000 米等长跑项目的世界纪录。上届伦敦奥运会时，他初显锋芒，10000 米跑获金牌，5000 米获银牌。这次他在赫尔辛基大显身手，先后夺得 5000 米、10000 米和马拉松跑 3 枚金牌，是本届田径赛中获金牌最多的运动员。有趣的是，7 月 24 日他在 5000 米赛夺冠不久，他的妻子丹娜·扎托皮科娃也荣登了女子标枪冠军台。扎托皮克生于 1922 年 9 月 19 日，正好与妻子丹娜同年同月同日，而这次夫妻双双又在同一天获得奥运会金牌，成为体坛一段佳话。7

月 24 日的男子田径赛,也给匈牙利人带来了喜悦,约.切尔夫马克将链球首次掷出 60 米开外,以 60.34 米的世界新纪录荣获金牌。

上届奥运会上首次参赛的牙买加队,就显示了在径赛中的才华,他们获得了男子 400 米跑的金、银牌和 800 米跑的银牌。上届 4x400 米接力赛,他们原来也满有希望夺魁,只是因为跑第三棒的温特腿部突然抽筋,才功亏一篑,眼睁睁看着美国拿走金牌。本届该项接力赛,牙买加决心一雪前耻。参赛的仍是上届 4 名队员:温特、莱恩、麦肯利和乔.罗登,他们以 3 分 03 秒 9 创造世界纪录,并从美国人手中夺回了桂冠。

不过美国田径队仍是本届男子赛中的头号强手。全部 24 个项目,他们获得了其中 14 项冠军。在短跑、跨栏、跳跃、投掷项目上居绝对优势,多次夺冠和创世界纪录。巴西选手阿.费.达西尔瓦为本国首次夺得三级跳远金牌,并且成绩出色,两次都跳出了 16 米开外,均刷新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达西尔瓦是南美第一个创造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从 1950—1955 年先后 5 次破、平三级跳远世界纪录。1956 年他又蝉联了该项奥运会冠军。后来这位田坛选手又成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和演员。澳大利亚在这次女子田径赛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三夺短跑和跨栏金牌,玛.杰克逊在 100 米 200 米赛中两次夺冠,并以 23 秒 6、23 秒 4 平、破 200 米世界纪录,她队友希德拉亨蒂——斯特里克兰也在 80 米栏比赛中以 10 秒 9 的成绩创世界纪录,获得金牌,四年后这位选手再次在该比赛中夺魁。

首次出战的苏联女子出手不凡,共获 2 枚金牌。7 月 20 日,苏联 尼娜.罗玛什科娃在铁饼赛中取胜,成为

苏联第一个奥运会冠军。罗玛什科娃曾 8 次获苏联冠军。但是 4 年后她在墨尔本奥运会上失利，只得了铜牌。可庆幸的是，在又一个 4 年过去后的罗马奥运会上，她再次夺回了金牌，获得另一项桂冠的苏联女选手加琳·济宾娜，也是 50 年代著名运动员。7 月 26 日她在恶劣气候条件下，仍将铅球推出了 15.28 米，创造了她的第一个世界纪录。此后多年，她一直保持着在这一项目上的优势，并 8 次刷新世界纪录。1956 年奥运会前夕，她还以 16.76 米的成绩最后一次创造了世界纪录。男女游泳全部 11 个项目的奥运会纪录这次全被刷新。曾在 1932、1936 年两届奥运会上称雄的日本男队，成绩远不如前，这次只得了 3 枚银牌。

美国也没有象上届一样，获得男子游泳全部金牌，本届只得了 6 枚金牌中的 4 枚，女子比赛的结果使人惊异。美国 1 枚金牌未得，而上届毫无名气的匈牙利队，夺得了金牌中 4 枚，并在 4x100 米自由泳中创造了 4 分 24 秒 4 的世界纪录。这也是本届游泳赛创造的唯一一个世界纪录。男女跳水的全部金牌，仍为美国夺取，男子跳水跳台冠军塞僚尔·李是美籍朝鲜人，他继上届奥运会又一次夺得这项比赛的金牌。女子帕·麦考密克重复了上届维·德弗雷斯的成就，成为板、台双料跳水冠军。

举重比赛，吸引了 41 个国家的 140 名选手参加，美国仍保持了上届优势，获得了 7 个级别中的 4 项冠军。首次亮相的苏联，成了其余 3 个级别的金牌得主，显示了雄厚的实力，表明它将是今后举重坛上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上届奥运会上突破美国囊括金牌的埃及队，这次 1 项冠军未得，并从此失去了在这个项目上的优势。

苏联在摔跤中成绩也很出色，共获 6 枚金牌，是获

摔跤金牌最多的队，古典式 87 公斤以上级冠军、苏联的约·科特尔斯，不仅是摔跤能手而且还获得过苏联链球全国冠军。瑞典获得摔跤项目的 3 枚金牌，仅次于苏联。美国是拳击赛中金牌最多的得主，共拿了 4 枚，但诺夫·李获得 81 公斤的冠军却颇出人意料。李原为 81 公斤以上级候补队员，因 81 公斤人员患病，临时由他取代。他在几天内不得不将体重减轻了 6 公斤，即使如此，他在比赛中仍然体力充沛，他不仅技艺出众，夺了金牌，而且作风良好，受到表彰，被授予维拉·巴克比杯。

本届男女体操，有 49 个国家 190 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不乏世界冠军或奥运会冠军。如瑞士的约瑟夫·斯塔尔德、联邦德国的阿尔弗雷德·施瓦茨曼、芬兰 44 岁的老将赫·萨沃莱宁先等。由于苏联队的出现。这些一度在奥运会称雄的选手失去了往昔的优势，从此开始了苏联居主导地位的年代。男女 15 个项目，苏联夺得了包括男女团体和个人全能在内 9 枚金牌。女子成绩突出的是苏联玛·戈罗霍夫斯卡娅，获金牌 2 枚，银牌 5 枚，是本届获奖牌最多的选手，男子则是苏联的维·朱卡林，获金牌 4 枚，银牌 2 枚，他也是本届唯一得 4 枚金牌的运动员。朱卡林已 31 岁，他的成长，颇不平凡。青年时代，战争使他想在体坛一展才华的梦幻破灭了。他上前线，并不久被俘，这个在德寇集中营里穿着 10491 号囚衣的苏军战士，在一次被押送途中，被苏联游击队营救，得以虎口逃生，获救后，他仍未放弃自己喜爱的体操运动，不间断地坚持训练。战后，他虽然年龄偏大，但仍是苏联体操队中尖子人物，多次获全国冠军称号。赫尔辛基奥运会后两年，他在罗马又夺得世界锦标赛桂冠。1956 年墨尔本奥运会，他带伤上阵，战胜了比他整整年轻 10

的日本名将小野乔，蝉联了个人全能冠军。他还获得了团体和双杠赛中的两枚金牌。

意大利在男女击剑比赛中取得了与上届一样成绩，获 3 枚金牌。法国男子花剑运动员克里斯蒂安·多里奥拉夺得该项个人和团体赛两枚金牌，1956 年奥运会他蝉联了个人冠军。这位剑坛名手在 1948 年—1956 年三届奥运会上，共获 4 枚金牌，2 枚银牌。

为期二周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于 8 月 3 日正式闭幕。大会期间，虽然气候不佳，不时遭到寒冷和风雨的袭击，但仍然是一次成功的运动会，高水平的运动会，美国仍保持了金牌总数领先的地位，共获 40 枚，另外获得银牌 19 枚，铜牌 17 枚。苏联步其后，金、银、铜牌数分别为 22、30、19 枚。如要计算前六名非正式团体总分，则两国均为 490 分。赫尔辛基奥运会揭开了新的篇章进入了美、苏两个体育强国抗衡的年代。

莫里亚克获诺贝尔文学奖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Franois Mauriac, 1885-1970) 法国作家。出生于波尔多市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守旧的资产阶级家庭。少年时期起就沉缅于宗教文化和文学作品。中学毕业后，考进巴黎文献典籍学校，但几个月后就毅然抛弃学业，转而从事文学创作。

莫里亚克是弹奏着诗人的七弦琴走上文坛的。1909 年发表诗集《握手》，深得名作家雷斯的赞赏。1911 年发表第二部诗集《告别青春》。1912 年开始写小说，但一直未被世人注目。1922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是他的成名之作，从此莫里亚克蜚声文坛，陆续写下了一系列以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家庭悲剧为题材

的著名小说。1925 年发表的《爱的沙漠》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这个书名可以概括他的全部小说的主题。1932 年发表《蝮蛇结》。此外还有小说《吉尼特里克斯》（1923）、《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等。1933 年，莫里亚克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学士。莫里亚克的小说充满乡土气息和宗教色彩。他善于提示资产阶级家庭的内在悲剧，因而被誉为描写痛苦的大师。1952 年，因为他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获诺贝尔文学奖。莫里亚克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作家，他勇于跳出宗教樊篱，站在正义和进步的一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他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战后，成为最杰出的记者。在政治上，他积极支持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曾获荣誉团大十字勋章。戴高乐高度评价他，说他一直忠于法国，选择了法国。莫里亚克具有多方面的，他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戏剧家、文学评论家。他辛勤写作一生，留下了一百多卷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1970 年莫里亚克去世时，戴高乐将军在唁函中赞誉他代表了法国文学的精萃，是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丽的一颗珍珠。

美国建造出世界第一艘原子动力潜艇

1952 年 6 月 14 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世界上第一艘原子动力潜艇建成，并把它称为“未来以原子能为动力的商船及飞机的先驱”。

这一艘“鹦鹉螺”号原子动力潜艇是在康涅狄格州的格伦顿海军潜艇基地宣告建成的。它的推进系统正在芝加哥附近阿根纳国家实验室制造。

该潜艇建成后，几乎可以无限期地潜入水中，并已

在不用增添燃料的情况下,以每小时 25—30 海里的速度长期巡航。

杜鲁门说,从密集反应堆到核动力潜艇的这一成功发展“如同第一艘海洋蒸汽轮船一样,对世界海军事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样一种反应堆的发展正在海军轮船局的海曼·里克沃的指导下进行。“鹦鹉螺”号的整体建造可望在 1954 年完成,但海军已要求建造另一艘核潜艇。建造一个地面电站反应堆已被列入计划。

1952 年船舶碰撞民事管辖权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

各缔约方,认识到通过协议确定碰撞中民事管辖权方面某些统一规定是可取的,决定缔结一公约,并为此协议如下:

第 1 条

(1) 海船与海船或海船与内河航行船舶之间所发生的碰撞的诉讼,只能在下列法院提起:

(a) 被告经常居住地或营业所在地的法院;

(b) 被告船,或可依法扣押的,属于被告的任何其他船舶,被扣押的地点的法院,或本可进行扣押并已提供保证金或其他保全的地点的法院;

(c) 碰撞发生于港口界限或内河水域时,碰撞发生地的法院。

(2) 诉讼在本条第 (1) 款所列的哪一法院提起,应由原告决定。

(3) 请求人不得在未撤销已经提起的诉讼之前,就同一事实对同一被告在另一管辖区域内提起诉讼。

第 2 条

第 1 条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妨碍当事双方

向其协议选定的法院就碰撞提起诉讼，或将该案提交仲裁的权利。

第 3 条

(1) 就同一碰撞提起的反诉，可向根据第 1 条填写对本诉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

(2) 如有几个请求人，任一请求人可向已受理就同一碰撞对同一当事人的诉讼的法院，提起其诉讼。

(3) 在发生涉及两艘或多艘船舶的碰撞时，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妨碍按本公约规定受理案件的法院，根据其国内法就同一事故产生的其他诉讼行使管辖权。

第 4 条

本公约亦适用于一船因进行或不进行某项操纵，或因不遵守规则而造成的对另一船或该船所载财物或人身的损害的诉讼，即使未曾发生实际碰撞。

第 5 条

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改变目前或此后在各缔约国实施的关于军舰或家所有的或从事国家事务船舶碰撞方面的法律规定。

第 6 条

本公约不影响运输合同或其他合同所引起的请求。

第 7 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经修订的 1868 年 10 月 17 日莱茵河航行公约中所规定的情况。

第 8 条

当任何诉讼中所涉及的一切船舶属于某一缔约国家所有时，本公约的规定应适用于全体利害关系人。

(1) 对于属于非缔约国利害关系人，上述规定的适用可由各缔约国根据互惠条件进行；

(2)如果全体利害关系人与审理该案法院属于同一国家,则应适用该国国内法,而不适用本公约。

第 9 条

各缔约国保证将各国之间因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产生的争议,提交仲裁,但不得妨碍那些同意把其争议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缔约国所担负的义务。

第 10 条

本公约应开放,供出席第九届海洋法外交会议的国家签署。签署议定书需经比利时外交部的斡旋予以起草。

第 11 条

本公约需经批准。批准书应向比利时外交部交存,由其将任何此种文件的交存通知所有的签署国和加入国。

第 12 条

(a) 本公约应自第二份批准书交存之日起六个月后,在率先批准本公约的两个国家内生效。

(b) 对第二份批准书交存之后的批准本公约的国家,应自该国交存批准书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第 13 条

未出席第九届海洋法外交会议的任何国家,可以加入本公约。

加入本公约的任何国家应通知比利时外交部,由比利时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此种通知通告所有公约签署国和加入国。

对于本公约加入国,本公约应自接到加入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但不得早于按公约第 12 条第 (a) 款的规定本公约生效的时间。

第 14 条

各公约缔约国可在本公约对其生效三年之后或以后的任何时间，请求召开新的会议，考虑对本公约的修正。

提出行使此种权利的任何缔约国应通知比利时政府。比利时政府应在六个月内召集会议。

第 15 条

各缔约国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后，有权随时退出本公约。此种退出应自比利时政府接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比利时政府应通过外交途径将此项通知通告所有其他缔约国。

第 16 条

(a) 各缔约国可在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此后任何时间，书面通知比利时外交部，将本公约适用于由其负责国际关系的任何领土。本公约自比利时外交部接到此项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适用于通知中指明的领土，但不得早于本公约对该国生效之日。

(b) 凡根据本条第 (a) 款声明本公约适用于由其负责国际关系的领土的缔约国，可在此后任何时间通过通知比利时外交部，声明本公约不再适用于此种领土。自比利时外交部接到此种通知一年后，本公约停止适用于此种领土。

(c) 比利时外交部应通过外交途径将根据本条规定接到任何通知通告所有公约签字国及加入国。

1952 年 5 月 10 日订于布鲁塞尔，共一份，用法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霍尔洛·乔巴山逝世

霍尔洛·乔巴山，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蒙古人民共和国前部长会议主席。

1895年2月8日，乔巴山诞生在车臣汗部的贫苦牧民家庭，幼年时当过牧童，13岁时被送进喇嘛庙。17岁逃出喇嘛庙到达库伦，靠搬运、打更为生，后进帝俄领事馆办的翻译学校学习。1914年春，因成绩优良，被送至俄国伊尔库茨克师范学院附设高级小学学习。在俄国，他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工人运动，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乔巴山等留俄学生被蒙古召回国内。1919年，他在库伦组织了秘密革命小组，不久与苏赫一巴托尔领导的小组合并，筹建蒙古人民党，组织人民武装。为了学习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经验，1920年6月，乔巴山秘密赴苏，在伊尔库茨克红军军官学校学习。

1921年3月，蒙古人民党成立，乔巴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主席团委员，担任人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解放恰克图后，乔巴山任西路革命军指挥，与苏俄红军联合作战，击败了俄国白匪军。7月，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乔巴山任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人民军政治委员。8月，任蒙古革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1923年，“苏赫一巴托尔逝世后，进一步培养党员和巩固党这一工作的全部重担，便落在他的忠实战友乔巴山同志身上”⁽¹⁾根据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经过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乔巴山和蒙古人民党领导蒙古人民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坚持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924年6月8日至9月，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改名为人民革命党，制订了

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乔巴山领导的特别委员会粉碎了当时窃居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政部长丹尚企图发动政变的阴谋。1924年11月，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通过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在苏联的援助下，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保证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乔巴山参与了这部宪法的制订。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蒙古人民共和国经历了激烈的、复杂的斗争。公开的和暗藏的封建残余势力用放毒、纵火、暗杀以至武装叛乱进行拼死反抗。人民革命党内也出现过右的和“左”的倾向。20年代中后期，以党的主席丹巴多尔济为代表的右派违背党的阶级路线，让大批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和国家机关里，竭力保护封建牧主经济和寺院经济，遭到地方党组织中坚持党的正确立场的党员和支部的抵制和反对，形成了“霍顿反对派”（“霍顿”为古代人蒙古人的游牧屯住地，转意为蒙古的地方组织。“霍顿”反对派”意为基层反对派。）。乔巴山支持并领导“霍顿反对派”，与党内右派作了坚决斗争。1927年与1928年召开的人民革命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清算了党内右倾路线，坚持党的阶级路线，纯洁了党的队伍。乔巴山在七大上发言指出，“右倾危险产生的原因，就是由于党按其社会成份来说是不纯的”。1928年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由乔巴山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审理遭受右派打击的党员和党组织事件。同年12月召开的大人民呼拉尔上，乔巴山当选为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大会决定将没收封建主的牲畜与财

产分给贫牧户，减少中牧户的税收。政府还建立由乔巴山领导的专门机构，依靠广大劳动牧民，没收封建主的财产。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党内右倾被克服以后，又出现了“左”的倾向。“左”倾分子不顾蒙古经济是以分散的畜牧业为主，并且十分落后的特点，照搬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做法，提出“牧产全盘集体化”的口号，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建立集体牧场，过早取消私人工商业（其中主要是个体手工业和商贩）把富裕牧民与封建牧主一样作为打击对象，导致农牧业生产的大破坏。“左”倾分子还强制推行喇嘛还俗运动，严重伤害牧民的宗教感情。反对封建势力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煽动牧民暴乱。乔巴山坚决反对这种“左”的政策。早在七大上，他在批判右倾的同时指出，过早实行畜牧业集体化、消灭私有制是不合时宜的。1932 年 6 月，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特别全会，批判了“左”倾错误，规定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尽量发展国家的生产力，铲除封建主义残余，逐步限制资本主义成份，奠定逐步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

乔巴山从 1931 年起，担任政府中最重要的一个部——畜牧农业部部长。1932 年，人民政府宣布违反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集体牧场可以解散，统一牧民税收条件，取消军事税，调动了牧民的积极性，使畜牧业和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35 年，乔巴山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1936 年兼内务部长。1936 年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1937 年任人民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1937 年起任部长会议主席。

1940 年 3 月，在消灭了封建残余势力，国家掌握了

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新兴工业、交通、电讯取得初步发展的形势下，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乔巴山在会上指出，“我们已经避免了资本主义奴役的惨祸，现在还在发展全国的生产，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关系。”这次大会标志着蒙古从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开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乔巴山同志便居于党的领导地位并领导着党的中央委员会，他指示党并引导党去解决我国沿着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这次大会标志着蒙古从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开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乔巴山同志便居于党的领导地位并领导着党的中央委员会，他指示党并引导党去解决我国沿着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同年6月，第八届大人民呼拉尔通过了乔巴山主持制订的新宪法。新宪法总结了1924年以来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消灭封建势力、发展经济文化所取得的成就，规定今后的任务是“保证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以便今后过渡到社会主义”。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

30年代中后期，德日法西斯日益猖獗，国际形势日趋紧张。1939年5月，日本军队侵入蒙古，乔巴山率领人民军把侵略军赶出蒙古。1942年他倡议建立民兵部队。1944年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945年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日本宣战。乔巴山率领八万骑兵和机械化部队穿越戈壁沙漠，翻越兴安岭，行军1000公里，进入辽东半岛，与苏联红军联合作战，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贡献。毛泽东同志说：“乔巴山元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将在中国人民的

心中永垂不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乔巴山领导蒙古人民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1947 年 12 月，乔巴山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1952 年 1 月 26 日，乔巴山因肾癌医治无效逝世。他的著作有：《蒙古人民革命简史》、《青年的立志》、《马克思托布传》、《蒙古人民的大事》等。

小资料

人类第一次成功地使用机械心脏。1952 年 3 月 8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医院在费城宣布：人类首次将机械心脏成功地安装在患者身上。尽管这位 41 岁的钢铁工人皮特·迪林已经死去，但该装置运转正常，是成功的，他的死因与使用机械心脏无关。该装置使迪林的生命维持了 80 分钟。参加手术的人员来自 3 家医院。该装置是对 1932 年德贝基博士研制的泵式心脏的改进，它被看作是朝着整个人造心脏这一目标迈进的第一步。